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毛泽东与周世钊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引 言

人生易老天难老，诗人老去诗情在。一代伟人毛泽东在其不朽的诗篇《七律·答友人》中写道：

七律 答友人（1961年）

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
班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
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
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

这首诗最早发表在1963年12月出版的《毛主席诗词》中。1963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跨入古稀之年的七秩大寿的日子。《毛主席诗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25年来，多少人在探索，伟人毛泽东的友人究竟是谁？

1986年9月，为了纪念毛泽东逝世十周年而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选》（1），明确地回答了“友人是谁”的问题。该书在其《七律·答友人》诗后的注释中写道：

《答友人》这首诗写作者（指毛泽东）对湖南的怀念和祝愿。友人即周世钊（1897—1976）。周是湖南宁乡人，作者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同学，曾加入新民学会。这时任湖南省副省长。解放后与作者信件来往颇多，并有诗词唱和。1961年12月26日作者给周的信中，在引用“秋风万里芙蓉国，暮雨千家薜荔村”，

“西南云气开衡岳、日夜江声下洞庭”两联以后说：“同志，你处在这样的环境中，岂不妙哉？”可以跟本诗印证。

毛泽东，号润之，1893年12月26日诞生于湖南湘潭韶山冲，1913年至1918年和周世钊同班就读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长期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一代名人、伟人，1976年9月9日逝世于北京。

周世钊，字惇元，又名敦元、东园，1897年3月12日诞生于湖南宁乡石子冲，1913年至1918年和毛泽东同班就读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长期从事教育工作，解放后曾一度担任过湖南省副省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常委会委员等职，是一位普通的民主人士，1976年4月20日逝世于长沙。

在毛泽东和周世钊相交的63年中，俩人情意拳拳，过从甚密，书信不断，诗词频频。毛泽东称周世钊是“真能爱我又真能于我有益的人”，又称他是“贤者与能者”。周世钊称毛泽东是“素抱宏愿的吾兄”，又称他是“尊敬的主席”。一位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领袖，全国各族人民的伟大导师，一位是一般民主人士，长期担任中小学教师的普通人。一在上上，一在天下，天地之差与龙蛇之别。然而，他们怎么能成为“友人”的呢？他们又是怎样成为“友人”的呢？

本书叙写了毛泽东与周世钊的友谊。他们直接交友63年。本书内容涉及的年代将近一个世纪，即自19世纪末到20世纪末年。书中描写了同乡与同乡、农民之子与农民之子、同学与同学、新民学会会友与会友、教师与教师、

战友与战友、编辑与编辑、同志与同志、诗人与诗人、赤子与赤子、友人与友人……之间的其亲其爱之情。

相遇贵相知，人生难得最相知。相知贵知心，人生更难最知心。

本书的主要资料取自毛泽东与周世钊的手稿。部分资料系根据周世钊及其亲属、朋友、学生的谈话记录。还有一些资料转引自一些书籍、报刊。所以，本书内容具有史料性，可信度甚高。笔者希望它们能成为毛泽东与周世钊相交的史实文字，同时殷切期望读者的补充、批评与指正。

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与周世钊早期的某些文字，以及黄昏十年（即文化大革命中的晚年十年）等的一些文字与诗同，只是代表他们当时的思想。这些肯定存在与当代的时代思想不符的地方。但也只能由之，只能照史实录，尚望读者注意、理解与谅解。

简介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和领袖，周世钊是普通的非党人士和教育工作者。但是，毛泽东与周世钊却有着 63 年的友谊交往。肝胆相照，情意拳拳。本书记述了他们之间的一些史实。这些史实内容广泛、生动，富有教育意义。

本书适合于工人、农民、战士、学生和干部阅读，同时对史学家、政治家、学者、研究员、教授、文学工作者等也不乏参考价值和史料作用。

毛泽东与周世钊

第一章 晨曦初照

毛泽东的一生，是以身许国的一生，是以身许主义的一生。他是一位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真正的风云人物。

周世钊的一生，是未敢忘忧国的一生，是未敢忘人民的一生。他是一位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普通的人。

很难想象，一位爱祖国、爱人民的人会不热爱他们的故乡？不热爱他们的父母？同样也很难想象，一位真正热爱父母、热爱故乡的人会不爱他的祖国和他的人民？——毛泽东与周世钊，对他们各自的家乡，对他们各自的父母都有着无限的爱。他们的少年时代，虽然各自东西，未曾谋面，但是他们的故乡土地，滋养了他们爱故乡、爱父母、爱朋友的素质。

一 悠悠家乡情

湖南，自古称为清澗之地，芙蓉之国，峰秀雁回之境，水碧沙明之乡。它位于我国的南部，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素有鱼米之乡的美称。湖南境内有明媚秀美的平原，有延绵起伏的丘陵，有巍峨绮丽的山区，湘、资、沅、沔四水汇注八百里洞庭，流入长江。真是山清水秀，人杰地灵，人才辈出。

韶山冲，是一个又狭又长的谷地，坐落在湖南省湘潭县西边的昭山下面，四面都是郁郁葱葱的高山。从很远的年代起，这个风景优美的冲里就住着勤劳、质朴的农民，他们用勤劳的双手，一代接着一代地建设着这个美丽的山村，创造着他们的生活。〔2〕

但是在长期的封建统治下面，这里的农民和全国各地的农民一样，遭受着残酷的剥削和压迫，过着艰苦悲酸的日子。到了清朝末年，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在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的双重剥削和压迫下，这里农民的生活就更是苦不堪言，几乎到了不能生存下去的境地。

1893年12月26日（清光绪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毛泽东就诞生在韶山冲的一个农民家里。

离开湘潭韶山冲不远，大约15公里处，有个地名叫石子冲的村庄，属湖南省宁乡县。这个村庄同样是一个贫穷的山乡村落。这儿的老百姓同样过着和韶山冲一样的受剥削、受压迫的生活。

1897年3月12日（清光绪二十三年二月十日），周世钊就诞生在石子冲的一个农民家里。

毛泽东和周世钊的童年，就在湖南的韶山冲与石子冲这两个穷苦的村子里，过着勤俭、简朴、艰苦的农家生活。

毛泽东在20世纪10年代初离开韶山，以后就很少在故乡生活了。1927年1月，他在湖南考察农民运动时曾回到韶山。1959年毛泽东又回到了韶山，写出了壮丽的诗篇《七律·到韶山》：

七律 到韶山

1959年6月

1959年6月25日到韶山。离别这个地方已有32周年了。

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
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这首诗是毛泽东在1959年6月25日至27日重返韶山后，对故乡32年斗争的概括，也是中国波澜壮阔的革命史的概括。

周世钊在20世纪初离开石子冲后，也很少在故乡生活了。1969年5月，周世钊回到宁乡石子冲。怀念、热爱故乡的情思凝结在他当时写就的三首诗词中。即：《江城子·赴宁乡》、《鹧鸪天·农村即事》和《七律·离乡》。

江城子 赴宁乡

1969年

轻车熟路向宁乡，野苍苍，水泱泱。百里平畴绿波 新秧。遍地英雄多干劲，冲薄雾，浴初阳。故园变化不寻常，旧芜荒，溢芬芳。人变精神地也换新装。老少逢迎相告语，身健好，岁丰穰。

鹧鸪天 农村即事

1969年

云散烟空宿雨收，山村景色更清柔。方扩水暖晴嬉鸭，曲岸风凉晚放牛。穿草径，过茅沟，砍声阵阵笑声稠。收工结伴同归晚，月上林梢挂玉钩。

七律 离乡

1969年

欲留还去久逡巡，少长相携为送行。鸣鸟声声如惜别，飞花点点似随人。家门后起勤劳好，闾里前瞻气象新。投老还乡多慰意，不辞来往历风坐。

1966年6月，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刚刚发动，毛泽东最后一次来到韶山，住在著名的滴水洞高级宾馆。

在1959年6月26日下午，毛泽东游罢韶山水库，对周围的随员说，我过几年，摆脱了政务，能到这里度晚年也是很好的。随员们心领神会，于是盖起了这座高级宾馆。

滴水洞宾馆，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记下了历史的一页。遗憾的是，它没有为毛泽东安度晚年贡献寓所。如果，真能兑现初衷，毛泽东真能约二三友好来此安度晚年。周世钊也常来常往，念诗诵词，那么，他们的晚年将会更长，将会幸福、愉快。中国的形势又将如何呢？

1966年，毛泽东已经73岁高龄，又一次来到韶山领略家乡的山山水水。在6月的一天，毛泽东再次在韶山水库游泳。水库中是冰冷的山泉水，但他在其中舒展自如。离开滴水洞的那天，随员们已经准备好一切，请他上车。毛泽东刚走到停车场，突然间，又返回宾馆，并说，我还要回去坐一会。他在宾馆大厅静坐了约半个小时，才恋恋不舍地告别故乡。这也是他最后一次来韶山了，想不到竟是对故乡的诀别。

同样，周世钊最后一次来到宁乡也是留连忘返。那是1976年的春天，历时十年，比八年抗战还长两年的文化大革命行将结束。其时，周世钊病势甚重，先在北京医院住院，接着于1976年1月转入湖南医学院附属医院。他的病是不宜外出的，医生、亲友都劝阻他的宁乡之行。可是，他却坚持要去宁乡，向医院告假三天，到了宁乡，故乡的一草一木都使他眷恋、伤感。他的童心泛现，经常泪流满面，赤子来探望他的家乡、他的父母之墓。

从解放到毛泽东、周世钊逝世的27年间，毛于1959年重返故乡，周于其10年后的1969年重返故乡，他们两人都写下了诗篇。

同样，在7年之后，毛泽东于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起）最后一次到了韶山冲。周世钊于其10年后的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末尾）最后一次到了石子冲。两人都未写诗。

二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毛泽东的父亲叫毛顺生，是一个农民。他原来是一个贫农，后来兼作粮食和生猪的贩运，上升为中农，后又上升为富农。父亲对儿子的管教很严厉，而且完全是从一个农民的观念出发的。

毛泽东的母亲是一位慈祥、可亲的农家妇女。她叫文七妹（以前曾误为文其美）[3]，湘乡县唐家坵人。她热心帮助穷人，逢到荒年旱月，就把家里节省下来的一些米粮送给挨饥受饿的乡亲们。远近乡邻人人都称赞她的美德。毛泽东非常敬爱他的母亲，听母亲的话，并深受母亲这种热心帮助他人的美德的影响。因此，他只要看到旁人有困难时，总要尽力去帮助他们。

周世钊的父亲名叫周润生，少习举业，但不久离去，自读医书，为乡人开方治病，并开了一个小药店，自任店员，制药发药。乡间贫民买药多无现钱，常记帐赊欠，年终结帐也多不能偿清，因此并无多少赢利。后因不能维持生计，中年以后遂督率儿子们耕种祖遗田产，勉强维持生活。周润生为人平和忠厚，绝少打骂子女，待人温和有礼。他常对邻居族戚间鼠牙雀角之争，热忱为之排解。

周世钊的母亲是位慈祥、略通文墨的家庭妇女，子女七人都亲自抚育，除主中馈之外，纺绩洗浆，自晨至午夜无片刻休暇。邻居有所借贷，必尽力与之。平时无疾言厉色，子女吵闹失误，也只是殷殷劝告，很少责骂。

毛泽东是他父母的第三个儿子。他的两个哥哥都因身体不好而夭折。毛泽东童年的身体也很瘦弱，还常常害些小病，父母为他担过不少心。母亲对于他的饮食、穿着格外关心照顾，惟恐他伤风感冒，弄出什么病来。毛泽东的母亲不识字，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由于受母亲的影响，他在童年时也信过佛。毛泽东有两个弟弟，即毛泽民与毛泽覃。

周世钊的父母有子女七人。他是第六个孩子，两个哥哥和弟弟都从事农业劳动。他童年时常去田里捉鳝鱼、泥鳅，有时到山里拾寒菌、摘毛栗，也有时跟着父亲到附近的池塘里钓鱼，又有时跟着哥哥到附近山中捡枯枝、扒落叶。他的兄弟姊妹中，只有他是读了书的知识分子。

孟子曾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1920年3月14日，毛泽东自北京致函周世钊，其中第一段为：

接张君文亮的信，惊悉兄的母亲病故！这是人生一个痛苦之关。象吾等长日在外未能略尽奉养之力的人，尤其发生“欲报之德，昊天罔极”之痛！这一点我和我的境遇，算是一个样的！

……

什么是一个样的呢？毛泽东与周世钊的母亲都在1919年去世了。

1969年5月间，周世钊由长沙返宁乡，到铁锣冲为其父母展墓时，适逢暴雨，他写下了悲痛的《七律·展墓》：

少小离乡老不归，每从梦里接慈晖。
松楸展敬心常在，菽水承欢愿早违。
为看东风荣宿草，敢辞冻雨湿征衣。
素餐久愧乖遗训，俯首低徊泪暗挥。

1976年二三月间，周世钊在病榻上写下了几段回忆文字：

“1913年冬，家里寄来一件灰大布的长衣，我知道是母亲纺纱织布制成的。因为我还有衣穿，久置未用。等到寒假时，因为缺少路费，把这件新衣送进当铺，当了一块多钱。我没有把这件事告诉家里。下学期开学后也没有把它赎回来。这是一件很对不起母亲的事。后来每读孟郊的‘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的诗句。往往泪落沾衣，追悔莫及。”

周世钊的父亲的身体素来羸弱，经常咳嗽吐痰，冬寒时尤甚。肺气肿、气管炎的病症表现特别明显。晚年为了家务操心操劳，精力常感疲乏。

1915年新春，周世钊的父亲为了帮助弟家的喜庆活动，感冒生病，延医治疗，服药无效，竟于3月初长逝。

周世钊父亲生病时，周世钊已去长沙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家里没有函告，一直到病极危时，才着人到校接他回家。这天已是午后2时，周世钊请了假即行，路途泥泞，仅走了30多里天就黑了。翌日早起急行，到家时其父已故，不得临终面聆遗嘱，成了终生遗恨。

周世钊等到丧葬事毕，才辞别母亲、兄姊等回校。

1915年暑假，周世钊带着烦闷、悲观的心绪回到家里。父亲的死使他伤感、彷徨。因为家里只有父亲最知他能读书，也最希望他能升学上进、成名成家。现在父亲不在了，家里生活又困难，谁还能象父亲一样关心他的学业前途呢？如此日夜心绪不宁，越想越感觉到前途暗淡，人生无味。半月后的一天，竟吐血不止。周母爱子心切，赶快请医配药。但周竟想一死了之，背着母亲将煎好的药倒掉。他听人说，吐血的人吃不得醋，周又在厨房里弄来一碗醋喝了。事情被周母知道了，守着他又哭又劝，说到伤心处竟痛哭起来。周世钊也觉得他一死不要紧，但会太伤母亲的心了，因此表示听母亲的话，延医服药。周世钊的一位杨姓表兄为他开了一个药方。一味山中挖的丹参，煎好后兑童便，同时忌吃煎炒有盐的菜。周世钊吃了20多付丹参和童便的药，吃了一个整月无盐少油的水煮的饭菜，不但吐血的病完全痊愈，身体也长胖了。

周世钊的母亲长年操持家务，心力交瘁，于1919年冬病逝。其时周世钊从修业小学放寒假正在家。周世钊陪侍在母亲病榻前未尝少离，周母一直到弥留时没有什么遗言。遵周母平日谈话，葬于可以望见家门的近山中。丧事虽毕，但周世钊回修业小学后仍感痛苦。张文亮把此事写信告诉了毛泽东。

1976年3月，周世钊病重住院时请假勉强返回宁乡，曾去凭吊母墓，泪如雨下，泣不成声。回长沙住院一月后，周世钊病逝。

恰恰在1919年，毛泽东的父母也相继亡故。毛泽东的父亲毛顺主逝世于1919年，年仅49岁，得的是重伤寒病。

毛泽东非常爱母亲，孝母亲。他对母亲是一贯温顺，体贴周到的。1919年4月，毛泽东送别了去法勤工俭学的朋友门，就打算回长沙，推动湖南学生爱国运动。当他还没有动身时，接到母亲病重已到长沙就医的家信。因此，他于4月中旬从上海赶回长沙省亲。经过一段时间治疗，毛母的喉蛾医治好了，颈痨还要继续治疗，但比以前已减轻多了。后来患了淋巴腺炎，谁料竟于1919年10月5日去世，时年53岁。毛泽东十分悲痛。

1919年10月7日，毛泽东含着热泪在毛母灵前一边哭一边念成了一篇祭文。当时在灵前的还有毛的塾师毛字居、表兄文咏昌。俩人听了十分赞赏祭文，都分别记了下来，后来又在当地人们中传诵。1959年，根据毛字居、文咏昌各自珍藏的记录手稿校正后，刻在石碑上，得以保存。

毛泽东《祭母文》的全文为：

呜呼吾母，遭然而死，寿五十三，生有七子。七子余三，即东民覃，其他不育，二女二男。育吾兄弟，艰辛备历，摧折作磨，因此遘疾，中间万万，皆伤心史，不忍卒书，待徐温吐。今则欲言，只有两端：一则盛德，一则恨偏。吾母高风，首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覆载，恺恻慈祥，感动庶汇。爱力所致，原本真诚，不作狂言，不存欺心。整饬成性，一丝不诡。手泽所经，皆有条理。头脑精密，劈事分情。事无遗算，物无遁形。洁净之风，传遍戚里。不染一尘，身心表里。五德萃萃，乃其大端。合其人格，如在上焉。恨偏所在，三纲之末。有志未伸，有求不获。精神痛苦，以此为卓。天乎人欤，倾地一角。次则儿辈，育之成行。如果未熟，介在青黄。病时携手，酸心结肠，但呼儿辈，各各为良。又次所怀，好亲至爱。或属素恩，或多劳瘁。大小亲疏，均待报贖。总兹所述，盛德所辉。心秉恻忱，则效不违。致于所恨，必补遗缺。念兹在兹，此心不越。养育深恩，春晖朝霏。报之何时，精禽大海。呜呼吾母，母终未死。躯壳虽隳，灵则万古。有生一日，皆报恩时。有生一日，皆伴母时。今也言长，时则苦短。惟挈大端，置其粗浅。此时家奠，尽此一觞。后有言陈，与日俱长。尚飨。

根据毛字居、文咏昌的记录，毛泽东还有两首哭母挽联：

疾革尚呼儿，无限关怀，万端遗恨皆须补；
长生新学佛，不能住世，一掬慈容何处寻？

春风南岸留晖远，
秋雨韶山洒泪多。

40年后，1959年6月25日，毛泽东回到了阔别32年的韶山冲。他来到双亲的卧室。房间左边墙上挂着两个镜框，嵌着两位老人的放大照片。毛泽东站在两帧遗像面前，静静地凝视一会，对旁边的人说：“如果是现在，他们都不会死了。”意思是说，这些病就现在的医学条件来说，都是容易治好的，不会由于那些病症去世那么早。另一个镜框中的大照片是毛泽东兄弟和他母亲的合影。对这张照片，毛似乎很有兴趣，含笑问道：“这是从哪里‘拱出，来的呀？”又说：“这怕是我最早的相片了，你们看，跟我现在像不像？”毛说的“拱出”是湖南土话，意思是冒出。据说，这张珍贵的照片摄于1919年。当时，毛母由毛泽民陪同在长沙诊病，毛泽东从上海回到长沙，于是他们一起合影。毛泽东站在老人坐椅旁边，身穿一件白竹布长褂，魁梧英俊。没有料到，不久即发生了“吴天罔极”的未报之痛楚。

仍是1959年6月25日，毛泽东在那短暂的时间里，曾攀寻茅封草盖的山径，在他父母合葬墓前，献上一束松枝，行三鞠躬致敬，心情沉重地默哀

良久。后来他还对陪同的同志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迷信什么鬼神。但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党、同志、老师、朋友也，还得承认。表达了他对辛苦教导他的父母师友的敬重 [4]。

伟大的母爱，母亲的美德，对毛泽东和周世钊是一样的影响深远。

三 少年

毛泽东与周世钊的少年，都是爱学习、爱劳动的少年。他们在6岁以后，随着终岁勤劳的父母，做些轻微的劳动。稍长以后，在课余时间，就帮助家里放牛、砍柴、挑水，参加各种各样的生产劳动。

毛泽东从小就酷爱读书，8岁被送入私塾。他除了把作为课本的经书背得滚瓜烂熟外，还特别喜爱阅读《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古典小说，这使得他对中国历史有了一些知识，知道了宋江、武松、诸葛亮、曹孟德等各式各样的历史人物。书，开阔了他的视野，丰富了他的思想。

周世钊7岁时，他父亲亲自教他读诵《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他读四书和《三字经》、《千字文》等，都达到能背诵的程度。以后，他又读了《孝经》，又看了《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书中诸葛亮、周瑜诸人的奇谋巧计吸引了他。周又看了一厚本《阴鹭感应篇》。书中每一句本文下面，引注了几十条例证，证明为善得福，为恶得祸，尽是因果报应迷信之谈，写得活灵活现。他幼小的心灵受了这本书的感染，深信鬼神真有，并且随时在监视人们的行动。

1908年的春天，周世钊满了10岁。一天，他的族叔周道腋对他父亲说：“现在科举已废，学校大兴，旧书不必多读，最好进小学去读书。”于是，周世钊到宁乡南村五都都学堂学习，编入初小二年级。班上只有国文、算术是主要课。国文教的是文言文，作的也是文言文。因为他读了几年旧书，作文进步颇快，居然能写出文从字顺的短篇论文和叙述文，得到教师的夸奖。

1969年，周世钊重回南村，心情很是感慨。他看到南村60年后的变化，激动不已，特作有《临江仙·访南村》。

临江仙 访南村

1969年

一别南村逾五纪，重来倍加温馨。穿林过圳到前坪，门墙存旧貌，
师弟换新人。古老穷乡今变样，农民文化翻身。少年气象共峥嵘，读书
先政治，放学又耕耘。

一直到13岁时，毛泽东才离开本地的私塾。他在1950年还给私塾老师毛宇居写信。1959年，毛泽东回到韶山时，曾请一些老人同桌共进晚餐，给各位老人敬酒夹菜，毛宇居老人激动地说：“主席敬酒，岂敢岂敢！”毛随口答道：“敬老尊贤，应该应该。”席间，毛宇居极力称赞毛泽东幼年好学，爱看杂书的情况。那次，毛泽东在欢腾的人群簇拥下来到了韶山学校。韶山学校坐落在毛泽东少年时放过牛的张家山。学校的前身是毛氏族校。1958年，毛泽东为学校题写校名——韶山学校。这时，同学们要求和他一起照相，毛点头同意。少先队员给他戴上红领巾。毛泽东高兴地说：“你们看，我现在又年轻了，又变成少先队员了。”

在毛泽东16岁时，清朝废除科举制度，兴办新式学校。仅几年时间，社会上就出现许多这种被叫作“洋学堂”的新式学校。起初，毛泽东的父亲不愿意让儿子远离家乡去进洋学堂，经过毛泽东的再三要求，并恳托戚族长辈几次向父亲劝说，最后才取得父亲同意。16岁的毛，这才怀着胜利和兴奋的心情，自己挑着行李，随着表兄，第一次离开韶山冲，到湘乡县东山小学校

去读书。

毛泽东来到学校后，认真学习功课，进步很快。那时，小学里把国文、经学两课看成最主要的学科。因毛泽东的文章写得好，经学又有基础，常得到国文教师和经学教师的称赞。同时，他又喜欢看课外书，看得最多的是历史、传记及康有力、梁启超谈论时事的文章。

这时候，毛泽东是一群学生中间最关心时事的人，除阅读新书刊外，还最爱听老师讲时事。有好几回听到校长讲到日本和欧美列强瓜分中国的阴谋时，他又忧虑，又愤慨。本来，他有一个“润之”的字，这时又取一个“子任”的别号，表示要以抵御外侮、保卫祖国为自己的责任。

1909年春天，周世钊考入宁乡县城玉潭高等小学堂，整整学习了四年。学校课程很多，有国文、算术、经学、历史、地理、格致、博物、图画、体操等。周世钊最爱听梅冶成先生的历史课。梅先生思想进步，讲课生动，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每有独见。梅是周世钊在玉潭时最敬爱的教师。

1950年，周世钊奉邀晋京谒见毛泽东。毛曾经满怀深情地对周说：“我虽然是湘潭人，但受的是湘乡人的教育。”可见毛对在湘乡东山小学读书印象之深刻。

1959年，周世钊填词《江城子·过湘乡》：

林霏开后见湘乡，菜畦长，菊篱香。崇构参差碧瓦映朝阳。遥重烟
囱高矗处，人道是，铝工房。东台山下旧宫墙，树苍苍，水泱泱，虎变
龙潜，年少已无双。指点当年游息地，留古塔，放新光。

这首诗下有注：毛主席16岁时曾在湘乡东山高小学习半年。这个学校在东台山下。山上有七层宝塔，塔影常映入环绕校舍的池水中。

1910年，毛泽东同几个同学由湘潭搭小火轮来到了长沙。他第一次来到长沙，看见这里人多、地方大、市面热闹，比韶山冲和湘乡县都大不相同。一切新鲜的事物吸引着他。不久，他考取了湘乡县办在长沙的湘乡驻省中学。

四 卷入辛亥革命的风暴

辛亥革命从武昌爆发的消息传到湖南后，毛泽东心里非常兴奋和激动。他想，革命就要打仗，当兵是最实际的革命行动。他决定退出湘乡驻省中学，前往武昌投革命军当兵，走上革命的最前线。正当他约好同伴，准备启程的时候，湖南的革命党人和新军合作，赶走了抚台，宣布独立，并且发出招收新兵，支援武汉战事的通告。他很高兴地取消了远走武昌的计划，就在长沙报名入伍，当上了革命军〔2〕。

这一年，毛泽东刚刚 18 岁，身体还比较单薄。他迫切地想学好打仗的本领，也迫切地想把身体锻炼好，所以他下操很认真。仅仅几个月的时间，已经把当时军队里的一套基本训练搞得很熟，做军中勤务也成了习惯。

新兵每月饷银七元，毛泽东除付伙食费外，就把剩余下来的钱买书、订报。他抓紧时间学习，一刻也不肯放松。尤其是他对研究时事的兴趣比过去更加浓厚。

后来，建立了中华民国，新兵不要开赴前线打仗了，毛泽东就队新兵连退出，考入湖南第一中学。

1911 年上半年，周世钊所在的玉潭高小，全校师主都遵照满清规定结辫子拖在脑后。暑假前夕，周世钊受革命党人宣传影响，与同学数人同时剪掉辫子。暑假回家，乡人都视为怪异。辛亥革命爆发后，周世钊兴奋之余，仿骆宾王《讨武曌檄》写了一篇《讨满清檄文》，教师看了，认为模仿还有几分相似。

1911 年的 10 月 20 日，湖南驱逐了满清巡抚，宣告独立，同时招募新军和学生军，准备支援武汉。玉潭高小在这种形势下，师生都感到十分兴奋，纷纷作革命讨论和宣传，再也无心上课。

周世钊趁着学校停课，想到长沙看看，特别想参加学生军。同班同学张益三也想到长沙去，于是两人结伴同行。到长沙后，寄住宁乡中学张的族兄张先湘处。

当时的长沙市容虽不整洁，但比宁乡热闹多了。周世钊第一次来到长沙，觉得一切都很新鲜，他和张益三花了两天工夫，走遍了八角亭、坡子街、青石街几条商业繁荣的街道。找到学生军驻扎的地方，要求报名参加，负责人认为周世钊年龄太小，不能接收。周世钊只得放弃参军的打算，又回到宁乡。

辛亥革命，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页。它推翻了清工朝在中国的封建专制统治，对中国社会发展和世界文明历史都有重大意义。毛泽东与周世钊，年十五六而有志于救国，毅然卷入了辛亥革命的风暴中，接受了革命斗争的洗礼，在少年的心灵上深深刻画着“国家”、“民族”、“斗争”、“革命”等概念。

第二章 同窗学子

青年，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可珍贵的时间。在这个时候，精力最充沛，求知欲最旺盛，敞开一颗纯真的心，求索知识与探索人生。

1913 年春天到 1918 年夏天，毛泽东和周世钊在湖南第四师范和第一师范同班修业了五年半，同到毕业。

毛泽东和周世钊，住在一个宿舍，上课在一个教室，自修时在一张桌子上，他们读一样的书，听共同的老师讲课，吃一样的饭，参加同一个青年组织——新民学会。他们因品学皆优，同样为全校师生所崇敬，在“人物互选”中，毛泽东第一，周世钊第二。

这个五年半，他们都处在风华正茂的 20 岁左右。毛泽东是从 20 岁到 25 岁，周世钊是从 16 岁到 21 岁。20 岁左右，正是人们世界观、人生观形成的岁月，将对人的一生产生重大影响。1950 年，毛泽东在北京的中南海对周世钊说：“我没有正式进过大学，也没有到外国留过学，我的知识，我的学问，是在一师打下了基础。一师是个好学校。”

一 一见如故

在湖南第一中学，毛泽东仅仅读了半年，因为交不起学费又退学了，以后在湖南省图书馆自学了半年多。

1913年的春天，毛泽东在报纸上看到省立第四师范招生广告。他想：师范学校毕业后，办教育，当教师，是有益于人民，有益于人类的事情；这个学校不收学费、膳食费，又符合自己当时无钱交费的具体情况。过了几天，他报考后被录取了。

同时，周世钊小学毕业后，不知如何是好，正在日夜焦虑。忽然一天，有人给他一张湖南省招收师范学校学生的广告。他仔细一看，这个学校以培养合格的小学教师为目的，预科一年，本科四年，共五年毕业，不收学费，也不收膳食费，还补贴一部分制服费。他看完后很高兴，想到家里人口多，田地少，尽量节省，才勉强能度日，要让他升入要花钱的学校是不可能的。但广告上说明每县名额很少，大县四名，中县二名，小县一名。宁乡县当时是中县，只有两个名额，他想，他有什么把握战胜全县高小毕业的五六百学生呢？谁料他在县里初试居然被录取，共计四名。三月初，他又到了长沙，住入贡院东街杨氏试馆，在全省师范参加了复试。头一场复试国文，题目是：“孔子以六艺教士，与今教育宗旨是否符说”。试场监考是王季范先生，王看了周写的大半页文章，带笑点头，似认为文对了题。接着，考了算学、史地几科。七天后复试取录榜发出，宁乡的周世钊和王熙均正式录取。周世钊将行李从杨氏试馆搬入学校，编入预科第一班，从此，周世钊成了正式的师范学生。

此时，学校不叫全省师范了，校牌写的是湖南省立师范学校，也叫湖南第四师范。他们预科第一班的50人中，年龄最大的28岁，最小的15岁，周世钊16岁，毛泽东20岁。

上了几天课后，教师和同学之间都有了些认识。第一班的学生中，个子最高的是易昌陶、王光，次之就是毛泽东和周世钊。毛泽东是班上大家注意的一个同学，他态度谦和，最喜和同学讨论问题。毛泽东也喜欢和周世钊讨论问题，这一对友人从此见了面，认识了。

他们有着相似的经历，穷乡僻壤的童年时期，私塾、小学的学习生活，辛亥革命对心灵的激动。他们有着许多共同语言，所以在此以前，他们也可以说是一对未见面的朋友，因此能够一见如故。

周世钊在和毛泽东的接触中，知道毛泽东曾读过几年私塾，阅读过四书五经，又读了很多旧小说和时事小册子，后来还参加了几年农业生产劳动，进过高小，又读过两个中学，当过半年多时间的兵。周世钊认为毛泽东的见闻最广，学识最博，常将自己不能解决的问题找他认真商讨。当时学校无正式校舍，是租了一栋民房创办的，看报必须到学校阅报室。毛泽东每天课后必到阅报室看报，星期天必到湖南图书馆看书，他争分夺秒地学习，成绩超出其他同学。

当同学聚在一起时，常把学校设备不好作为谈话资料，有些人还埋怨自己进错了学校，毛泽东不愿参加这种谈话。有一天，他对周围几个同学说，学习当然需要适当的条件，但最重要的还是自己的努力，假如自己没有认真学习的决心，没有刻苦钻研的精神，纵然学校设备十分完好，学习条件十分优越，也不可能得到很大的收获。古代不是有“囊萤”、“映雪”一类的故

事吗？只要有他们那种苦学的精神，条件再差也是可以学好的。我们这里，有房子居住，有教师教课，已经具备了学习的基本条件，下一步就要看我们自己的努力如何了。假如一定要等到学习条件完全具备才认真学习，就要白白糟蹋很多宝贵时间。毛泽东不但是这样说的，而且是这样做的。他每天认真听课，认真自修，大量的读报看书，到朋友处借书看。一年之间，他读了好几种文学、史学的名著，写了好几本读书笔记，学习收获很大。

由于师范学生绝大多数出自贫寒的家庭，对学校艰苦生活能很快适应，对课业学习比较刻苦认真。不过因资质有高下，方法有好坏，收获就有差别。周世钊在前半年中仅仅是将所授课业抓紧复习，没有阅读多少课外书刊，收获不大。

1914年春，全校同学已经到齐，等候上课，但学校发生了一件谁也没有预料到的困难。由于学校是租赁民房创办的，原拟在岳麓山建筑新校舍的计划又迟迟未能进行，此时不但招收新生无地可容，即使旧有七班学生也挤得不成样子，学校当局急谋加赁大栋民房以解决目前困难。恰好长沙师范校长徐特立先生以学校经济困难，决定将学校迁到城隍庙，而把荷花他的校舍出租，每月以租金维持学校。第四师范校长陈润霖和省立一中校长胡定一均争取租赁长师校舍，结果一中捷足先登，先行签订租约，第四师范的学生大为失望。这时，毛泽东倡议，最好将校具搬进长师，占了校舍，再与长师和一中理论。于是几班预科学生全体动员，将各班课桌久肩负手抬，络绎街道，一日之间，占领了全部长师校舍。

湖南省议会忽然通过一个决议，将第四师范与第一师范合并，全体教师和学生均迁入一师。省议会这种决议本来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但也是教育界派系斗争的结果。第四师范校长陈润霖是辛亥革命后第一任湖南省教育司司长，是谭延闿一系人物。谭下台时，陈也辞去教育司司长职务，而自任命力全省师范校长，接替教育司长职务的是易克果，他是北洋军阀系统里面的人物。当时一中校长胡定一，一师校长张干都是易系人物。因四师没有校舍而把它与一师合并，当然出于他们的主张，借此推倒陈润霖的校长。他们看来，是绝妙的计策，是如意的算盘。

第四师范的预料三个班，讲习科四个班共三百多人，连同教师数十人合照了相，留作纪念，当然有毛泽东和周世钊。创办一年的第四师范就这样结束了。

问题还没有完全结束，第四师范预料三个班的编班又成了问题。原来一师的甲班（第一班）已毕业，乙班两个班（第二班、第三班）、丙班两个班（第四班、第五班）、下班两个班（第六班、第七班）共六班学生仍在学。丁班学生是1913年秋季招收的，而四师预科是1913年春季招收的。四师迁入一师后，校长张干把原来的丁班排为了一班、丁二班，而把四师三个班排在它们后面，称为三班、丁四班、丁五班。无形中把四师学习时间延长半年。原四师学生派代表到教育司去争论了一回，但毫无结果，只好忍气听其安排。不久，下一班改称第六班，丁二班改称第七班，丁三班改称第八班，丁四班改称第九班，丁五班改称第十班。毛泽东和周世钊都在第八班，直到1918年毕业。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地处长沙南郊的书院坪。学校前临湘江，对岳麓，后倚妙高峰，接近老龙潭，左边是粤汉路，右边是长沙城，居高望远，风景清佳，又因接运农村，很少市尘的喧扰，构成了良好的学习环境。

二 老师与校长

在第四师范中，教国文的袁大胡子名仲谦，字吉六，态度特别严厉，常用教鞭敲同学的脚，但教课很生动，能引人入胜，批改作业也很认真。

后来，第四师范并入第一师范，教国文仍是袁大胡子，教哲学的是杨怀中先生，教修身的是徐特立先生，这些老师都是毛泽东和周世钊所尊敬的老师。

周世钊的作文常被袁先生令重钞传观，并在一次作文批语中说，文有庄子气息。有一天，袁先生到自习室巡视，看见周世钊在阅读礼记注疏，大为不满。认为看这些注疏会影响作文，使文字无雄健畅达之气。袁先生叫周世钊立刻停止看这些东西，因为袁先生是教学生学桐城文的，周世钊只好将从图书馆借来的注疏交还了。

有一次作文，是在教室里作的，限两小时交卷，袁先生始终监临等待交卷才高教室。袁先生常走到行间巡视学生作文，他很重视毛泽东的为人和文字，看到毛已写了大半页文章，但在题下用小字注了“民国X年X月X日本期第一次作文”一句话，袁先生大不满意他说：我的题目上面没有的字不要写上，囑令毛撕去改写。大约又过了半小时，袁先生又巡视到毛坐位边，见毛未改写，生了气，拿起他的作文本，将已写了两页作文撕去，教毛从头写过。这样一来，引起了毛的愤怒，立即站起来，责问为什么撕坏他的作文？要同他到校长室去辩论。这样相持良久，袁先生无话可说，悄悄走开，毛泽东才坐下来，将撕去的作文重抄一遍，继续写完这篇文章，题目下面仍用小字注出“民国X年X月X日本期第一次作文”字样。

一师教师中有特别为同学们所敬爱的如杨昌济、徐特立先生。他们不但勤勤恳恳，诲人不倦，传授学生以丰富的知识；更重要的是他们以艰苦朴素的作风，笃实真诚的品质，感染同学，这点感人最深。

一师同学大都出身贫苦的家庭，能刻苦向学。同学们受到杨、徐等先生的教育后，有不少人更能激发志气，勇猛精进，希望自己成为拔出流俗、有理想、有作为的人物。

毛泽东、周世钊生活在这种环境中达五年半之久，濡染既久，影响自深，因而有了比较强烈的上进要求。

一师同学尊敬徐特立，也爱听徐特立的话。徐特立常常悦，读书应守少字诀，读一页就应熟一页，读一书就要通一书。贪多求快，纵读得多，终将一无所得。有的人吃饭也看书，睡眠时间也看书，实际上将一无所得。他说，我有一个原则，不动笔墨不着书，书中重点常用笔勾画出来，或加圈加点，眉头上还写适当的提要或批评。

在徐特立的谆谆教导下，毛泽东、周世钊等同学读书贪多求快的作法有所改变。特别是毛泽东，他读书有“四多”的习惯，“四多”就是读得多，想得多，写得多，问得多。这与徐特立的教导相符合。毛泽东在上课时讲有课堂录，自习时有读书笔记，每夜还要写日记，另外还有摘抄本，以抄录书中精粹的理论，甚或抄录全篇。他所抄《离骚》全篇，至今仍保存在第一师范。

杨昌济先生在一师时，初教修身，后教哲学。他以《达化斋日记》、《论语类钞》、《伦理学原理》等为教材。他的哲学思想是唯心主义的。他热爱他的伦理学，希望以之培养有高尚远大理想的人物。他在上课时有一句常说的活：“没有理想的人是庸俗的人。”这是一句感人很深的话，毛泽东、周

世钊等多数学生都长期不能忘记这句话。

毛泽东、蔡和森、张昆弟等学生常到杨昌济家中讨论哲学问题。杨对他们鼓励备至。他写的诗中有“强避桃源作太古，欲栽大木往长天”之句。他常常勉励学主要有改造社会和国家的远大抱负。要有实事求是、刻苦实践的精神。他还说：“人属于社会，则当为社会谋利益。”

其他的一师老师，如黎锦熙、王季范、方维夏等也是毛、周所尊敬的老师。

从第一师范毕业以后，杨昌济成为毛泽东的岳父。杨昌济的儿子杨开智和周世钊解放后在湖南省政协共事，并且成为朋友。徐将立在1927年入党后基本上和毛泽东在一起战斗。解放后，徐特立和周世钊有很多交往。1958年，周世钊著的《我们的师表》由北京出版社出版，书中写的就是徐特立的故事。在文革期间，周世钊去北京曾较长时间借寓徐特立与王季范家中。王季范系毛泽东的姨表兄，他和周世钊的关系甚为密切，他的孙女王海蓉对毛泽东和周世钊都十分尊敬。黎锦熙在解放后与毛泽东、周世钊都有来往。文革后期，他还将其《预立遗嘱》寄给周世钊，可是他比毛、周都活得长。他是1978年在北京去世的。

方维夏在一师先后担任博物、农业教员及学监、学监主任。他痛恨袁世凯的独裁统治，拥护孙中山的主张，为人公正，品德高尚〔4〕。

一师校长张于是中路师范毕业的学生，原在一师教数学，当校长时年仅30岁。他为人精明强干，言词善辩，又好社会活动，特别是交结官府。同学们对他一味奉承政府指挥，对学校工作没有什么建树，感到很不满意。他是湖南新化人，一些熟悉他家庭情况的新化同学每每批评他待兄嫂侄子刻薄寡恩的事情，更引起同学们的鄙薄。

有一年六月初，湖南省议会忽然决议：全省师范，自本年秋季开始征收学生杂费每期十元。这个决议在报纸上公布后，引起全校学生的愤怒，大家七嘴八舌都说，这是张校长为了讨好上面而建议的。一夜之间，这种说法传遍全校，特别是第九班有几个胆大性躁的同学，在聚商之后，提出全校罢课，以达到推翻张校长的目的。次日凌晨，派人与其他班商定：除第二班第三班修业满，为避免妨害他们的毕业考试外，自第四班至第十二班即日全体罢课，并推第四班王姓同学草拟了罢课宣言，历数张校长的私德如何不好。

大概是上午十时左右，油印的罢课宣言已经发到每人手中。当时，周世钊和毛泽东都在传达室门外看这份宣言，毛泽东感觉这个宣言写得不好，于是对周世钊说：“这个宣言指责张干的私德的话太多，说他对兄嫂不好，对侄子不好；而对办理学校不好人说得太少。我们罢课是反对他当校长，不是反对他当家长，这个宣言实在文不对题，起不了什么作用，我与你去写过一份如何？”周世钊胆子小，怕惹祸，只好说：“你一人就可以写好，不必我去。”毛泽东一个人拿着纸笔走到校后山上君子亭，只花了一点多钟就写成了一篇内容充实、气势磅礴的《驱张宣言》。毛泽东将写成的稿纸交给王柄同学，叫他商得罢课组织主持人的同意，连夜守在石印局印出近千份，分发校内校外，特别是教育司、省议会、省政府以及省垣大中学，唤起人们认识张的可驱，课的可罢，使官厅对张的失职有所知晓，这篇宣言的确起了很大的作用。

罢课持续了六七天，教育司才派了一个督学来校处理。罢课主持人通知各班同学：准备回答督学提的问题。毛指挥每人都写好一张“张干一口不出

校，我们一日不上课”，或“张干一离校，我们就上课”，并写上班次，签上自己姓名的条子，持在手中，等到集合听督学讲话，征求大家意见时，即将所写条子交值周生送给督学。督学见无别的办法，只好当众保证张校长下学期不再来校，并劝同学们上课，结束这学期期考。因为这时已是六月中旬，只有两个星期就要放假了。同学们认为罢课已经胜利，遂同意宣告复课。

但是等到同学暑假离校回家以后，张干却经过一段调查（主要依靠一部分新化同乡学生的告密）之后，开了一个全体教职员会议，打算开除二十来个与罢课风潮有关的学生。毛泽东也在名单之内，经王季范、杨昌济、袁吉六诸先生力争，才将他的名字涂去。张干还是给毛泽东记大过的处分，最后确定开除了17个同学，其中最不合理的是把那天送意见条给督学的值周生全部开除了。

毛泽东、周世钊在一师的最后两年，校长换了孔昭绶。他是第二次任一师校长的，第一次任一师校长的时间很短，被政府把他作革命党缉拿，化装逃脱，此次重任校长，想把学校整顿一番，故尔采取了一些比前任几个校长较得学生欢迎的新措施。

首先，孔昭绶率领学生修操场。一师的操场原来只有校墙外隔街道一块不到一亩的荒坪，孔校长见学校后山上可辟成操场，因此号召全校组织志愿劳动队，负责修理操场。毛泽东、周世钊首先响应参加。同学五六十人继续报名，组织了志愿劳动队，每日下午课毕，队员争先恐后去挖土运土，历时两月，辟成了广阔平坦的操场。在这两月中，孔校长也参加了30多天的劳动。

此外，孔校长还组织了学生军。为了使学生有比较好的军事训练，除学校课程中原有的军事课之外，他又于1917年春组织学生军连，以军事操教师雷先主力连长，学生分任排长与班长，没有真的枪支，就以军事操课用的木枪作练习的武器，每周练习两次。毛泽东、周世钊很赞成这种组织。毛泽东在连里任秘书，实际上是主持了全连的活动计划。

孔校长的新措施中还有“人物互选”及“改组学友会”等。

三 注重身体锻炼

1914年后，一师的课程更繁重了。每天上课至少六小时，有两天（或三天）每天上课七小时。杨怀中先生教修身课，他看到学生的课业太繁忙，必致妨害健康。于是，他在教课时提出三种保健方法，一是废止朝食，二是冷水浴，三是静坐，这几种方法同学多不能做，只有毛泽东，三样都能照着实行，但后来感觉废止朝食有困难，对静坐提出不同的意见，曰：“盖天地惟有动而已矣。”唯冷水浴则始终坚持下来。

毛泽东的冷水浴是，他天将明即时起床，披着衣，带着浴巾，走到浴室旁边的井上，脱掉全身衣服，用吊桶从井中将水吊上，一桶一桶地向全身淋洗，淋一阵用浴巾擦一阵，擦得身上发红发热，擦一阵又淋一阵，这样交替搞到二、三十分钟，再穿好衣服，到操场跑步或做其他运动。等到天已渐明，就跑入自习室读书。他的冷水浴从夏天做起，一直做到严冬，下雪结冰的天也不间断。同学问他：“冷水浴究竟有什么好处？”他说：“冷水浴的好处很多，不但锻炼身体，强筋骨，抗风寒。还能培养勇敢与不畏惧。你们试想，严寒时，清早起来，将冰冷的水向身上淋下去，不是有一定勇气的人能做到的吗？”于是也有好些同学跟着他做，一时成为风气。

在杨先生的提倡鼓舞下，毛泽东除冷水浴外，又有日光浴、风雨浴、爬山、远足、游泳、露宿、拳术诸项锻炼方法，夏季赤日当空时，他常站在太阳下许久，让烈日照晒，有时赤膊晒太阳，或游泳后睡在沙滩上久晒太阳，称为日光浴；有时大雨，他站在露天下，让大雨淋洒，叫做雨浴；冬天朔风凛冽，他单衣立在山峰上让寒风久吹，称作风浴。

有一次，毛泽东和蔡和森同学冒着大风大雨，不用伞和其他雨具登上岳麓山，淋得全身透湿。又回到蔡家座谈甚久才回到他那时寄居的半学斋。后来，杨先生称赞他们这种勇敢的行动，认为合于尚书称舜“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的精神。毛泽东锻炼身体使其健强、能抗风寒、战艰巨，因然是他的目的；更重要的目的还在于锻炼坚强的意志与无所畏惧的精神。张昆弟同学曾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毛蔡二君炼身体与炼心同时并重。”的确如此。

周世钊的身体并不强壮，看了毛泽东的榜样，不能跟着学。他除参加学校的体育课和课间操之外，仅仅和同班同学偶尔踢踢足球而已。他终日忙于校课和故纸堆中，可说成了死读书的书呆子。他又到书店买了《韩非子》、《荀子》和《船山遗书》中的《资治通鉴论》、《宋论》等，日夜困于披阅，更无暇搞体育锻炼了。

四 刻苦学习

第一师范是在南宋时张南轩讲学的城南书院旧址建立的。清朝末年在此设立中路师范（当时湖南分为三路，长沙、宝庆、岳州三府叫做中路：衡州、永州、郴州三府及桂阳州叫做南路：常德、沅陵、辰州、沅州等叫做西路，每路都设男女师范各一所）。1910年长沙饥民暴动，校舍毁于火，辛亥革命后，新建校舍，并命名方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新校舍规模不大，只能容六七百人，但结构形式很好，据说是设计者廖名楷仿照日本青山师范画图的，很便于学习。

四师并入一师后，周世钊订了一个读书计划，想用几年功夫多阅读一些文史，并初步学好写古文和旧诗的本领。因此，首先到旧书店买了一部《史记》、一部《古文辞类纂》，又在图书馆借了《资治通鉴》，除对庄子继续研读外，主要就是看《史记》和熟读《古文辞类纂》中的韩、柳、欧、曾及三苏的文章。学校课程很繁重，他对于自然科目如数学、博物、理化只好采取应付态度，至于图画、音乐、手工等则尤认为无关学问，常置之不理。只对学校课程中的国文、历史、地理和哲学、修身比较感兴趣。

毛泽东原来好读康梁著作，文章也学梁启超那样条达流利、畅快淋漓，但因袁先生的劝告，特地买了一本韩昌黎诗文全集，他又到图书室借了一部版本好的韩集来校正错误。毛泽东用殊墨两种笔改正伪误，补好缺漏，每读一篇，先用蛛笔圈点。如发现圈点有错误，再用墨笔涂改。他看书时喜发议论，有些文章加以浓圈密点，在书头上加以“此论甚精”，“此语甚合吾意”等批语。有的文章，加以直杠大X，甚至全篇像画棋盘一样纵横几笔涂去，又加“不通”、“岂有此理”等批语〔5、6〕。同是韩文，是非好丑他是必然把它划分清楚的。他每早冷水浴和体育运动之后，自修室刚有熹微的晨光，他就站在窗边，就东窗射进来的光线高声朗诵他所爱好的文章。等同学相继入室后，他才坐在自己的位子上继续朗诵。很多文章他已读得很娴熟，可以流利地背诵，还不断反复地读，以体会它的神味和气势。坐在旁边的周世钊等同学们听他读得大多了，差不多也背得出来了。

有些早晨，毛泽东不读韩文，专读英文，也要求读到能背诵出来。周世钊在毛泽东的影响下，每早起床比较早，也跑到自习室读《古文辞类纂》里面的文章，几年之中读熟到能背诵的文章将近两百篇。

毛泽东和周世钊在第一师范时期的学习，特点之一是独立思考，批判地继承。他们认为，对待古代文化和中西学说，不可不加分析地兼收并蓄，应该有分析、有批判。

毛泽东的这种独立思考，分析批判的阅读态度，在他阅读过的《伦理学原理》一书中被保留了下来。他对这本书的批语，反映得十分清楚。这本书是德国的康德派哲学家鲍尔生著的一都带有二无论色彩的伦理学著作。全书的中文译本约有十万字，毛泽东在书上写了12000字的批语。凡原著中比较合乎辩证、唯物观点的地方，必密加圈点，眉批则往往有“切论”、“此语甚精”、“此语甚切”、“此语与吾大合”等语。对原著的否定和怀疑之处极多，其批语是：“诚不然”、“此不然”、“此节不甚当”、“此处又使余怀疑”、“吾意不应以此立说”、“此说终觉不完满”等。绝大部分批语是阐述自己的伦理观、历史观和世界观。其中许多地方是联系中国的历史的“五四”运动前夕的国事和思潮，进行分析对比、综合研究所阐发出来的深

刻见解。由于当时历史力局限，还不是所有的批语都完全正确，但处处充满追求真理和改革国家社会的精神，独立思考的学习方法，深力周世钊等同学所折服。

《伦理学原理》一书的原件，在毛泽东移居清水塘时的 20 年代初，他的一师同学杨韶华将这本书借去阅读。此后各自东西，未曾见面，书也未还。将近 30 年后的 1950 年 9 月，周世钊应毛泽东之邀去北京参加国庆观礼，杨同学托周世钊把这本书带去北京，奉还给毛泽东，使其物归原主。杨在该书的扉页上写道：“此书系若干年前，毛主席润之兄在小吴门外清水塘住时所借阅。嗣后，各自东西，不复谋面，珍藏至今，深恐或失！兹趁周惇元兄北上之便，托其奉还故主，藉镜（？）当时思想之一斑，亦人生趣事也。”[7]

1950 年，毛泽东和旧友重逢，又喜获原书《伦理学原理》，高兴地翻阅了自己写在书上的批语后对周世钊说：“我当时喜欢读这本书，有什么意见和感想就随时写在这本书上。现在看来，这些话有好些不正确了。”

毛泽东又说：“这本书的道理也不那么正确，它不是纯粹的唯物论，而是心物二元论，只因那时我们学的都是唯心论一派的学说，一旦接触到一点唯物论的东西，就觉得很新颖，很有道理，越读越觉得有趣味。它使我对于批判读过的书，分析过所接触的问题得到了新的启发和帮助。”

接着，周世钊要求将《伦理学原理》再赐予带归时，毛泽东表示不同意。幸而这本书在长沙托周世钊转送时，当时的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部长李锐闻知此事。他颇为重视、首先手抄一些评语，最后因上车时届，只能照相全书。

毛泽东逝世后，《伦理学原理》中的批语公开发表了。这些还成为研究毛泽东早期思想的重要文献，当然也是毛泽东早期刻苦学习的物证。

五 社会活动的起步

在第一师范求学期间，毛泽东、周世钊在注重锻炼身体，刻苦学习的同时，还非常重视在社会活动的实践中增长才干。增长改造中国和世界的的能力。在一师的几年中，他们取得了最早的社会活动经验，是社会活动的起步。毛泽东初步显示出杰出的组织才能。

1915年，窃国大盗袁世凯，在刺杀宋教仁，罢免长江三督，把国民党的人物驱除净尽之后，就自封为终身总统。他为爬上皇帝的宝座，唆使奴才提出国体问题的讨论，派北洋军阀汤芑铭做湖南督军。接着，他想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援助，“欣然同意”日本1915年5月7日提出的21条亡国条约的最后通牒。

这时全国民心愤怒，议论沸腾。报刊上也经常出现反对帝制的文字。梁启超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尤为读者所注意，众议院议长汤化龙也发表反对帝制的文章。特别是袁世凯承认日本亡国条约被报纸揭露后，全国人民同声反对，群起抗争，要求废约。袁世凯却悍然不顾，仍指使他的死党组织筹安会，发动劝进活动。

湖南督军汤芑铭是袁世凯死党，组织筹安分会，唆使奴才们上表劝进，同时禁止反袁言论，搜捕反袁的人，于是长沙市某工厂上表劝进自称厂长臣，某学校上表劝进，自称校长臣，种种怪人怪事，纷纷呈现。

第一师范教师中也有参加筹安会的，也有附和劝进的。毛泽东、周世钊看了这种情形，认为必须坚决反对，特别要造成群众反对帝制的舆论。毛泽东秘密搜集了梁启超、汤化龙等人反对帝制的文章，编印一本《汤梁二先生对时局的主张》，秘密分发校外，看了这个小册子的人，提高了认识，坚定了反对筹安劝进的帝制派的决心。一师教员廖名缙曾在船山学社讲学，也反对帝制，但在一师课堂中又向学生宣传帝制，学生走告徐特立，徐在当夜即以学生名义写了一封信给廖，其中有一段这样的话：先生在船山学社反对帝制，而在我们学校又宣传帝制，一人之身，两种面目，吾辈今日无以为报，将有机会时，当不忘先生之赐也。廖接信后，再不敢宣传帝制了。有一个地理教员草泽衰也是帝制派，参加了筹安会，在汤芑铭主持的表决国体问题的会上投了赞成帝制的票。当他上课时，同学质问他为什么要投这一票？覃说：帝制是上面早已决定，大势所趋，我不投这一票，也无法改变。他刚说到这里，班上一个同学就站起来对他说：你的一票固然无关大体，但你不去投这一票，也还可以表示中国还有你这个人。覃听了后面红耳赤，不敢出声。在毛泽东、徐特立的鼓励引导下，一师学生反对帝制和帝制派人物的空气十分热烈，为全市各校之冠。汤芑铭也怀疑《汤梁二先生对时局的主张》那本小册子出自一师，派人率领几十个武装兵到校检查，因毛泽东早已安排妥善，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痕迹，只好悄悄离去。

当时日本看到袁世凯承认了21条，气焰嚣张，在东北和山东一带为所欲为。袁世凯的北京政府俯首贴耳，不敢稍忤其意，简直比石敬瑭儿皇帝的卑屈还有过之。毛泽东认为袁世凯必须打倒，21条必须废除，他提笔在一本《明耻篇》的卷面写了“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几句话表明了毛泽东倒袁抗日的坚决意志。周世钊也认为要寻找挽救国家民族危亡的途径。

1917年，毛泽东与周世钊认为要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必须有一批志同

道合的同志，结成一个坚强的组织。于是他们就物色青年。1918年4月，他们第一批参加了新民学会。

第一师范的学友会，原来是以校长为总务，教师为各部部长。教师多忙于自己的工作，无心顾及部务，因此各部的活动开展得很少，学友会名存实亡。

1917年秋季开学后，学友会已届改选，毛泽东向学校建议，学友会实际是学生会，应由学生组织，一切活动应由学生自行主持。这个建议得到孔昭绶校长的同意。

于是，毛泽东修改学友会的章程，准备改选，他认为一师学生读死书的风气应该改变，所以起草会章时特别注意体育活动和培养研究精神。在总务下分设教育研究部、文学部、美术部、体育部、讲演部等。章程经学校批准，才进行选举。

选举结果，毛泽东任总务兼教育研究部部长，聘请杨昌济为教育研究部指导教师。毛泽东除督促各部积极开展活动外，召开了一次教育研究部的会议，决定创办工人夜学。毛泽东在主持学友会会议时，先是尽量听取大家的意见，很多互相对立的主张，辩论很激烈，他从不插话，不表示可否，等到所有要说话的人都说够了，然后再提出自己的看法，把各人正确的意见总结起来，作出决议，大家都表示同意。毛泽东在学生时期就表现了领导的才能。

学友会设有记事录，毛泽东亲自填写。凡各部活动都摘要记载，无一日间断，有时还加以评议，以督促有缺点的各部向有优点的各部看齐。

学友会改选中，周世钊被选为文学部部长。文学部分国学、英语、日文三组。据周世钊回忆，文学都还有诗歌组。国学组聘请傅熊湘先生为指导员。傅先生字君剑，湖南醴陵人，参加南社，常在《大公报》发表诗作，颇有诗名，他每周进行一次指导。英语组聘请镜伯斯（美国人）为指导教师。

六 第一名和第二名

毛泽东和周世钊在一师读书时，一直受到许多师友同学的爱戴。

在第一师范，毛泽东一直好学不倦，善于钻研，他克己严谨，言行一致，作风谦逊，有伟大抱负；同时他富有反抗封建专制的精神和非凡的胆识与机智，有一种特殊的领导和创造才能，有着一一种令人心悦诚服的吸引力量，先生们认为他是“异才”，是“伟器”；同学们认为他是“智囊”，是“怪杰”[5]。

毛泽东和杨昌济先生之间关系深切，由于杨昌济的赞助，杨的女儿杨开慧和毛泽东通过长时间的交往，使他们于1921年在长沙结成革命伴侣。

周世钊的刻苦学习，炽烈而顽强的好学精神一直为师友同学传诵，他为人温和敦厚，待人赤诚，尤其他爱好文学，具有文才诗才。

有一天，袁仲谦先生把周世钊叫到他房里，问他订婚没，以后又说：“我的庶母有一个女儿，与汝年龄相当，性青也好，汝可写信问问父母，看可否结为婚姻？”周世钊只好唯唯而退。过了一段时间，袁先生又问及此事，周世钊确实年龄太小，只好推说，父母认为我年龄大小，暂时最好专门读书，婚姻问题可以缓谈，此后袁先生也没有再提此事。

毛泽东、周世钊深受同学们的爱戴，莫如从“人物互选”这件事中可以看出，这是1918年的《一师校志》上有详细记载的。

1917年，学校当局设有一种考查学生学业与操行的办法，称作“人物互选”。选举内容与办法如下（6）：

选举范围包括三个项目：（一）德育：敦品（敦廉耻、尚气节、慎交游、屏外诱之类），自治（守秩序、重礼节、慎言笑之类），好学（不缺课、勤温习、好参考之类）；克己（绝嗜欲、耐劳苦之类）；俭朴（菲衣食、尚俭约之类），服务（重公益、勤服务之类）。（二）体育：胆识（冒险进取、警备非常之类），及卫生、体操、竞技等。（三）智育：才具（应变有方、办事精细之类）；言语（长于演讲、论辩、应对之类），及文学、科学、美育等。

选举办法是：在学期中的一天课后，各班学生在各自的教室举行，每人至多可以投三票，每票选举一个人。“各举所知将考语事实评注票内；被选举人与考语有数项相合者；可列举数项，务必名实相副。”被选举者可不以本班为限，但事实上各班学生多选本班同学，因外班的不熟悉。

《一师校志》上记载的1917年7月的选举，全校共12班学生，575人，毛泽东和周世钊都在第八班。在“人物互选”中，被选者要满5票才能当选。选举结果，全校有34人当选，票数第一的是毛泽东，获49票；票数第二的是周世钊，获47票。超过40票的就只有毛周两同学。票数第三的是邹彝鼎，获35票；票数第四的是张昆弟，获34票[4]。

毛泽东得的49票包括德育、智育，全部同学中，只有六人包括了德育、智育，其他的只有德育、智育或体育之一。德育、智育中包括的细目，也以毛泽东力最多，共有敦品（11票），自治（5票），文学（9票），言语（12票），才具（6票），胆识（6票）等六项。其他当选者所占的细目，最多的为周世钊，有四项。而具有敦品项目者，除毛泽东外，只有三人；具有才具项目者，除毛泽东外，只有一人，而言语与胆识两项，其他当选者无一人具备。除毛泽东、周世钊外，其他当选者的细目，大体都是具有文学、英算、

图画、竞技等一技之长的。

周世钊也包括德育、智育两个方面，总计为 47 票，与毛泽东相差两票。它们的分布是：敦品 5 票、自治 9 票，文学 22 票，好学 11 票，他的文学票数是全部当选者中最多的。

我们可以看到，在 1913 年到 1918 年的五年半中，毛泽东与周世钊不仅学到了许多课本知识，而且在“向上”与“求友互助”方面有所认识，从他们的言和行看，他们在热切地追求进步，探索革新，但对如何进行，尚不十分明确，在继续探索着。他们愿意为救国救民贡献力量。他们朝气蓬勃，办事认真，学习刻苦，砥励品行，是两个很有希望的青年。

1936 年，毛泽东在陕北与美国友人斯诺谈话时说：“我在这里——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经历了不少事情。我的政治思想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我最早的社会经验也是在这里取得的。”在第一师范，毛泽东学会了革命活动的一些方法，同时形成了革命救国的思想。

解放后，周世钊回忆，他在一师学习的五年半，仍旧是受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教育。由于教师的鼓励，同学们的感染和小学学习的基础，他差不多完全沉浸在古文和诗词的钻研中。当时，他用功最多，感兴趣最深的几本书是《诗经》、《庄子》、《韩非子》、《史记》、《资治通鉴》，陶渊明、杜甫、白居易、苏轼、陆游诸人的诗集，韩愈、柳宗元、欧阳修、归有光诸人的文集，和《文心雕龙》、《史通》、《船山遗书》、《文史通义》等。特别是《庄子》一书，他反复诵读，深之钻研，无形中便受了那种同生死、轻去就、忘物我的思想影响，使他缺乏坚决果断的精神和英勇豪迈的气概，而形成优柔寡断，随遇而安。

然而，一师究竟是一个好的师范学校。周世钊在这里学习了心理学、教育学、各科教学法和哲学大意，使他认识教育的作用和作为一个教师应该具有的修养（当然是唯心的，不正确的）；也培养了他对教育工作的兴趣。这对于他以后教了几十年书始终没有“改行”的打算，可说是有一定关系的。周世钊只是想从学问文章上做功夫，作出成就，不被人看成平凡庸碌，而得到相当称誉和尊敬。他参加教育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是想当一名“名教员”，在教学工作中创造成绩，从而得到学生的爱戴，得到社会的赞扬。

另一方面，周世钊参加一些有进步意义的活动，受杨昌济、徐特立、毛泽东、蔡和森等进步师友的影响，使他对于以教育改造社会有一定的认识，并抱有一定的主观愿望。可以说，这时就形成了他的教育救国的思想基础。

1918 年暑假，毛泽东与周世钊终于在第一师范毕业了。

诚如美国斯图尔特·施拉姆所写的〔8〕：“这五年在毛泽东一生中的重要性怎么估计也不会过分。首先，他所受到的教育有很大一部分是在这五年里获得的，其内容既有古典的也有现代的，既有中国的也有西方的。但是，这五年的重要性还不止于此。这五年使毛泽东能够进入教育界，执教时间虽然不长，却是一个使他可以发挥更大作用的阶梯。更为重要的也许是，长沙第一师范和其他男女学校的学生团体，思想活跃，有政治觉悟，给毛泽东提供了一个理想的使自己成为一名政治工作者的演练场。他在那里产生了后来付之实践的思想和方法，在那里结交了朋友和同志。”

第三章 学会会友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易经》

世界最美好的东西，莫过于有几个头脑和心地都很正直的严正的朋友。

——爱因斯坦

一 新民学会的基本会员

辛亥革命失败之后，经过窃国大盗袁世凯的卖国称帝，北洋军阀的蠹国残民，南北军阀的连年混战，国命极端贴危，人民深陷水火，毛泽东、周世钊在第一师范的几年中，无日不关心国家大事，尤其是毛泽东，对报纸杂志每天要花两三个钟头仔细阅读，经常考虑救国救民的方法。

毛泽东考虑个人力量有限，必须结合广大的同志，共同奋斗，才有可能达到救民救国的目的。1915年，毛泽东写了一篇文章叫作《征友启事》，大意是：国家阽危，青年应该起来救国，凡有为救国牺牲个人的精神的人，愿与之交友，希望通讯联系，见面商讨。他将启事油印分发到长沙各大中学校。后来，仅得到几个人的来信，毛泽东很不满足，于是常和几个亲密的同学商讨，包括周世钊同学，经过两年的酝酿，决定以一师思想进步的同学为基础，组织新民学会。

1918年4月14日，这是一个晴朗的星期天。湘水碧波荡漾，江岸绿草如茵，微风轻拂，春意盎然。在岳麓山二里半刘家台子蔡和森的家里成立了新民学会。这天到会者有：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肖子升、陈绍休、肖子瞳、邹彝鼎、张昆弟、陈书农、邹蕴真、周明谔、叶兆楨、罗章龙，共十三人。没有能到会的有：陈昌、李维汉、周世钊、罗学瓚、熊光楚、曾以鲁、傅昌钰、彭道良共八人。新民学会第一批会员肖三的日记中真实地记载了全部人员。毛泽东和周世钊都是新民学会的最早会员，是第一批会友[5、9]。

新民学会成立会上，首先讨论了由毛泽东、邹彝鼎起草的会章。会章条文颇详，经过讨论，有较多删削，为了避免反动政府的注意，定出“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的会章，并予通过。同时规定会员必须遵守的戒条，“不虚伪”、“不懒惰”、“不浪费”、“不赌博”和“不狎妓”五条纪律。同时还规定“会员对于本会每年负一次以上通函之义务，报告己身及所在地状况与研究心得，以资互益。”会员如有不正行为和故意违犯会章的，经多数会员决议，令其出会。而入会者需经会员五人介绍及过半数会员承认，始得为会员。会议还选举了萧子升为总干事，毛泽东、陈书农为干事。中午，蔡和森家备午餐招待。

从此，毛泽东与周世钊成了新民学会的亲密会友。

二 毛泽东首函周世钊[10]——1920年3月的信

新民学会会友间通信较多。毛泽东搜集了会友间相互往还的书信，编为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到1921年春印发了三集。毛泽东在第一集上写了发刊的意义说道：“通讯集之发刊，所以联系同人精神，商榷修学、立身与改造世界之方法。”通信集对会友思想的启发，认识的提高，起了很大作用；同时作为新民学会重要资料保存了下来。迄今为止，发现的毛泽东最早致周世钊的信是“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一集上的第11封信，信的全文如下：

毛泽东给周世钊[10]
国内研究与出国研究的先后问题
团体事业的准备工夫
自修大学

博元吾兄：

接张君文亮的信，惊悉兄的母亲病故！这是人生一个痛苦之关。象吾等长日在外未能略尽奉养之力的人，尤其发生“欲报之德，昊天罔极”之痛！这一点我和你的境遇，算是一个样的！

早前承你寄我一个长信，很对不住！我没有看完，便失掉了！但你信的大意，已大体明白。我想你现时在家，必正绸缪将来进行的计划，我很希望我的计划和你的计划能够完全一致，因此你我的行动也能够一致。我现在觉得你是一个真能爱我，又真能干我有益的人，倘然你我的计划和行动能够一致，那便是很好的了。

我现极愿将我的感想和你讨论，随便将他写在下面，有些也许是从前和你谈过来的。

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劭西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

因此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我觉得暂时在国内研究，有下列几种好处：

1. 看译本较原本快迅得多，可于较短的时间求到较多的知识。
2. 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
3. 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年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工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在现在做了，一来无方才所说的困难；二来又可携带些经验到西洋去，考察时可以借资比较。

老实说，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想从译本及时贤所作的报章杂志，将中外古今的学说刺取精华，使他们各构成一个明了的概念。有工夫能将所刺取的编成一本书，更好。所以我

对于上列三条的第一条，认为更属紧要。

以上是就“个人”的方面和“知”的方面说。以下再就“团体”的方面和“行”的方面说：

我们是脱不了社会的生活的，都是预备将来要稍微有所作为的。那么，我们现在便应该和同志的人合力来做一点准备工夫。我看这一层好些人不大注意，我则以为很是一个问题，不但是随便无意的放任的去准备，实在要有意的有组织的去准备，必如此才算经济，才能干较短的时间（人生百年）发生较大的效果。我想（一）结合同志，（二）在很经济的可能的范围内成立为他日所必要的基础事业。我觉得这两样是我们现在十分要注意的。

上述二层（个人的方面和团体的方面），应以第一为主，第二为辅。第一应占时间的大部分，第二占一小部分。总时间定三年（至多），地点长沙。

因此我于你所说的巴黎南洋北京各节，都不赞成，而大大赞成你“在长沙”的那个主张。

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之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生的生活。关于生活费用取得的方法，约可定为下列几种：

- （1）教课（每人每周六小时乃至十小时）。
- （2）投稿（论文稿或新闻稿）。
- （3）编书（编一种或数种可以卖稿的书）。
- （4）劳力的工作（此项以不消费为主，如自炊自濯等）。

所得收入，完全公共，多得的人，补助少得的人，以够消费为止。我想我们两人如果决行，何叔衡和邹洋清或者也会加入。这种组织，也可以叫做“工读互助团”。这组织里最要紧的是要成立一个“学术谈话会”，每周至少要为学术的谈话两次或三次。

以上是说暂不出洋在国内研究的话。但我不是绝对反对留学的人，而且是一个主张大留学政策的人。我觉得我们一些人都要过一回“出洋”的瘾才对。

我觉得俄国是世界第一个文明国，我想两三年后，我们要组织一个游俄队。这是后话，暂时尚可不提及他。

出杂志一项，我党狠不容易。如果自修大学成了，自修有了成绩，可以看情形出一本杂志。（此间的人，多以恢复《湘江评论》为言。）其余会务进行，留待面谈，暂不多说，有暇请简复一信。

弟 泽东 一九二 三 一四
北京北长街九十九号

这封长信是从北京北长街 99 号寄到长沙的。信首的敦元兄系周世钊的字号。毛泽东说：“我规在觉得你是一个真能爱我而又真能干我有益的人。”毛泽东邀请周世钊共同过共生的生活，他说：“我们两人如果决行，何叔衡和邹洋清或者也会加入，”从这两处可以看到，毛泽东和周世钊的青年友谊真诚深厚，一个人的青年友谊是最重要的友谊，他们正体现了我国古著作《易·乾卦》中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精神。

三 周世钊首函毛泽东——1920年6月的信

虽然在1920年6月之前，周世钊曾给毛泽东写过数信，但已无法查究，所以这封1920年6月的信仍算是首函，信载《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全信如下：

周世钊给毛泽东[10]

润之兄鉴：

前信想已收到。此时湘局略定，可贺！惟应建设的事，千头万绪，急待进行。吾兄平时，素抱宏愿，此时有了机会，何不竭其口舌笔墨之劳，以求实现素志之十一？相知诸人，多盼兄回湘有所建白，弟亦主张兄回省，其理由如下：（1）自修学社本有移湘之议，前因时局问题未能即行，此时当可达到初意。（2）生活问题，在湘比较容易解决。（3）湘中无健全的言论机关，加大公报、湖南日报……都不见有特色；兄如回湘，于言论尽一番力，当有很大的影响。（现时我以为要有专门讨论湘省以后建设事业的报纸，造成舆论，一面促进人民自觉，一面指导政府。然而未见其报，未闻其言也，）（4）麓山自修社，现今大有可为，即兄前曾建议之新民学校，此时似亦可着手，因为易先生现已回湘也。有此四层，兄可回湘矣。闻叔衡已筹钱汇兄处作川资，不知已到否？敬祝健康！

世钊 9年6月28日

当时，毛泽东赞成周世钊“在长沙”的那个主张，而对周世钊所说的巴黎南洋北京各节，都不赞成。同时，周世钊希望毛泽东返湘有所建白，并有理由四层。他们两人的计划和行动完全一致了。

四 会友间的通讯〔10〕

新民学会会友通信集共有三集，计收入信函 50 封。其中毛泽东的来往有 42 封之多，蔡和森的为 14 封，周世钊的 5 封。通信集中谈到周世钊的有 20 处，多处都是与毛泽东并提，如下所摘。

1. 1918 年 7 月，蔡和森自北京致函肖子升，问及：“周君世钊有信否？润兄及鼎芝兄见易先生时，请代致意。此时不遑作书也。”此处的“润兄”即毛泽东。

2. 1920 年 3 月 14 日，毛泽东自北京致周世钊，已如上述。

3. 1920 年 6 月 28 日，周世钊自长沙致毛泽东，如上述。

4. 1919 年 11 月 14 日，罗学瓚自法国致毛泽东。他劝毛、周出国深造，信中写道：“惟弟（罗学瓚）甚愿兄（毛泽东）求大成就，即此刻宜出洋求学。若少迟延，时光既过，人事日多，恐难有多对日求学矣。”信中还写道：“现在惇元、陈启民兄还在长沙么？我以为惇元兄文学既深造，若是出外求学，自必有大造于学问界，……（我看现在有些人在国中闹得声名很大，其实没有好多学问，象惇元兄一样的很为难得。）我想他既不想造一个办事人，岂有不能造一个学问家的道理？”信中还谈到收到第一期《湘江评论》。

5. 1920 年 4 月 27 日，肖子升自法国致周世钊，谓：铁工最为远大切实。

6. 1920 年 4 月 21 日，罗宗翰致周世钊，谈升学问题，全信如下：

东园兄：

久未通信，昨接和畅信，知你仍任原职，甚善，老伯母大人丧事，想已完全办妥，你也不要常常念她。

润之曾有长信寄府，谈求学事，他甚不主张你入学堂，及此时出洋。想组织同志到长沙设自修大学。此事固好，据我的意思，入学堂也未必不佳。国为现在的学堂，大非昔比，多主自由研究，不至为无谓功课所限，与自修同。我们这辈人，象你的读书力虽比我强得多，但是也不能不有顾问。就是自己能够全知，所费的功夫一定要多，何如略用指导的快咧？并且一入学堂，还可省去许多无谓的纠缠，若自由研究，又恐发生他种变动，不能持久。

至于此时出洋，那本不太好，对于本国的学术没有弄清，外国的学术又没有条理明白，跑到外国，真是茫茫大海，所得必少。所以我主张在专门学校或大学毕业后，再出洋。我现在想考北京高师，（此校自去年来，大加改革，与北大办法差不多，全任自由研究。）打算到高师毕业，再入该校研究科二年，然后设法出洋，计划再专读书十年，但能否如愿，第一决于今年之能否入学，第二要无他项重大变故，不过心志如此，他且不计。听说你的主意，也有升学一法，我看还是升学为好，不知你的意思决定没有？

此次经商一事，迄今近五月，毫无生意，各伙友多抱悲观，行将倒闭，我想无论如何，还要于一下。看他到底怎样？社中子任返沪，仅我一人，外面已呈一种不可活动的状态，闷极！愤极！省中如有重要商情，仍请草稿寄下，以便印发。老武近日有信来否？教课有空，请示我一二，为感。此祝

平安 弟 宗翰

9 年 4 月 21 日

函中“经商一事”指驱张，“社中”指平民通讯社，“子任”指毛润之，

“老武”指何叔衡。

7.1920年5月25日，罗学瓚致毛泽东、周世钊、蒋竹如。谈到法国绝不见有官场势力。

8.1920年7月14日，罗学瓚致毛泽东，谈到身体的大问题，四种迷，工学励进会与通信社，婚姻问题。信之最后说：在省垣各同志如周东园、陈启民、何叔衡、蒋竹如诸兄，请代为致意。

9.1920年5月28日，蔡和森致毛泽东，讨论社会主义。希望实现小学计划，劳动教育，合作运动，文化运动等。信中说：启民、惇元宜久在湘主持教育，不动。……希望陶女上及启民久顿周南，敦元久顿修业，叔衡久顿楚怡，……此信请转启民、惇元、叔衡、殷柏诸会友。未另，乞恕。

10.1920年8月13日，蔡和森致毛泽东。讨论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信中最后说：叔衡、启民、敦元，殷柏诸友均此。

11.约于1920年8月，肖旭东致毛泽东长信。报告赴法会友在蒙达尼开会情况，并发表对于同志进行及会务发展的意见。信中要求：润之、叔衡、书农、敦元、章甫、殷柏、李思安、瑾玎诸君个性，亦由相知者提出向新会员介绍。

12.1920年9月16日，蔡和森致毛泽东长信，进行了共产党之重要讨论。信中最后说：叔衡、惇元、殷柏、启民、章甫均此。

13.1920年11月26日，毛泽东致罗学瓚，告之，惇元在理问街通俗报。

14.1920年6月30日，毛泽东在易礼容给毛泽东、彭璜信后的按语中谓：礼容这一封信，讨论吾人进行办法，主张要有准备，极忠极切。我（毛泽东）的意见，于致陶斯咏姊及周惇元兄函中已具体表现。于归湘途中和礼容也说过几次。我觉得去年的驱张运动和今年的自治运动，在我们这一班人看来，实在不足由我们去实行做一种政治运动。……。明言之，即我们决不跳上政治舞台去做当局。我意我们新民学会会友，于以后进行方法，应分几种：一种是已出国的，可分为二：一是专门从事学术研究，多造成有根底的学者。如罗荣熙、肖子升之主张。一是从事于根本改造之计划与组织，确立一个改造的基础，如蔡和森所主张的共产党。一种是未出国的，亦分为二：一是在省内国内学校求学的，当然以求学储能做本位，一是从事社会活动，可以从各方面发起并实行多种有价值之社会活动及社会事业。其政治运动之认为最经济最有效者，如“自治运动”、“普选运动”等。也可从旁尽一点促进之力，惟千万不要沾染旧社会习气，尤其不要忘记我们根本的共同理想与计划。至于礼容所说的结合同志，自然十分要紧，惟我们的结合，是一种互助的结合。人格要公开，目的要共同。我们总不要使我们意识中有一个不得其所的真同志就好。

× × × ×

这些珍贵的新民学会会员通信，记载了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湖南一些立志改革社会的先进知识分子的活动。毛泽东是组织者与领导者，周世钊积极参加了活动。根据谢觉哉在1921年6月29日的日记：“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润之，赴全国（即共产主义者）之招。”[11]这是毛泽东与何叔衡秘密从长沙码头坐轮船启程赴上海参加中共一大会议。

五 泛劳动主义的争论

根据新民学会会务报告记载，新民学会从 1918 年 4 月成立至 1921 年夏季停止活动的三年期间，在长沙共召开了 7 次重要会议。前 4 次主要讨论学会的宗旨、学会活动的方法、会员条件、入会手续和“会友向外发展”等问题；后 3 次集中讨论了社会改造问题。

1918 年 4 月 14 日的新民学会成立大会，毛泽东作为会议的主要成员参加并组织了会议。周世钊虽是基本会员，但因故未能到会。

学会成立后不到两个月，即 1918 年 6 月，由于有几个会友即将外出，于是学会在陈绍休、肖子瞳任教的第一师范附属小学召开了第二次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急迫的“会友向外发展的问题”。出席会议的有何叔衡、肖子升、肖子瞳、陈赞周、周惇元、蔡和森、毛润之、邹鼎丞、张芝圃、陈启民、李和笙等。

此时，湖南政局乱极，汤萝铭、谭延闿、傅良佐、谭浩明、张敬尧等军阀互相更叠，教育摧残殆尽，几至无学可求。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吴玉章等在北京发起成立了“留法俭学会”。于是，新民学会会友都亲自看到军阀混战，全中国的天空被层层乌烟瘴气所笼罩，湖南人民也正被吴佩孚、张敬尧的北军屠杀劫掠，越觉得中国和湖南都需要改造，青年学生必须加强学习与锻炼，来担当改造湖南、改造中国的责任。毛泽东认为如果让一些青年学生到法国工厂去做工，几年后，学好了法文，积累了工资，再投入那里的专门学校学习。这样，不但使一些穷苦青年有远适异国，学习新技术、新思想的机会，而且使他们通过体力劳动的锻炼，常和穷苦的工人一起生活，必然会熟悉工人，了解工人，和工人建立起深厚的感情。这样的人，才能真正了解劳苦大众的问题，担当起改造国家社会的艰巨工作。这是青年学生的好出路，也是培养和提高新民学会会员的好途径[12]。经过会议反复讨论，会友“对于留法运动认为必要，应尽力进行。”“自此，留法一事，和森和子升专负进行之责。”

第二次会议还讨论了今后发展会务和会员的问题。毛泽东提出，人多力量才大，发展会务必须发展会员。

1919 年，周世钊负责修业学校的学会工作。是年 11 月，在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友在周南女校开过一次会，对会章作了些修改，决定设评议、执行两部。执行部下又设学校、编辑、女子和留学各部。会议选举何叔衡、李思安为正副执行委员长，陶毅、周世钊、毛泽东、周敦祥、魏壁、陈书农、唐耀章、蒋竹如为评议员。

1919 年 11 月 16 日，在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友合影。其中有毛泽东和周世钊。

新民学会虽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组织，但它在青年毛泽东的实际主持下，在周世钊等大多数会员的共同努力下，成了“五四”时期湖南地区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的核心组织。这和新民学会物色真同志、组织严密分不开，谢觉哉入会的过程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谢觉哉诞生于 1884 年 4 月 27 日，比周世钊长 13 岁；何叔衡诞生于 1876 年，比谢觉哉还长 8 岁。周世钊、谢觉哉、何叔衡都是湖南宁乡人。宁乡地处洞庭湖畔的湘中地区，山青水秀，美丽富饶。何叔衡 18 岁时中秀才，谢觉哉则是封建旧中国的最末一科秀才，但他们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

响下，如饥似渴地追求革命真理。周世钊和何叔衡在第一师范时期早就认识，1920年9月，他们三人都到湖南通俗教育馆工作，成为密友。

谢觉哉在1921年1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东园、玉衡、润之介绍我入新民学会”〔11〕。就是说，谢觉哉加入新民学会，是在新民学会的晚期1921年元月加入的，而且是由周世钊、何叔衡、毛泽东介绍的。当时新民学会已发展会员七八十人，按照规矩，新会员入会要有会员介绍，评议会通过。谢觉哉在元旦那天已被批准入会，但因登记手续未完，未去参加1921年的元旦会议。可以看出，新民学会的组织手续是十分严格的。

1920年年底，长沙政局略定，正在长沙的20余名新民学会会员谋求聚会一次。此时评议员任期（一年）已满，不能开会，遂由职员何叔衡、周惇元、毛润之、熊瑾玎、陶斯咏等先期发出通告：

我们学会久应开会，因种种原因没有开成，今定从十年一月一日起接连开会三天，为较长期的聚会，讨论下列各种问题：

……。

上列各项问题，或为巴黎会友所提议，或为此间同人所急待解决，请各人先时研究准备，以便开会时发表意见，而期得到一种适当的解决。

开会地点：潮宗街文化书社。……。

新民学会启

于是商定开会手续，从1921年元旦起接连开会三天，讨论学会共同目的等14个问题。

元旦会议期间，大雪封城，银光灿烂，景色绚丽。长沙的十余个会员，拨冗到会，齐集文化书社，由何叔衡主席，展开着热烈的讨论。

“学会应以什么作共同目的？”这是元月一日、二日讨论的问题，毛泽东发言：应为“改造中国与世界”。十余人发言后，李承德发言：主张用“促使社会进化”。周惇元：同李。主席何叔衡说：主张用“改造中国及世界”为共同目的的起立！起立的如下：陶斯咏、易礼容、毛润之、钟楚生、周惇元、任培道、陈启民、易阅灰、陈章甫、彭荫柏等十人。主张用“改造世界”为共同目的的有熊瑾玎、刘继庄、陈子博、何叔衡、贺延祐五人。主张用“促社会进化”的有李承德、周惇元两人。周惇元声明云，我于“改造中国与世界”与“促社会进化”两都赞成。不作表决的有邹泮清、张泉山二人。

“达到目的需采用什么方法？”这一问题的讨论有五种方法：社会政策、社会民主主义，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无政府主义。会议首先由何叔衡发言：主张过激主义：一次的扰乱，抵得二十年的教育，我深信这些话。毛润之发言：我的意见与何君大体相同，社会政策，是补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也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十余人发言后，周惇元说：无政府主义不能行，因人性不能皆善，中国目下情形非破坏不行。惟于过激主义不无怀疑，束缚自由，非人性所堪。宜从教育入手，逐渐进步，步步革新。吾人宜先事破坏，破坏后建设事业宜从下级及根本上着手。循环讨论后，相与自由讨论。何叔衡云：建设亦须随时着手，随时变更，意不赞成熊瑾玎单要破坏之说。又云：不必说主义，但要人人作工。毛

润之谓：人人做工，就是一种主义，所谓泛劳动主义。周惇元不赞成泛劳动主义，谓劳农势力之下，摧残人才。主张须有从事科学艺术之自由，不必人人作工。方法问题的讨论至此结束。毛泽东和周世钊有些意见分歧。表决结果，赞成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有何叔衡、毛泽东等 12 人，赞成德谟克拉西者 2 人，任培道，邹泮清。赞成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者 1 人，李承德。未决定者 3 人，周惇元、刘继庄、熊瑾玎。

元月三日，讨论“方法进行即刻如何着手”问题。周惇元认为：从下级入手，宜渐进，重普遍，立脚宜稳，点滴做去。学校和饭店，皆吾人着手处，研究宜深。而毛润之认为：诸君所举各种着手办法：研究、组织、宣传、联络、经费、事业，我都赞成。惟研究底下，须增“修养”。联络可称“联络同志”，因非同志，不论个人或团体，均属无益。筹措经费可先由会友组织储蓄会。我们须做几种基本事业：学校、菜园、通俗报、讲演团、印刷局、编译社，均可办。文化书社最经济有效，望大家设法推广。对这一问题全体一致通过。

1921 年 1 月 16 日，为新民学会长沙会友常会期，仍在文化书社召开，到会 21 人，何叔衡主席。首先讨论“会友个人的进行计划。”周惇元认为：目的在研究学术，想于文学及哲学上用一点功。将来事业则在教育。现在进行：想在两年学好英文。前想进学校，今党中国学校无可进了。想在近筹一点钱赴日本，惟不易办。赴日虽不甚好，但一，可绝外缘，免去在国内时的纷扰；二、日本虽无独立文化，但感受最快，并非无学可求。筹款困难时，或要借助官费。而毛泽东则认为：觉得普通知识要紧，现在号称有专门学问的人，他的学问，还止算得普通，或还不及。自身决定 30 以内只求普通知识，因缺乏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的基础科学的知识，想设法补足。文学虽不能创作，但也有兴趣，喜研究哲学。应用方面，研究教育学，及教育方法等。做事一层，觉得“各做各事”的办法，毫无效力，极不经济，愿于大家决定进行的事业中担负其一部分，使与若干年后与别人担负的部分合拢，即成功了一件事。去年在上海时，曾决定在长沙顿住两年，然后赴俄，现在已过了半年，再一年半，便当出省。在长沙做的事，除教育外，拟注力于文化书社之充实与推广。两年中求学方面，拟从译本及报纸了解世界学术思想的大概。惟做事则不能兼读书。去年下半年，竟完全牺牲了（这是最痛苦的牺牲）。以后想办法到每天看一点钟书，一点钟报。

接着讨论“会友个人的生活方式”。周惇元发言：暂任报馆事，解决生活，将来很想一切事不做，专门读书。但款项另筹。毛润之发言：我所愿做的工作：一教书，一新闻记者。将来多半要赖这两项工作的月薪来生活。现觉专用脑力的工作很苦，想学一宗用体力的工作，如打袜子，制面包之类，这种工作学好了，在世界任何地方跑，均可得食。至于消费赞成简单，反对奢泰。周惇元又云：劝善规过，最是要紧，我常感觉到虽时常有朋友谈论，总多闲谈，少有用诚恳的态度来讨论修学立身的问题的。希望会友注意此点，会面不为闲谈，劝善规过，讨论问题。又觉得我们在此时应该注重“自己改造”，不应加入团体太多，致牵涉许多事务，妨碍自己的进修。接着，蒋竹如、陶毅、何叔衡发言赞同周世钊意见，毛润之不赞成熊瑾玎之消费主张，谓生活奢了，不特无益，而且有害，主张依科学的指导，以适合于体力应需的养料，身上应留的温度，和相当的房屋为主，这便是“备”，多的即出于“备”之外，害就因此侵来。毛润之还说：文化书社要组织一个印刷局及一

个编译社〔13〕。

从元月常会的发言看，毛泽东和周世钊，都是孜孜爱学，奋斗上进的优秀青年。但是志趣有异，在会上能肝胆相照，各抒己见，坦率真诚。在泛劳动主义的争论上，也可算周世钊初谏毛泽东。

第四章 同事岁月

1918年夏，毛泽东、周世钊从第一师范毕业，走上了社会，开始了同事生活，整整度过了共同战斗的9个春秋。他们到1927年后有个较长时间的分离。

在1918年到1927年的9年中，前3年主要是在新民学会活动。毛泽东与周世钊都曾任教师，编过报刊，搞过勤工俭学等。1921年，毛泽东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缔造，以后负责湘区党委工作，周世钊参加了文化书社等的工作，并读完了东南大学国文系。1918年到1927年，确实是他们两人风华正茂的岁月。

对于这段时期的情景，毛泽东曾于1925年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词《沁园春·长沙》，这首清新豪放的沁园春词为：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这首词不但赞赏麓山湘水的宜人秋色，而因物兴感，充分表现了毛泽东英伟豪迈的气概，爽朗豁达的襟怀。“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正是他这时候恰如其分的写照。他的头脑中没有丝毫个人名刊得失的尘滓。所以能够。上天下地，自由翱翔，往古今来，略无挂碍。这种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使他在追求真理，组织革命的斗争中，战胜一切艰苦、阻碍、危难和无数顽强的敌人，而勇往直前，毫无畏惧。

1968年，周世钊回忆当时的毛泽东，写下了一首江城子词，词题为：毛泽东同志青年时期革命活动纪念馆开工典礼献词。词为：

英风壮志自青年，斗强权，拯颠连。反帝反封建握真诠。唤起工农千百万，擎火炬，照人寰。

光辉思想大宣传，建崇榭，碧峰前。经始今朝亿众尽欢然。见环球都慕化，沿正道，换新天。

事实上，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英风壮志地斗强权、拯颠连，反帝反封建中，都融进了他们两人的共同战斗。

一 普通教师

在军阀战争的炮火声中，毛泽东与周世钊正在进行紧张的毕业考试。此时，北洋军阀段祺瑞派了吴佩孚、张敬尧率领数万强兵与广西军阀陆荣廷的部下谭浩明的军队交战于岳州、湘阴、长沙、湘潭、衡阳、邵阳一带。当毛、周他们刚刚结束毕业考试，张敬尧如狼似虎的军队就进驻第一师范。逼着他们离开学校。

毛泽东为了发展新民学会会务，筹划组织会员参加留法勤工俭学活动。毕业后他没有回韶山，留居湖南大学筹备处的半学斋。

周世钊毕业后即回石子冲去，家人都很高兴，演了一晚皮影戏以示庆贺，遗憾的是他的父亲已于1915年逝世，不能分享毕业的快乐。

当时毕业学生没有统一分配的方法，一切职事都靠自己找门路推荐。周世钊家居数日后，想到毕业以后的工作，步行一天到宁乡县劝学所主要求派任小学教员，没有得到同意的答复。又过了十多天，工作还很渺茫，毫无希望。一天，周世钊突然接到王季范先生从长沙寄来的信，言已介绍他到长沙修业小学教课，嘱他即去长沙。周世钊旋即启程，拜别慈母等亲人。到了长沙后，王季范带他去拜会了修业小学校长彭国钧，住入修业小学。这是1918年9月的事了，这也是周世钊几十年教书生活的开端。

从此，毛泽东与周世钊都迈开了走向社会的第一步。社会在拥抱他们，在考察他们，看他们能力社会作出什么样的贡献，看他们能否学以致用，能否对社会尽职尽责。

周世钊既然在修业小学教课，他就认为做好工作、教好学生是一个教师应尽的责任。因此，他以认真负责的态度来进行工作。不论课堂教学、课外指导以及批改课卷，都不肯马虎。

周世钊到修业小学后，主事王瑞洲要他担任高小二年级的级任老师，教授国文课。这班的学生只二十多人，寄宿生较多。当时的国文课本全是文言文，每天授课一时或二时。学生还读算术、史地、理化等课，另有教师担任。周世钊的授课与批改作业工作，都不太忙，惟照顾学生生活。管理学生活动，则要费较多时间。

班上有几个学生天资聪颖，学习成绩较优。一是张文亮，一是杨嶷，一是陈汉平。他们带动全班，每周出一些书写的小壁报，有议论，有记载，有文艺，颇为教师及他班同学称赞。

周世钊的工资为每月14元，初期除付清伙食费外还可剩余儿元，后来，张敬尧开设的裕湘银行发出的纸币不断贬值。学校的薪金也是发的裕湘纸币，仅能用以吃饭，再无分文剩余，买书、制衣服都不行。周世钊在修业教了两年书，寒暑假回家想买点糖果去孝敬老母，也做不到。

1919年春，毛泽东由于进行留法勤工俭学活动，他由北京到了上海，护送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青年，同时他本人也准备出国。

四月初的一天，修业小学的传达忽传毛泽东来到修业，周世钊十分惊异，迎进谈话后，才知道他送走赴法学生，自己仍留上海而不去。此次因闻母亲来长沙诊病，特回来省亲。毛泽东还说，北京上海的学生界为了申讨21条卖国条约的签订，巴黎和会上我国外交的失败，群情愤激不安，势将爆发反帝救国运动，现在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毛泽东回长沙，也想在长沙学生的反帝救国运动中做点工作。

周世钊问毛泽东住在什么地方？毛说未定。因此，周世钊邀请毛泽东到修业小学居住，并告之该校高小部正缺历史教师，每周只有六点钟课，只要毛泽东愿意教这几节课，对于工作并无妨碍。于是，毛泽东住入修业小学并教历史课。

在修业小学，毛泽东和周世钊住的房子只隔一层木壁。周世钊半夜醒来时，还从壁缝中见到毛泽东房里的灯光，原来毛泽东还在为《湘江评论》写稿呢。

由于工作到深夜，毛泽东不能按时起床，有时第一堂课有他的历史课，周世钊就去叫他起来。毛泽东来不及洗脸，更来不及吃饭，一面穿衣，一面拿粉条，匆忙走到教室教课。

毛泽东教的历史课，每每结合当前的历史斗争，启发学生的爱国思想，很受同学欢迎。

1920年秋至1921年冬，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担任附属小学主事（即校长），并在1921年下学期兼任了师范部第23班的国文教员。周世钊应毛泽东之请，也在一师附小兼高小的历史课。斯诺写过：毛泽东曾是长沙的一个小学教员〔14〕。

二 编辑·记者

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1920年冬出刊的《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一号）》记载了1919年上半年的新民学会在长沙的三件要事。原文为〔10〕：

上半年无甚要事，只停元在修业教课，叔衡在楚怡教课，润之在学生联合会办湘江评论周刊，颇有一点成绩。

1919年开始，毛泽东与周世钊不但教书，而且合办了《小学生》，编辑、出版《湘江评论》、《新湖南》、《湖南通俗报》等报刊。

周世钊、毛泽东教书的修业小学，规模虽小，历史却比较悠久，从长沙有“洋学堂”时起就办起来了。周世钊在此教了半年书后，看到班上的学生，大多呆板、不活跃，健康情况也不好，作文时都只能写简短的干瘪的文言文。本来是天真活泼的小孩子却变成喜静不喜动的小老头了。周世钊觉得这是学校旧教育的罪过〔12〕。

1919年的春天，周世钊帮助班上的学生成立图书馆，指导他们购买了一些白话书刊，又把他们各自的新书集中起来，交袂阅读。周世钊又提倡写白话文。毛泽东到班上代历史课后，他常常结合时事，对比古今，引导学生注意认识当前的形势和青少年努力的方向。于是学生们的眼界宽阔了，思想进步了，写起文章来，不但有话可说，而且有了新的思想内容。

由于毛泽东、周世钊等几个教师的鼓励，全班学生讨论决议，每周出一张壁报。后来，又受到北京的《每周评论》、上海的《星期评论》、长沙的《湘江评论》等的鼓舞，班上的学生觉得小学生也有话要说，经过几次商议，决定出刊一种叫做《小学生》的半月刊，内容有小言论、小批评、小文艺和重要新闻等。他们居然也谈起天下国家大事来了。反对日本，抵制仇货，抨击军阀统治，申讨卖国好贼，以及反对旧教育，提倡新道德的文章经常刊出。负总编责任的是班上年龄较大的学生张文亮，他写的文章也较多。

11月中旬的长沙《大公报》把《小学生》向社会作了介绍说：“全国的人都有说话的机会，都有说话的能力，那社会就有点生机了。现在全国的大学生、中学生都学得说话，只有小学生还没有。昨天我看见一张修业小学出刊的《小学生》报，小学生也说起话来了，难怪他们的先生大加奖励。我希望他们声大而远传。”

这样，很多小学来信订购，很多报刊寄来情交换的刊物，可惜因为驱张运动的爆发，《小学生》也被列入禁止之列，只出到第三期就不幸停刊了。

同时，毛泽东又创办《湘江评论》，自己写稿，自己编辑，自己校对，有时还自己到街上卖报，真是日夜忙碌。第一期《湘江评论》是在1919年7月14日出版的。有人说，《湘江评论》就是湘江的怒吼，就是湖南人民的声音。可是，恨《湘江评论》的人也不少，反动军阀张敬尧就在它只出五期的时候横暴地封闭了学联和《湘江评论》，《湘江评论》只存在了一个多月。

据材料证明，毛泽东与周世钊都留下了许多文字。尤其是毛泽东，文字更多。但是他们的文字，一般都是自己单独完成的。只有一次例外，他们两人曾经合记过一篇文字。

“五四”运动前后，蔡元培在长沙周南女校演讲。周世钊与毛泽东合记了他的演讲《美术的价值》，刊于长沙《大公报》上。这篇文字，湖南省教育会编的《名人讲演集》中未作记载，蔡元培也未曾过目。由于文字的珍贵，

全文照录于下〔15〕：

美术的价值

（在周南女校）（蔡子民讲毛泽东记）

记者按：蔡先生的话，有好些听不清楚。此篇所记，只其大略。

开首两段，是周世钊先生记出给我的。

美术的起源很早，没开化的人，就有美术的萌芽，不过美术成为理论，比较要迟。在我们中国，评论美术的书，有《乐记》、《考工记》、《文心雕龙》、书评、画评等等，但都是些零碎的批评，不能建成有系统的美学。

西洋对于美术的评论，希腊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但也是零碎的。到罗马时代，有建筑学、雄辩学、诗歌等，比希腊时代，已算是进了一步。后来文艺复兴，有一些美术家，著了一些书，比罗马时代又有进步。十七世纪的时代，经过一些经验派心理学家以心理研究美学，已算有了一些头绪，但还不能成功一种美学。后来康德以有趣味为美，把美术应用到哲学上面，于是哲学的美学成立。

大凡懂了美学的理论、并得了美术的陶融的人，可以养成一种高尚活泼的人生观。若细为区分美术的价值，可得五项：

第一，复杂而又统一譬如瓶花，这一花与那一花不同，这一叶与那一叶有别；一花一叶之中，这一个部位与那一个部位又各相殊，樊然并呈，算是很复杂了。一面总称为花，而且总结于瓶，则又是统一的。人身的部位，如耳、目、口、鼻、手、足、腹、背等，纷然各别，但均统一于一有机体的‘人身’。

大凡美术，复杂做其内容，统一成其形式。复杂的价值，所以使吾人的生活繁富；统一的价值，所以使吾人的生活不致凌乱，而有一最终归宿之区。凡个性与群性，分子与团体，单体与普泛，都是具有这两种美的价值的。

第二，改造自然从前希腊的美学家谓美术的价值是‘模仿自然’，后人始知其说非是。美术的价值不是模仿自然，乃是‘改造自然’。美术家于其艺术品，有创作自由，如画师之描绘一山水，或描绘一城市，彼于自然物之有碍其画之美者，如孤露的材枝、过高的尖塔等，则可以去掉它，不令留于画内。美术因〔固〕不能全然离间〔开〕自然，然自然只是为人生所享乐。吾人所不认为美者，在美术上可以用吾人的理想去改造它。若是者，才有美术上的价值；完全服从自然，便没有美术上的价值了。

第三，感情的具体表现创作者的感情，借美术可以完全表现。伯牙抚琴，可以通志。季扎〔札〕观乐，可以知风。音乐之哀者使人哀，怒者使人怒，激扬者使人起激扬之心，沉郁者使人发沉郁之感。音乐如此，图画、雕刻、戏剧皆然。创作者的感情怎样见之于美术，竟能勾引赏玩者的感情也使之怎样。人为的美如此，自然的美亦然。壮阔者使人感壮阔，幽雅者使人感〔感〕幽雅。吾人的生活，感情的生活居多，情有不舒，则意自不快。耽于美术，无论是创作它或者是赏玩它，都是可以勾引出来真正的感情的。

第四，提起研究科学的兴味体〔美〕术与科学有密切的关系。留心美术的人，可以因其关连的地方去从事科学的研究。如花、草、枝、叶之美之于植物学，光线之美之于光学，矿物体结晶之美之于矿物学，人体之美之于生理学。

第五，代替宗教美术与宗教同立于感情的基础之上。人生是不免于忧患的，心有所寄，则忧患消除。与其寄于幽渺的宗教，不如寄于当前的美术。查科学之起，和宗教相为关连，自科学的界域扩充，遂利〔和〕宗教脱离关系。美术起初亦与宗教相连，后来乃渐脱离了关系。吾人沉睡于美的世界之中，直感当前，所觉唯美，生老病死，顿屏去于意识之中，此与宗教之信仰〔相比〕，更纯更洁，更为合理。

美术的价值，大体如此。时促不能多谈。承诸君欢邀，无任感谢。

《湘江评论》被查封以后，毛泽东接编了湘雅医学院学生会办的周刊《新湖南》，他任《新湖南》的总编辑。自第七期起，这本周刊继承了《湘江评论》的精神。《新青年》第7卷第：号及北京《晨报》1919年11月25日都介绍了《新湖南》。《新湖南》不久便被封闭。毛泽东又编辑了《女界钟》。

1920年夏季，张敬尧被驱逐，谭延闿接手做了湖南督军兼省长，他委托易培基为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易就职后自兼第一师范校长，任毛泽东为一师附小主事，派何叔衡为湖南通俗教育馆馆长〔2〕。

湖南通俗教育馆发行的《通俗教育报》，从辛亥革命后创刊到1920年，一直是为当时的省政府粉饰门面，表示关心民众教育的报刊。办报的人并没有明确目的和方针。每天除登载一些政府的文告和陈腔滥调、空洞无物的讲演、评论之外，还从大报上剪剪贴贴、抄抄摘摘，填满空白完事，从内容到形式都没有引人注意的地方，发行少，读者不多。

1920年9月，何叔衡接任馆长，邀请周世钊担任湖南《通俗教育报》的编辑。于是周世钊从修业小学迁入通俗教育馆，会见另外的编辑谢觉哉和邹蕴真，还有庶务组的熊瑾可。他们除谢觉哉外，都是新民学会会员。在长沙的其他新民学会会员，如夏晞、郭亮、李维汉、易礼容、姜梦周等也都积极支持这个编报班子。

当时，《通俗教育报》的周世钊、谢觉哉、熊瑾可等，都是小学教员，全没有办报经验。因此，何叔衡请毛泽东作指导。在1920年9月初的第一次编辑会议上，叔衡简单他讲了几句开场白之后，毛泽东接着分析了湖南政治、社会各方面的情况，他提出：将“通俗教育报”改名为《湖南通俗报》，他又提出，报纸主张什么，反对什么，态度要明朗，不可含糊。通俗报是向一般群众进行教育的武器，文字必须浅显生动，短小精悍，尤其要根据事实讲话，不可专谈空洞的大道理〔2〕，他还说，这个报应大力宣传新文化，以启发人民的新思想，新闻只要报道重要的，可以最大的力量放在破旧立新的批判文字上。周世钊等编辑都赞成他的主张，以后的《湖南通俗报》基本上实践了他的提议。隔不上几天，毛泽东总要到报馆去一次，随时对编辑工作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使编辑质量得到不断提高。

《湖南通俗报》由周世钊和谢觉哉轮流负责总编。通俗报内容车富，有讲话，有新闻，有大事述评，有新宁课。其形式和内容都和过去的报纸截然不同，敢于说话，敢于提出别人不敢提出的问题，诸如劳工神圣，妇女解放，文学革命，民众联合起来，反对吃人的礼教，反对贪官污吏，反对军阀。读

者最感兴趣的还是谢觉哉在“小批评”、“随感录”中写的那些揭露政治上社会上一些丑恶现象的讽刺短文，他以“觉斋”为笔名，文章着墨不多，句句搔着痒处，打中要害。周世钊也写了一些小批评和讲活，用“东园”作笔名。抨击旧社会，宣传新文化，也颇受读者欢迎，新字课则由熊瑾玎用注音符号教人认字，每天一字，除注音外，还有简短的说明。这样一来，《湖南通俗报》的发行量大增，有些中小学把它作为学生课外必读的读物，工人、市民、农民也都订阅了。毛泽东认为这几个月的通俗报办得很好，是《湖南通俗报》的新页。对发扬新文化，宣传新思想，开展建党工作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不久，湖南政局又起变化，赵恒惕赶走谭延闿接任督军兼省长，他仇视新文化，仇视劳工神圣、妇女解放一类的口号。他的左右趁机挑唆，散布“政府办的报，天天骂政府，太不像话了，这都是一些暴徒在那里作祟，这个报必须改组”等等流言。1921年5月，赵恒惕竟以过激主义的罪名撤了何叔衡馆长的职务，新民学会会员周世钊、邹蕴真等也离开了通俗报馆，或被驱逐出馆，而由赵恒惕的喽啰龚心印等来接办，仍恢复了《通俗教育报》的名称。

几十年以后的1951年，大家在一起谈到《湖南通俗报》时，毛泽东总是说：“这一年的《湖南通俗报》办得很不错。”

1926年，当周世钊还在南京东南大学读书时，他接到湖南建设厅秘书贺梯的电报说：《南岳日报》（湖南省政府机关报）促他早日回长沙担任该报主笔。周世钊曾在《湖南通俗报》工作过，对编报颇感兴趣，因此回了一个承诺的电报。

1927年1月，周世钊回到长沙，应徐特立之邀住入稻田师范，徐对周说，《南岳日报》是唐生智的省政府报，唐投机革命，实为军阀，靠不住，不可去。周世钊于是向贺梯表示辞意。贺梯坚邀周去会见建设厅长邓某，因为他是唐生智的得力助手，兼了《南岳日报》的经理。周对邓说，已经答应徐特立在女师教书，而邓仍坚持要周到《南岳日报》工作，并说，教书是日间的事，编报是晚上的事，可以兼顾，并无妨碍。周世钊回校告诉徐特立，就此决定日间教课夜间编报。

南岳日报馆设在坡子街。周世钊晚饭后由古稻田往坡子街。此时长沙还有《湖南民报》，是中共湖南省委的机关报，谢觉哉任总编辑，常有社论，指导革命斗争的方向。周世钊是《南岳日报》的主笔兼编本省新闻，他耳目接触的多半是新事物（如打倒土豪劣绅）。笔下写的多半是新标题、新内容，抛弃了古典文学的钻研，日夜从新的报刊上找东西来充实自己的头脑。《响导》一类刊物成了他所喜爱的读物。每夜回到学校睡觉常在12点。

编了4个月的《南岳日报》后，马日事变发生了。报纸过去的拥共反蒋立场突然改变，变为拥蒋反共的立场。周世钊看看形势不对，馆里又无可与交换意见的人，本想即日离去，但又怕引起他人的怀疑，因此拖了几天，后来藉口要入医院治病，辞去了《南岳日报》职务。

三 激扬文字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从1918年到1927年，毛泽东、周世钊都写下了大量激扬文字。《湘江评论》第一期的几乎全部，以后三期的一半以上都是毛泽东执笔的。

在《湘江评论》上，毛泽东写了不少破除迷信的短文。有一次因雷雨，岳麓山一株大树下数人触电而死。有人说这是“五百蛮雷，上天降罚”。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一篇《不信科学便死》的短文，说明大树下容易触电的原因，并以此号召群众学点科学知识。毛泽东号召群众打破迷信，解放思想，起来打倒人们心目中的“强权”、“命运”等偶像，扫除那些长期以来束缚人们头脑的旧思想、旧习惯。他说：迷信鬼冲、迷信物象，迷信命运，迷信强权，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不认有真理。这是长期以来人们受压迫、受各种强权支配的结果。

1920年6月25日，周世钊以自己的字东园作笔名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了《为长沙师范事敬告当局》的文章，叙述了他对于破除迷信的主张。全文如下〔10〕：

长沙师范之事，已经数日。未闻当局有若何之办法以善其后，愚窃惑焉。夫长师学生破坏偶像，虽有手续上之错误，然破除迷信，用意未尝不是；且亦不能谓为有若何之罪也。而地痞竟敢公然鸣锣聚众，持械破门，捣毁校中器具，焚烧学生行李，拳棍以打学生，烈火以烧学生，卒至学生死者数人，伤者数十人。此古今中外所未闻。……政府若终无办法以善其后，吾恐湖南之祸犹未已，湖南之黑暗且日甚，而吾不暇为政府悲矣！以余所见，方今政府必做到以下四条，方可以平公愤，弭后患。（一）严办凶犯及发纵指示之人；并处分去年请恢复城隍庙之街绅。（二）勒令附近街团赔偿学校与学生之损失。（三）勒令附近街团，抚恤死亡学生，医治受伤学生。（四）以命令撤销城隍庙，将庙址拨归长师，并逐渐毁城内各庙宇。非如此，则后患甚大。痞风滋长，将来不免再有此类事实发现。一也。使人民相信学生毁神，死由神殛，痞徒卫神，逮得神佑，迷信更深，贻患无极。二也，历年以来，教育遭张督推残，学生已无生气，方幸恶魔已去，改进有期，若任痞徒蹂躏，是遏其方兴之气，绝其再生之机，以后湖南教育，永远沉沦，万劫不复矣。三也。张毒在湘专肆贪残，运动驱除起于学界，然其时犹未有此等惨剧也：“义”军临省，未及浹旬，而市民即发生此等暴动。事前既失防维，事后又无办法，不亦有失湘人之望，而贻远近之笑乎！四也。而况风声播扬，变本加厉，乡愚无识，必起纠纷，凡庙址之已改为学校者，庙产之已提充学款者，均将由此生出纠葛；纷乱沸腾，伊于胡底，政府于此，不可以为细事而忽略也。故宜当机立断，以做愚顽。至于正本清源，则社会教育，自不可缓。

1919年11月14日，长沙发生了一起轰动全城的新娘在喜轿中自杀的事情：一个在南阳街开眼镜店作坊的赵某的女儿赵五贞，不愿嫁给在柑子园开古董店的吴凤林。向父母力争，没有得到同意，遂于抬赴吴家的途中，用剃刀割断咽喉，自杀于喜轿中。

在 11 月 16 日的湖南《大公报》上，毛泽东发表了《对赵女士自杀的批评》，他指出：“赵女士的自杀，是环境迫着她求死的。”他又郑重提出：“这件事发生的原因，是婚姻制度的腐败，社会制度的黑暗，意志的不能独立，恋爱的不能自由。”继这篇文章之后，他从 11 月 18 日到 28 日几天间，又写了《赵女士的人格问题》，《社会的万恶与赵女士》。《非自杀》，《恋爱问题——少年人与老年人》，《婚姻上的迷信问题》等论文和杂感共八篇之多。这些文章集中攻击了吃人的礼教，攻击了封建的社会制度。

由于毛泽东的发动，长沙各报刊都展开了对这个惨剧的讨论。除《女界钟》结合这个惨剧大张旗鼓地进行了妇女解放的宣传外，许多教育界、新闻界人士，以及青年学生都写了文章，展开热烈的讨论。

1919 年 10 月，周南女校学生主办了周刊《女界钟》，新民学会会员周敦样担任了总编辑，毛泽东，周世钊等会员支持周刊，他们不仅勉励周敦样树立信心，而且给这个周刊写稿。赵五贞自杀后，毛泽东建议《女界钟》出一期特刊，附于第 4 期，毛泽东给《女界钟》写的第一篇文章里论述妇女要实现经济独立，第二篇文章是为特刊写的。周世钊、陶毅等写了文章，主张改革父母包办的封建婚姻制度，代之以婚姻自主，自由恋爱〔16〕。

湖南《大公报》也开展了妇女解放问题的讨论，在先后发表的二十多篇文章中，有的不仅提出了要改革婚姻制度，而且涉及到改革社会制度这一根本问题。周世钊以停元字发表了《女子教育》一文，刊于 1920 年 11 月 20 日的湖南《大公报》上。全文如下〔10〕：

女子解放，为当今要紧的事，而女子解放的第一步，就在男女教育平等，所谓教育平等，不但是小学教育平等，还要使女子也和男子一样，有求高深学问的机会。于今北京大学已开女禁，招收女生，女子算是有求高深学问的机会了；然而没有一个做人大学预备工夫的女子中学，则女子之于求高深学问，还不是“望梅止渴”罢了！湖南人呀！你们天天谈自治运动，天天闹文化运动，不要忘了女子教育的重要呀！尤其不要忘了女子中等教育的重要呀！……

四 同床共梦

在修业小学时期，毛泽东和周世钊的生活仍很穷苦。修业小学给毛泽东的工资只有几元，吃饭以外就无剩余。他们两人的生活都特别清苦。而他们的友谊却更加纯挚笃诚了。

冬寒季节，周世钊经常看到毛泽东的房里灯火荧荧，深夜不灭。周常去劝他早点休息。毛却说：“约稿未齐，出版期迫，不得不多写几篇，少睡几点钟没关系。”毛泽东的工作忙碌，生活十分简朴。他的被子单薄，有时睡到寒冻难受时，毛泽东就卷着自己的被子到周世钊床上共睡互相取暖。共同度过寒冷的长夜。

1926年3月9日，长沙教会育坪召开上万人的市民大会，满街贴着“打倒赵恒惕”、“反对联省自治”等标语。于是湖南省长赵恒惕于3月13日自长沙逃走了。毛泽东于1926年12月回到了长沙，积极从事湖南农民运动工作。

几年来，使周世钊最不能忘怀的是稻田师范的一段谈话。一天，毛泽东从仁术医院看病出来后来到了稻田师范，手中还拿着药瓶子，毛泽东坐到周世钊房里，畅谈了他最近考察农村的经过，极力赞扬农民运动的成就。毛泽东说，农民协会不是糟得很，而是好得很。并说准备写一篇文章专谈这一次考察的观感。又说：“我们过去只喜爱文人学士写的典雅华丽的文章，对农民歌谣觉得庸俗可笑，我此次跑了几县，听的民歌不少，觉得他们的歌谣是有血有肉，情真意切，万万不是文人学士那种空文废话，无病呻吟所能比拟。我边考察，边搜集，已抄集一厚册，打算交许文煊加以整理。”周世钊听后觉得头脑清新多了。

几天之后，毛泽东开始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同时准备往武昌主持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工作。

1927年春天，湖北、江西、福建、特别是湖南的农民运动，不管有的人对它的态度如何畏缩和国民党对它如何歧视，已经发展到惊人的程度。此时，毛泽东在武昌主持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对农民运动大唱赞歌，热情支持。

就在1927年的三四月间，毛泽东从武昌给在长沙的周世钊写了信，谈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一些情况。周世钊接读了这封珍贵的信，并且印象极为深刻。可惜的是这封信件在以后颠沛流离的生活过程中散失了。

五 东南大学与自修大学

1921年5月，何叔衡免去通俗教育馆馆长职，周世钊被驱逐出通俗报。于是，周世钊觉得要升大学，此其时矣。当时，他在通俗报每月有30元薪资，9个月的工作也积累了一百多元，足够一年的旅费和学费。同时，东南大学正招收特别生。只叫教过书的得到省教育厅的保送，即可入学。此后，周世钊和蒋竹如等几个同学商量，同到教育厅申请，得到通过，并获东南大学复信批准。周世钊等收拾行李，准备动身去南京，将实现多年的“大学梦”了。

1921年6月中旬，离周世钊动身只差两三天的时候，毛泽东约周世钊到长沙文化书社谈话。毛将陈独秀的信给周看，信内提到湖南应大量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毛泽东又将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始和发展情况加以详细说明，并说发展的任务很重要，周世钊可担任这个任务。照理说，周世钊是新民学会会员，毛泽东的这种嘱托应该爽快接受，绝不会推辞的。可是，入了“大学梦”的周世钊经过慎重考虑后对毛泽东说：“我打算读大学，已约好同伴，定了行期。青年团工作的重要性，我也知道一点，但此时你可交另外的人负责，我等一些时候再说吧。”毛泽东听了这一番话，知道周世钊入了升大学的迷，也不再说什么了。

过了三天，周世钊和蒋竹如等乘轮启程，到汉口转长江轮东下，只花十元路费到了南京。

在毛泽东致周世钊的长信中，1920年3月的毛泽东就提出“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现共产的生活。”毛泽东说到做到。他在参加中共成立大会回到长沙后，即在1921年8月，毛泽东利用船山学社的经费和社址，创办了自修大学。

1921年8月16日长沙的报纸刊出“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在第一章“宗旨和定名”中说：“本大学鉴于现在教育制度之缺点，采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现真理，造就人才，使文化普及于平民，学术因流于社会。由湖南船山学社创设，定名为“湖南自修大学”。简章发出后，湖南文教界议论纷纷，称为怪事，认为这是不伦不类，无根无叶的组织。

周世钊在东南大学当特别生。教他们西洋哲学史的是副校长刘伯明博士。他虽用英文教本，但讲课时每每脱离教本，自由发挥。他是东南大学复古派首领。1921年暑假，他由湖南省政府邀请到长沙讲学，听到毛泽东创办了自修大学，大不以为然。他在讲希腊哲学所以发展的时候，大大丑化自修大学，他说：“大学而可自修，真是千古奇谈！”周世钊是懂得自修大学创建的原因与伟大的作用的，听了刘伯明的话，认为“井蛙不可语于海，夏虫不可语于冰，徒然令人好笑而已。”这年的寒假，周世钊回到长沙，就住在自修大学，常与驻校的负责人何叔衡长谈，进一步了解了自修大学的一些打算。

当时，蔡元培看到《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欢喜得了不得！”认为这所大学“注重研究，注重图书馆、实验室，全与我的理想相合。”他热情地撰写了一篇《湖南自修大学的介绍与说明》，发表于《新教育》杂志第五卷第一期，广为传播。在这篇长文里，详细说明了他自己对于发展中国教育的主张，反复强调：湖南“自修大学的组织”，“合吾国书院与西洋研究

所之长而活用之，其诸可以为各省新设大学之模范者与” [15]。

1922 年暑假，周世钊已在东南大学读了一年特别生。他想改变这种求学方法，首先要通过入学考试，变为正式学生。放假后，周世钊回到长沙，目的在于筹措学费和准备考试。

周世钊在长沙无别处可住，他向何叔衡要求寄居在自修大学，何叔衡叫人收拾两间房子给周居住，在这里看书、休息都很方便。毛泽东、何叔衡都住在这里。

每当晚饭以后，赤日既落，凉飏渐生，自修大学留校的学员和毛泽东、何叔衡、周世钊都坐到坪中乘凉。毛泽东每每畅谈社会主义的理论，十月革命的详细经过和深远意义。有一晚，一个姓邹的学员忽然提出一个问题说：“我认为要使革命成功，有必要的三个条件：一要道理上说得通，二是事实上做得到，三是人情上过得去。我看你讲的道理是说得通的，事实上也可能做得到。可惜的只怕人情上过不去。”毛泽东听了。又详细地将所谓人情分析一番，结论是人情上最过得去的。邹同学也就无话可说的了。

周世钊的学费问题，经王季范先生介绍，楚怡学校的陈润霖校长以学校名义，每年津贴百元学费，条件是毕业后为楚怡学校教课若干年。周世钊得到这种资助，感激万分，学费问题遂告解决

六 文化书社与共产党

在周世钊敦促毛泽东回湘从事驱张善后工作信发走不几日，毛泽东于1920年7月7日回到湖南。他迅即同周世钊等新民学会会员酝酿如何学习马克思主义，研究俄国革命，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问题，决定首先抓住创办文化书社的大事。

1920年7月31日，毛泽东在湖南《大公报》上刊登了他撰写的《发起文化书社》一文。文章说，湖南没有新文化，全中国也没有，全世界也只有“一技新文化的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又说：“没有新文化，由于没有新思想；没有新思想，由于没有新材料。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文化书社愿以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研究的材料。”

1920年8月2日，文化书社发起人会议在楚怡小学何叔衡处开会。会议通过了《组织大纲》，并推定毛泽东、彭璜、易礼容为筹备员。8月20日，租定长沙潮宗街56号为社址。

1920年9月9日，文化书社正式开始营业，易礼容任经理，毛泽东任特别交涉员，负责与全国有关方面联系、增订书刊。毛泽东召集新民学会会员开会，当时留在长沙的会员有周世钊等20余人，决定每人分担股款十元，再请有关人士赞助、支持，筹集了约1000元资金。文化书社销售最多的书是《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俄国之研究》、《劳农政府与中国》、《晨报小说》等。销售最多的杂志是《新青年》、《劳动界》等。为了便利买书，文化书社在长沙的第一师范、修业、楚怕等许多学校设立了代销处，又在平江、宁乡、浏阳、溆浦等县城设立分社〔17〕。

根据文化书社社务报告（第二期）记载，1921年12月29日召开了议事会临时会，到会者：贺寿轮、王季范、周惇元（世钊）、郭涛僧、彭荫柏、熊瑾珂、赵运文、刘馥皆、毛泽东诸君，讨论“另觅社址”及“添筹股本”两个问题〔10〕。于是在1922年迁到贡院西街，1926年又迁到水风井，1927年马日事变后被国民党反动派封闭。

文化书社存在达七年之久，在此期间，它在湖南境内广泛地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推动了新文化运动。它是新民学会的国内外会员联络的场所，也是省内外马克思主义者联络的场所，为在湖南建立和发展党、团组织，培养骨干，打好了稳固的基础。它是湖南进行革命活动的开路先锋，传播了革命种子。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约四十年以后的1959年，周世钊作词《南歌子·长沙文化书社》：尘雾三千丈，欺蒙亿万端。塞聪闭视夜漫漫，忽报一潭死水起波澜。马列张新帜，劳农夺大权，首凭书报大宣传，唤起人民革命换新天。

1921年6月，毛泽东接到上海的通知，即将召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即与何叔衡前去上海。他们动身时的情形，据谢觉哉的回忆：“一个夜晚，黑云蔽天作欲雨状，忽闻毛泽东和何叔衡即要动身赴上海，我颇感他们的行动突然，他们又拒绝我们送上轮船。后来知道，这就是他们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6〕。”

1921年8月，周世钊在南京鼓楼附近住，一方面去探询东南大学的入学手续，一方面到南京名胜地方游览，生活过得颇自在。有一天，毛泽东忽然来到周世钊住处。当时，周世钊等都不知道，毛泽东是出席中共成立大会到

上海的，会议已毕，乘车到了南京，将从南京乘船回长沙。周世钊等在惊异之后，问毛泽东到南京的目的。毛泽东说：“听说你们到了南京，特来看看。我认为你们到大学读书，同时还可做点革命工作，我打算在南京设一个长沙文化书社的分社，请你们担负这个分社的责任。我回长沙后，即将可以出售的书和必需的经费设法寄来。”毛泽东谈完这些话后，即匆匆往下关赶上水轮口长沙去了。

现在的清水塘，已是长沙热闹的市区。而在70多年前，它不过是长沙城外一个冷静、荒僻、无人注意的地方。一片菜畦，几间茅屋，隐蔽在三面长满绿树的小山之中。菜畦的南面有两口清浊分明的塘：上塘水浊，下塘水清；上塘浊水一经流入下塘，就由浊变清，和下塘的水色一样。所以，当地居民把下面一口塘叫做清水塘。塘边间植柳树，风来水动，树影婆娑。从小吴门来此，必须走过一段不短的弯弯曲曲的小路。

1921年秋天，毛泽东和何叔衡住在自修大学的时间很多。为了找个僻静的地方开展党的活动，就注意到了清水塘。毛泽东自参加党的一大后，被任为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兼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书记。他在离自修大学不远，又不为人注意的清水塘租赁了几间房子，租约上面署了第一师范教员毛石三的名，并写定租赁期为七年，把这里作为才建立的中共湖南省委的地址。

1922年暑假的一个晚上，毛泽东要到清水塘开会。这里常是党员开会的地方，开会的时间常在夜深人静时。这天夜里，毛泽东邀请周世钊同往。周世钊到清水塘时，已有十多人先在，他们有穿学生装的，也有赤脚穿草鞋的。开会时，周世钊坐在旁边的椅子上边听会议讨论，边看当天日报，经过两个小时左右，周世钊随毛泽东回到自修大学。这是周世钊第一次到清水塘。

1974年，周世钊瞻仰了清水塘，写了《沁园春·瞻仰清水塘革命圣地志感，即以庆祝党的53周年纪念日》的词作的前半阙是：清水塘前，巨手高擎，火炬彤彤。自党基初奠，旗张马列，湘区继建，戟起工农。路线斗争，武装暴动，席卷东南早奏功。真奇伟，是星星火种，照彻长空。

七 火热的斗争

1919年5月9日上午第二堂课后，周世钊从课堂出来走到办公室，刚进门，就听见有人在高声念今天报纸上的专电和快讯：

“4日下午一时，北京学生五千多人，在天安门集会，举行学界的大示威。高举写了‘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誓死力争’、‘保我主权’、‘头可断，青岛不可失’、‘卖国四大金刚应处死刑’的白色旗帜……。游行示威的81学生，行至赵家楼曹汝霖宅，打破窗户，将卖国贼旗子掷入屋中。曹宅忽然火起。”

“章宗祥时在曹宅，学生见之，愤而殴击，章负伤甚重。”

“曹汝霖狼狈逃避六国饭店，因北京人心激昂，又走奉天，藏入日租界。”

“北京学生。现被捕去三十余人。大学校长蔡元培愿独身抵罪……。”

周世钊听完这段消息，既感到痛快，也感到愤怒。痛快的是打了卖国贼，愤怒的是北京政府逮捕了学生，外交上没有取得胜利。消息立刻传遍了整个长沙城〔12〕。

在修业小学教课的毛泽东，除紧密和新民学会会员及各学校学主骨干分子联系外，又广泛和新闻界、教育界人士交换对时局的看法和湖南人民支援北京学生、反对卖国外交的具体意见。他认为必须恢复和改组湖南学生联合会，湖南学生联合会的会长为彭璜，长郡中学和第一师范学生代表被推为评议部和执行部主席，他们都是新民学会会员。联合会会址设在落星田商业专门学校，离修业小学很近。毛泽东每天都到商专和学联负责人研究问题，指导学联工作。他为学联起草罢课宣言和各种活动计划，他虽未在学联任什么具体职务，但他是不具名的实际总司令。接着，毛泽东又创刊《湘江评论》，自己写稿，自己编辑，自己校对，有时还自己到街上卖报，真是日夜忙碌。第一期《湘江评论》终于在七月十四日出版了。有人说，《湘江评论》就是湘江的怒吼，就是湖南人民的声音。可是，恨《湘江评论》的人也不少，反动军阀张敬尧就在它只出五期的时候横暴地封闭了学联和《湘江评论》，《湘江评论》只存在了一个多月。

四十年后，周世钊重游长沙的五四旧地，感怀喜赋《浪淘沙·访修业学校》：夏雨喜同游，重上东楼。卅年前事到心头。五四风云筹策地，胜迹长留。破碎叹金瓯，烟瘴谁收？狼将大论正沉浮。要挽湘江千丈水，荡涤神州。

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在长沙迅速展开，不但在城年，而且到了郊区小学。63年后的廖沫沙有一段有趣的回忆。他在1982年回到长沙故乡，回忆了当时小学的活动。曾有人著文道：返回长沙的途中，廖老又特地来到梨慎陶公庙。这里是他的母校——长沙县立第二高小的旧址。庙内戏台犹存，古木参天，大部分屋宇依旧。看到这一切，勾引起老人许多幸福的回忆。他从戏坪拾级而上，来到正厅，又来到当年的礼堂。这时几位老师搬来椅子，叫大家休息休息。廖老对大家说：当年学校开大会，就是左这个礼堂里。“五四”运动时，我就坐在这里听过周世钊和肖子升（肖三之兄）的演讲。他们宣传革命的道理，反对封建礼教，反对迷信思想。有一次他们讲到神，给神画了这么一幅像，叫作“一不做声，二目无光，三餐不食，四肢无力，五官

不全，六亲无靠，七窍不通，八面威风，久坐不动，实实无用”。说得很形象，所以几十年以后仍然记得很清楚。他还说，那时大家都十分重视读报，每个同学出几个铜板，集体订报，有北京《晨报》、上海《申报》、《湖南通俗报》等，张贴在课堂的后墙上，下了课大家就去看〔18〕。

关于给神画像的诗，毛泽东在延安的一次干部会上曾经套用过，毛在谈到官僚主义时说：“官僚主义的特点是脱离群众。”接着他念了那首咏泥神诗。他说：“除了三餐不食这一点不象外，官僚主义者的其他方面都象一个神像。”

张敬尧作了湖南督军兼省长之后，他的三个弟弟敬舜、敬禹、敬汤一起同来，他们仗着北洋军阀的势力，括钱殃民，无恶不作。

毛泽东、周世钊等看到张敬尧的罪恶与日俱增，人民的痛苦到了不可再忍的程度，于是他们秘密进行驱逐张敬尧的活动。

1919年的11月间，湖南国货维持会学生调查组在火车站起获了同仁裕等各家购进的日货布匹、南货，数量很多。经评议部议决，于12月2日举行示威游行后，将所获的日货全部焚毁。

1919年12月2日，长沙一些先进人物举行焚毁日货的游行示威。军乐先导，毛泽东及学联、商会负责人走在最前头，然后是抬日货的队伍，最后才是游行的长队学生与工商界人士。周世钊带领修业高小的学生参加游行。游行队伍的两边都牵着日本布围绕着队伍而行。沿途高呼打倒卖国贼，打倒奸商、禁止仇货等口号，队伍到达教育会坪，将日货堆集坪中，学生和工商界人士队伍围绕日货站成一个圆形队伍，学联负责的学生正爬上设置在坪中的桌子上，宣布焚烧日货的重要意义，准备举火焚烧时，张敬尧的四弟张敬汤骑着马率领一大队士兵冲进坪中来，将学生及工商界的队伍包围起来，同时又以一队带刺刀的兵围绕着堆集的日货，面向四周的学生和工商界的队伍而立。张敬汤赶下学联负责的学生，自己爬到桌上，大骂学生：“你们这些学生不读书，来抢劫东西，来放火，抢劫放火是强盗，男的是男强盗，女的是女强盗。我们对强盗就不会客气，打呀、杀呀，就是唯一的办法。”他讲完这段，就命令包围的那些兵向外散开，他们把刺刀对准学生的胸口逼着退出教育坪外。张敬汤竟将待烧日货捆载而去。

日货没有烧成，反被张敬汤辱骂，在场的学生和工商界人士，无不气愤万分。

12月3日下午，毛泽东、周世钊和蒋竹如等一批新民学会会员，聚集在白沙井枫树亭易培基家开会（当时易是第一师范的国文教员），研究形势，商讨对策。他们认为湖南人民对张敬尧恨之入骨，青年学生和教育界忍无可忍，驱张有群众基础；张敬尧劣迹昭著，臭名远扬，驱张可得到全国舆论的支持，直皖两系军阀勾心斗角，矛盾重重，是驱张的大好时机。

尔后，毛泽东约集学联、商会负责人和工人代表开会，决定组织各界联合驱张运动团，派代表分赴北京、上海、衡阳等处，要求北京政府撤换张敬尧，要求吴佩孚以兵力胁迫张敬尧离职，要求上海及全国各地报纸揭露张敬尧祸湘的罪恶，发动全省学校总罢课。周世钊在长沙作了一些缮写函件，并把一部分揭露张敬尧罪状的文件送到日本邮局（此时，日本有邮局设在长沙小西门）投发等工作。

张敬尧终于在1920年6月被驱逐出湖南省。

1923年的暑假，周世钊回到长沙，仍寄居自修大学。不久，被人介绍到

一个姓盛的家作暑假家庭教师，教他男孩作文，每天在盛家中餐，早晚则在自修大学寄餐，一个月中得 30 元的报酬。作为大学学费的一部分。

此时，毛泽东辞去一师职务，集中精力领导湘区党委，发展党员，领导党员开展工人运动，亲自领导长沙泥木工人运动取得胜利，影响至为巨大。各行各业相继罢工。大的如粤汉铁路的罢工，安源路矿的罢工，水口山矿局的罢工，长沙市内则有裕湘纱厂的罢工，南货业的罢工，缝纫业的罢工，理发业的罢工，人力车夫的罢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使赵恒惕和他的喽啰大伤脑筋，忌恨于毛泽东。赵恒惕对人说：“湖南还只有一个毛泽东，假使再有一个毛泽东，我就滚都滚不赢了。”

有一天，周世钊到自修大学见到毛泽东正将印好的《驱赵宣言》准备分发。周世钊对毛泽东说，这事当谨慎，他们是可以捉人的。毛泽东听后，神色泰然，只回答一句，不要怕。宣言终于发出去了。

不久，赵恒惕竟派兵搜捕毛泽东，在文化书社和清水塘都没有捉到，于是出广告，悬赏格，以图一逞。有一星期天，周世钊在街上看见毛泽东在看那张悬赏捉人的广告，用伞遮挡毛泽东，以避耳目。当时在楚怡中学教书的邹蕴真上街购物，忽然看到了毛泽东，他惊异中低声问毛泽东看见广告没有？毛泽东说：“早已看见，没有什么关系，我知道你是住在楚怡的，下午我一定来看你，”下午二时左右，毛泽东真的到了楚怡，邹蕴真劝他离开长沙，毛泽东说：“你放心，我即刻就走，只好以后再见了。”毛泽东为了托人接替他的工作，同时要向人指示以后的斗争策略，所以匆忙奔走于街巷，他的确是胆大包天了。

1923 年 11 月，赵恒惕撕破脸皮，下了一个“手谕”：“自修学校，着即取消”。毛泽东又办了一所正规中学，他曾问过周世钊，这所中学叫什么名字好？周说：你以前办了《湘江评论》，这个学校就叫“湘江中学”罢。于是，湘江中学诞生了。湘江中学由新民学会会员罗宗翰担任校长。原在自修大学的二百多学生，大部分转到了这个学校。

八 蔡和森·罗学瓚·杨开慧

1923年2月间，周世钊作为东有大学国文系的正式生留校过寒假，未回长沙。有一天，忽接蔡和森自上海来信，言他和向警予、罗学瓚已从法国回来，住在上海某旅馆，邀周世钊往上海一谈。周世钊正准备乘车前往，恰好女同学胡斌也要到上海看望熊希龄，因此结伴同行。当时的火车很慢，早晨出发，晚十一时才抵上海。找到蔡原住的旅舍，他已迁居他处，周世钊和胡斌按照蔡留的地址去找。由于初次到上海，人地生疏，语言又不通，找来找去，一直找到十二点多才找到。蔡和森从睡梦中起来招待他们。这时向警予怀孕有病，卧床不起。蔡和森劝他们不必去住旅馆，叫向警予和胡斌同床睡，蔡和森和周世钊坐火盆旁作长夜谈。

蔡和森首先谈法国的情况，他学习后认为中国革命一定要走十月革命的路，就是暴力革命的道路。周世钊谈了东南大学的学习情况。然后，蔡和森直率地对周世钊说：“我看你可以不读这样的大学，我认为今天读大学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你不如离开东大同我们到上海来玩。”周世钊很懂得玩的意义，同时他还有继续学习、成名成家的思想，因此对蔡和森说：“我有学习兴趣，不想抛弃，并且你们革命成功之后，还是需要文化的，我认为我今天的努力不是和你们背道而驰的。”

次日早餐后，蔡和森约罗学瓚一道邀周世钊去半淞园游览，坐在园中石凳上又谈了半天。罗学瓚也劝周世钊不必再读大学，周世钊皆应详加考虑后决定。罗学瓚又问到毛泽东近况，周世钊以所知道的概况告诉之。罗学瓚回忆1919年从上海赴法时毛泽东的一段谈话说：“我们同毛泽东一道从北京到上海，准备定船赴法的前夕，毛泽东约集我们开了一个会。会上，毛泽东谈到赴法勤工俭学的重大意义，也谈到我们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最后，他宣布他自己这次不去留法了。我们听了都很惊异，问他为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辛苦经营将近一年，为什么到临时时忽然变计呢？毛泽东说：‘我想，我们这些人中，要有人出国，学习新思想，新知识，以贡献祖国，也要有人留在国内，研究本国问题。我对本国问题有研究兴趣，但研究还不够，因此作出这种决定。’现在，毛泽东大概正在实行他的研究计划了。”

时间到了下午，周世钊要坐赶回南京的火车，蔡和森、罗学瓚送他上了车，即匆匆分别了。

以后，蔡罗两人为了革命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先后在斗争中牺牲了生命。1972年，周世钊奉毛泽东之命，从北京到上海，特重访半淞园。半淞园曾是新民学会在上海会友活动过的场所。但是，半淞园曾在日寇进攻上海时被炸毁，解放后遗址建有工厂，面貌已全非了。而周世钊的脑海中，旧事翻腾，追怀在事，写了一首《南歌子·访半淞园旧址》：

故地馀秋草，凉风振客衣。半淞园里对晴晖。长记蔡罗教我撷芳菲。忠烈垂青史，风云卷赤旗。丹心碧血焕光辉。叹息斯人一去邈难追。（蔡罗为革命事业先后壮烈牺牲。）

（原词注：1923年春，蔡和森、罗学瓚自法回国，我自南京往上海访之，同游半淞园，畅谈半日。）

这首诗被收入 1980 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怀念蔡和森同志》一书中。同书中，罗章龙也写下了《肝胆轮困怀国士》一诗，怀念蔡和森，称蔡是“枫华白露正华年，历史车轮君领先。”〔19〕

在毛泽东去武昌前几天的 1927 年春天，周世钊到了毛泽东住处——长沙的望麓园，会见了毛泽东与杨开慧。杨开慧特地上街去买了糖果招待周世钊。这次见面，可能就是周世钊与毛泽东阔别 23 年的开始，也是杨开慧与周世钊的最后一次见面。

周世钊对杨开慧一直敬重。可惜杨开慧在 1930 年 10 月不幸被捕。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刺刀面前，杨开慧铁骨铮铮，坚贞不屈，不久在长沙识字岭英勇就义，年仅 29 岁。

1957 年 5 月 11 日，毛泽东写下了纪念杨开慧的《蝶恋花·答李淑一》：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1968 年，长沙地区冲破重重阻力，隆重纪念革命先烈杨开慧。是年 11 月 24 日，是杨开慧烈士英勇就义 38 周年，长沙市和长沙县开慧公社隆重举行纪念大会，周世钊毅然参加了大会。并在 1968 年 11 月 20 日的《湖南日报》上发表了词作《满江红·为开慧烈士殉难纪念会作》：

清水塘边，早经历峥嵘岁月。干革命，艰难险阻，志坚心决。睥睨王侯皆粪土。唤呼群众除蠹贼。更辛劳，翊赞树奇勋，参筹策。松柏劲，凌霜雪，珠玉碎，留晶洁。看从容笑对，敌人锋镝。碧海扬波迎浩气，青年焕彩昭芳烈。慰忠魂，胜利到全球，红旗密。〔20〕

九 两种大学毕业证书

1926年下半年，是周世钊在东南大学的最后半年。周世钊是穷学生，每学期都要七拼八凑筹学费，既要耽误时间，又要分散心力。他在大学几年的学费来源，除楚怡学校的津贴外，还想以下方法加以筹措：

1. 争取得到湖南教育厅的奖学金。湖南教育厅规定凡国立大学学生学年成绩分数达到八十分以上者给以百元奖金。周世钊为了想得到这笔奖金，只好认真通过考试和认真准备论文以及尽力写作，以求达到获奖的标准。

2. 寒暑假充当家庭教师，以得到微薄的报酬。

3. 请假到学校教课。周世钊在1924年暑假期间，江浙军阀用兵交成，东大开学延期，周世钊向学校请了一个多月的假，到徐特立新办的长沙女子师范教了两个月的语文，1925年，徐特立担任湖南第一师范校长，周世钊又向东大请假休学一年，教了几班语文课。都得到一些薪金。

4. 打会借钱。

5. 记录讲演，撰写论文投登报刊，获取稿酬。

周世钊回顾在东南大学的四年半艰难生活，由于学校的腐败，他自己因许多问题不能专心读书，收获实在太小。他想，既浪费了宝贵时光，又辜负了一些友好的帮助。清夜自思，惭悔交织。特别想到1921年在长沙文化书社，毛泽东叫他担负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他没有接受，在革命队伍中怯阵一次。1923年，在上海半淞园，蔡和森、罗学琐劝他退出大学，参加直接革命活动，他又托辞规避。假如他听了毛蔡罗诸友的话，可能已在革命斗争中经受了锻炼和考验，做出了一定的成绩，比起得到一张大学毕业证书来，相去何啻天壤？

从1921年7月到1927年1月，周世钊在惭悔的心情中在东南大学求学，从而获得了一纸大学毕业证书，被授予学士学位。

从1921年7月到1927年1月，毛泽东参加了中共一大会议，经受了实际的革命，进行了许多有意义的社会活动。毛泽东是得到了一张真正的革命大学的毕业证书。

周世钊受到毛泽东等人的影响，对于当时腐败的政客官僚，有一定程度的鄙视、憎恨和厌恶。同时，周世钊还在长沙女师和湖南第一女师教书一年多，和徐特立校长朝夕相处，看见徐特立不避辛劳，不怕艰苦，勤勤恳恳，诲人不倦，那种为了教育忘却自己的精神，深深感染了周世钊，他觉得作一个好教师是有意义的，有价值的；教育工作做得好，也可以得到社会的荣誉，青年的敬爱，因此加深了他从事职业教育的思想。这也是一种对他的东南大学毕业证书的补充证书。

第五章 异地同梦

1927年，在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对革命实行残酷镇压的时候，毛泽东在湖南领导了秋收起义，再带领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以农村包围城市，在实践中充分运用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1935年，红军长征到了贵州遵义，中央召开了扩大的政治局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以后，毛泽东胜利长征到达延安，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战争。1945年抗战胜利后，又亲赴重庆与蒋介石进行了谈判。谈判破裂，又进行了四年的解放战争，直到1949年10月1日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1927年10月，周世钊经东南大学同学何经渭的介绍，到湖南私立明德中学教书，以后又到周南女子中学、省立第二中学、第一师范、长郡中学、长沙师范、妙高峰中学等教国文课，直到1949年7月，过了22年的教书匠生活，未离开学校一步，更未离开湖南一步，一直过着“教书吃饭”的生活。

毛泽东与周世钊虽然不在一起，不曾见面，但他们的心是息息相通的。

一 想念

湖南的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在毛泽东的领导下，风起云涌。到了1927年。进入了高潮。工农运动冲击着社会上的一班吸血鬼，一些上豪、劣绅、贪官污吏和投机革命的大小军官，他们对革命群众运动特别是对工运农运的领导者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但慑于共产党和工农群众的威力，勉强忍受，不敢反对。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叛变革命，在南京、上海等地疯狂屠杀共产党人。以唐生智力首的湖南军阀，为加强长沙的反革命力量，将许克祥团调到长沙，引起谣言四起，市面气氛十分紧张。

《南岳日报》在这种紧张形势下，每晚提早编报时间，编辑人员都发通行的普通口号和特别口号。5月21日晚，周世钊匆忙把本省新闻的稿子编好，临出馆回校时。要了两种口号。这夜有小雨，周世钊叫了人力车坐到育婴街西头将进东茅巷对，口上站了两个持枪带刀的兵士，大呼口号，周世钊在车上答好，他们又呼特别口号，周世钊将手里写好的四字特别口号交出，兵士看了还不放行，并叫周世钊下车，将车子仔细检查一遍，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东西，但仍不准进巷。周只好改变主意，不去稻田师范了。他有一个同乡在东长街开了一个小小的蔬菜店，暂往那里借宿。周世钊的车子到了东长街，大概不到十分钟，后面就枪声大作。周世钊正93在惊疑问，听到全城到处有枪声。他急忙走进蔬菜店，而听到枪声越来越密，似乎就在面前，在惊疑中糊里糊涂睡了一夜。次日天明，已不闻枪声，周世钊急忙从东茅巷回稻田师范，见东茅巷的两边墙上都密布了枪弹的痕迹。这是反革命军队围攻设在东茅巷的湖南总工会时留下的。他路过总工会，见门前空无一人，惟乱纸乱木器堆集很多。入古稻田，见大家面色惊惶，正在议论昨晚事故。稍晏，有人自外归，言昨夜是许克祥的兵，围攻工会、农会、党校、法院等处，打死了很多人，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都躲避一空。周世钊回到房中，将一些党的宣传刊物《向导》等收藏好，然后上街看看，只见弹痕满壁，杂物狼藉，有些地方发现许克祥的布告，这就是周世钊所经历过的“马日事变”。

这天以后，周世钊继续听到一些师友的消息。毛泽东是早已去武汉了的，徐特立已离开长沙，何叔衡、谢觉哉、熊瑾玎、郭亮、柳直荀诸人虽不知避到哪里去了，但都未遭许克祥的毒手，心中感到稍微安慰。

马日之后，《湖南民报》即日被封闭，《南岳日报》则继续出版。周世钊辞去了馆里的职务，后住在稻田师范无所事事，只听到哪里杀了几个共产党，哪里捉了共产党嫌疑分子，心情怅惘，百无聊赖，只好邀几个熟人打牌，以消遣烦闷阴沉的日子。

1930年7月下旬，学校都放了暑假，周世钊住在长沙明德中学乐诚堂内。几天来，他听到平江方面的红军进攻长沙的消息，一天紧似一天。28日清晨，周世钊还未起床，一个教师叫醒了他，告诉他红军于昨夜进了城。周世钊立即起床穿衣洗脸，往街上瞧瞧，从北正街、东长街，转到马王街古稻田第二女子中学，大家都有同样的说法。他从稻田二女中出来，准备到北门去看一个同学，在马王街遇到一队肩负红缨枪的红军，军容整肃，他又回到明德。周世钊听说红军攻城总部驻在小吴门外，他很是想念毛泽东，三年多不见了，他想毛泽东也许来了，很想前去看望他，但又怕毛泽东没有来，其他的红军不认识，踌躇不敢前往。当时何键已逃往沅江，令部下王东原等在英国炮舰

帮助之下于八月五日对红军进行反攻，红军退驻城外。何键回城，调集很多援军，并在城外布置电网，周世钊在明德的住宅也被驻明德的国民党援军公秉藩所占。

红军第二次进攻长沙，因长沙国民党的援军群集，不易攻克，毛泽东特地从江西来湖南，说服了攻城的部队，遂解围而去。周世钊仍在明德、周南和省立第二女子中学上课，教课阅卷十分忙碌。

1936年5月，毛泽东曾致函周世钊，谈到抗日问题。周世钊想念毛泽东，毛泽东也在想念周世钊。

二 抗战岁月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感召之下和士兵的强烈要求之下，在西安华清池扣押了蒋介石。当时国内震动很大，何应钦急电在德国休养的汪精卫，阴谋轰炸西安。毛泽东高瞻远瞩，在错综复杂的情况下看穿了亲日派的阴谋，派周恩来等赴西安调解，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蒋介石被迫抗日，并同意在西安、武汉、重庆、长沙等地设立办事处。

1937年11月，徐特立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95高级参谋，驻湘代表，回湖南领导八路军驻湘办事处的工作。办事处由宁乡人王凌波任主任，设在长沙市寿星街2号。12月10日，长沙一家报纸报道说：“湘教育家徐特立离湘十余年，昨日下午二时由汉来长。徐鬓发皆白，着灰布短衣，精神奕奕，不减当年气概。”顿时，“徐老回来了”的消息，不腔而走，竞相转告。

这时，第一师范校长陈奎生邀请徐特立向学生作了一次报告，徐着重批判了“速胜论”和“亡国论”这两种错误倾向。这又使湖南人民能够听到毛泽东的声音，周世钊格外亲切地领会毛泽东的思想。听了报告的师生深受感动，抗战救国的空气，笼罩全校，大家争相阅读新书报，学生们作起文来，多数都有了新的色彩，陈词滥调很少见了。

此时，周世钊在第一师范兼课，曾教第三班、第五班和第十二、第十三班。一师学生对语文学学习很认真，下课后，常有学生跟随到教员休息室质疑问难。作文时，除作完命题外，附写诗词要求批改，所以教一师的课比教其他学校的课要忙一些，也要难一些，一师学生的思想也新一些。其中十二、十三班的学生未毕业即奔赴延安参加抗日战争的颇多。

1937年到1946年，中国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八年浴血抗战。毛泽东和周世钊，一在延安，一在湖南。白天，两人都在作抗日救国的事，晚间，大家还在作抗日救国的梦。

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进行轰轰烈烈的抗战是众所周知的。他是载入史册的抗战英雄。他为中华民族作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使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能够抵御日寇，获得最后的抗战胜利。在这个阶段中，毛泽东发表了大量著作，其中最重要的被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二、三卷）中，自1937年的《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开始直到1945年的《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共有70余篇计达555千字〔21〕。

八年抗战，周世钊在湖南教了八年书。他正如毛泽东给另一位湖南一师同学林中鹤信中所写的“为乡里启新知，为抗战培实力”。〔22〕

1943年在周南女校高17班毕业的杨澍，解放后曾任《湖南日报》记者、编辑。她在1985年写了一篇《回忆‘蓝田时代’的周南女校》的文章。文章赞颂了周世钊为国家、为抗日认真培育人才的精神。文中写道：

抗战期间，长沙大部分中学迁到蓝田，省内许多有名的教师多集中在这里。那时周南的教导主任周敦元（又名周世钊）老师，他有“才子”之称，是全省有名的国文教师，凭他的声望，同时用他自己到别校兼课作条件，为周南聘来了一些教学有方的好老师，如教数学的邓涤邦老师，教物理的黄培心老师，教化学的李静老师，教英语的袁中老师，教历史

的易仁茨老师……，他们对教育事业无比忠诚，对学生关怀无微不至。现在他们之中有的虽已离开人世，健在的也已年过古稀，但他们的音容笑貌仍铭刻在我的心中，铭刻在千万个学生的心中。

周敦元老师的国文教学是很令人回味的，现在有人把语文课堂教学分为感情型与分析型两种，而周老师的课堂教学可谓兼而有之。他独创的教学方法和循循善诱的教学态度，启发了我们对国文课的浓厚兴趣，不少同学在他的感化之下，奠定以后选择职业的基础。他自编了高中国文课本，选的是历代文学名篇，集中了中国古典文学的精华。每教一篇课文，他都详细地介绍时代背景、作者生平和文学特点。周老师是从不照本宣科的，每篇课文，他都烂熟于心，感受根深，加之他学识渊博，讲起课来，真如行云流水，毫无滞碍，听他的课，令人心无旁骛，注意力全被吸引住了。听完他的课，细细回想，好象得到了一把打开古典文学大门的钥匙。当时正值日寇节节入侵，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的时候，周老师给我们讲岳飞、文天祥的英雄故事，讲解他们的《满江红》、《正气歌》等洋溢爱国思想和民族气节的诗词，他鼓励我们要做一个爱国青年，要为国雪耻，为民造福。周老师主张“学了就用”。强调国文课的实用性，每教完一类文体，就叫我们在作文中应用。有一次，我学了韩愈的文章以后，学写了一篇论说文，周老师阅后批曰：“非读十年古书者不能”，这不仅大大鼓舞了我学习文学的兴趣，而且初步掌握了论说文的基本写作方法，这实在比阅读什么“写作教程”的效果大得多。命题作文只是周老师教学生写文章的一种方式，他还有一两篇自由命题的作文。记得有一次我写了一篇自拟的《中秋之夜》，主要是叙述一个游子抒发爱国思乡的情怀，虽然有的情节是虚构的，但却是我主观上的真实感情。当时我的二姐在一九三八年随徐老去了延安，在陕北公学学习后，成了八路军的基层干部，可恨国民党反动派的阻碍，她和亲人不能通讯联系，只能遥望云天，互相思念。我写《中秋之夜》借题发挥，一时心情激动，一口气把一本作文本写完了。周老师阅卷之后，批了满满一页评语，称它是一篇抗日爱国的佳作，鼓励青年要走抗日救亡的道路。周老师还教我们做人要正直坦荡，做学问要肯下功夫，要清心寡欲，不为名利所动。他希望我以后上大学去研究文学，但我看了邹韬奋的《生活》杂志、《萍踪寄语》以后，梦想将来当一名新闻记者。周老师知道后有些不高兴，甚至在课堂上还批评不愿致力于文学的人是“出风头”。解放以后，我真的成了一名党报记者，当我与周老师谈及这件往事时，他说：“那时我太偏激了，其实文学家也好，新闻记者也好，主要是看为什么人服务。从古到今，出卖灵魂的文人还少吗？”周老师教学育人的负责精神，是使我终身难忘的，他不但教书认真，对学生也是关心备至的。当时我是全校出名的穷学生，除学校减免我的学费外，周老师就代我交俸米，使我得以完成高中学业。毕业后，虽被保送浙江大学，但因家庭经济困难无法升学，周老师又为我介绍社会职业。解放以后，他为我参加了党根工作而高兴，也为我遭受不公正的待遇而洒下同情之泪。几十年过去了，周老师虽已离开人世，但他那四季穿着一件蓝市长袍的高大身影，他那桌上堆得小山似的作业本，他那上课时略带倦意的目光，时刻涌现在我的眼前。我虽然没有如周老师的愿望去学文学，但我却用他传授的知识进行采访报道，为湖南的和平解放以及建设事业，

尽了一点微薄的力量。

三 九州明月系离肠

1936年5月，周世钊接到毛泽东发自延安的信，毛泽东在信中告诉周世钊：共产党正与国民党协商合作对外（抗日）。周世钊读后感到很是兴奋，但是感到惭愧。这封珍贵的信件已在动荡的年代中散失，可是直到周世钊逝世前夕，他仍记忆犹新。

当年周世钊曾说，这几年醉梦糊涂的生活已将过么一点进步的芽蘖摧折殆尽，实在不应该得到领导中因革命的友人毛泽东的关怀问讯，感到自己的落后实在太远了。当时，他觉得教书是清高自适的生活态度，也是消磨他无意义无价值的生命的好办法，整天教书、阅卷、看戏、打牌。解放后回忆起来，周世钊认为这是消磨岁月、麻醉精神而已，是可耻的颓废的生活，忘记了广大劳动人民的痛苦，不敢面对血淋淋的斗争现实。对于正在西北和东南方面进行的革命斗争，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周世钊认为自己马日事变前后同情革命的心情，已因时间的过去，环境的变迁而没落了，因而自疚地说自己是怯懦无用的人。

然而，周世钊毕竟是受友人毛泽东深深影响的人，他引以自慰的，是没有离开教员生活，没有堕落到反动的党痞团棍中去。在反动军阀何键血腥统治下的湖南，到处发生杀人流血的惨剧，到处展开“皮刀”、“钻子”的斗争，到处充满蝇营狗苟的活动，恶臭熏天，乌烟匝地。周世钊看到一些知识分子，一些旧日的同学纷纷投靠反动统治集团，钻进反动的党政军机关中去，以充当反动统治集团的走卒为荣，陷于堕落、混俗、罪恶的深坑不能自拔。周世钊从灵魂深处鄙薄这些人，认为他们是愚昧卑下和可耻的。因此，在这几年中，有人劝周世钊任校长，或考县长，或参加高等文官考试，周世钊都没被劝动。有人介绍周世钊到反动军队中当书记官，他也拒绝了。易培基在南京任伪农矿部长，曾要周世钊去工作，他婉辞未去。周世钊觉得在那样昏天暗地的环境中，教书是清高的工作，学校是桃花源，培养抗战的学生是有益于民族的，他认为中国已到危亡的边缘，应该大家起来救国，学生应该用功学习，成为有救国本领的人。

延安和湖南，地理上相距2000公里，政治上，一是共产党中心，一是国民党统治区，两地要互通书信是十分困难的，尤其向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写信，更是困难重重，顾虑重重。然而，大约在1937年前后，周世钊曾从长沙致函毛泽东，毛泽东也确实收到了周世钊的信。毛泽东在1949年10月15日致周世钊函中写道：“延安曾接大示[22]。”其意即指这一封困难书信，毛泽东在十多年后仍然记得，周世钊更是印象深刻。

1945年8月14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胜利。全国人民经过八年艰苦奋斗，迫切要求和平民主。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却不顾人民的强烈愿望，要把中国再度投入反革命内战的黑暗深渊里去。毛泽东为了全国人民的幸福，为了揭穿蒋介石的阴谋诡计，率领代表团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

重庆，虎狼之地，国民党的统治中心，抗战时期的陪都，而毛泽东深入虎穴，系安全于危难之中。在长沙的周世钊，得悉毛泽东到了重庆，甚为友人的安全担忧，冒着风险致函在重庆的毛泽东，关怀友人，提醒友人警惕。毛泽东在1949年10月15日致周世钊的信中说：“寄重庆的信则未收到[22]。”可见周世钊寄重庆的关怀信丢失了。

1946年初，长沙的周南女中结束了逃难八年的蓝田历程，回到长沙泰安里旧址。周世钊拖着疲惫的身体，携着妻小随校园到长沙，他回顾八年逃难教书生活，觉得年华虚度，一事无成，心里感到特别空虚。加之国统区伪币贬值，物价飞涨，历年教书积蓄存放伪银行的一点钱也已变得一文不值，家庭生活十分困窘，心情更加烦闷。回长沙后，他虽在长沙周南女校任教务主任，但一些国民党、三青团骨干教师暗中排挤，使他的教务工作很困难，更觉得意冷心灰，愁肠百结。在这种心情下，只得借粉条消磨时间，写诗发牢骚，写的诗随写随丢，多数不复记得，后来，只回忆起一首《七律·感愤》：

人世纷纷粉墨场，独驚岁月去堂堂。沐猴加冕终貽笑，载鬼同车亦自伤。卅载专毡调骏骨，九州明月系离肠。烟尘满眼天如晦，我欲高歌学楚狂。

这首诗约写于1946年。

九州明月系离肠，这一对友人的心在明月之下仍是相互联系的。

周世钊在诗中称自己是“卅载青毡凋骏骨”。而毛泽东在1949年10月15日致周世钊函中则不同意此一说法。毛谓：“兄为一师校长，深庆得人，可见骏骨未凋，尚有生气。”〔22〕

四 周世钊课堂宣传毛泽东

毛泽东曾在 1949 年 10 月 15 日给周世钊函中说：“兄过去虽未参加革命斗争，教书就是有益于人民的〔22〕。”是的，周世钊在过去虽未直接参加革命斗争，但是他在解放战争时期的湖南长沙，一个国统区的省会的中学课堂上，经常地、公开地、积极大胆地宣传毛泽东，赞颂共产党，给许多学生以启蒙。现任徐特立创办的长沙师范学校的中共党支部书记的肖传京，1947 年毕业于周南女校，她在 1985 年写了《母校给我革命的启蒙》一文，文中有一节写“国文老师周惇元的启示。”她写道：

转学到周南后，我和大多数女同学一样向往读书、升学，对政治不关心。

1947 年进入热季的一段时间，省会学生运动闹开了，隔壁明德男校同学参加游行，在墙外呼号周南的女同学去参加。而学校校门紧闭，不让同学出去。记得学生运动高涨这几天，周惇元老师给我们上国文课，他花了很多时间讲毛主席青年时代的活动，讲他和毛主席在第一师范同学时的事情，以及后来跟毛主席在长沙时参加革命活动的情况，他赞扬毛主席的才华、学识和人品，他还介绍当年长沙市的男女青年学生踊跃跟随毛主席闹革命的热烈情况。他说：“我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毛泽东到哪里开会都爱邀我去。我要是跟他去了井冈山，也走上革命之路了。”周老师慈祥和蔼，学识渊博，是我们大家尊敬的老师。听了他的讲述之后，我不仅对共产党的怀疑情绪消失，还萌发了对毛主席的敬仰心情；联系当时社会上米价猛涨，金圆卷贬值，人民怨声载道的现象，产生了社会需要变革的愿望，从此赞同了学生运动。以后年龄大一点，对时弊认识益深，同情革命的情绪渐浓，我慢慢醒悟了。

回顾自己参加地下党活动前的思想转变过程，还是母校的进步老师给了我革命思想的启蒙，母校提供了我能看到进步书刊的条件，从这里，我才一步一步走上革命的道路。

第六章 殊途同归

经过了 1927 年到 1949 年的 22 年艰苦卓越的斗争 ,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 ,终于推翻了蒋介石的反动王朝 ,建立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经过了 1927 年到 1949 年的 22 年摸索徘徊 ,周世钊在教育工作上度过了曲折的历程 ,最后随着时代的前进而成了新中国的主人 ,在旧友毛泽东的领导下进入了新的时期。从此他积极参加了人民革命事业 ,努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光辉革命业绩 ,为新中国的巩固和建设而献出以后岁月的全部精力。

两位友人经过了漫长的 22 年 ,又会到一起来了。殊途同归。以后 ,他们为湖南人民和中国人民的事业而奋斗了 27 年 ,直至逝世。本章主要阐述两位友人在 1949 年到 1966 年的 17 年间的友谊。

一 骏骨未凋

1949年7月，毛泽东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迅速发展，席卷全国，湖南面临解放。当学校将放暑假时，原任一师校长熊梦飞，是CC分子，是反动统治集团中的骨干分子。他准备逃跑，辞去了一师校长。

当时的湖南省政府代理主席陈明仁通知周世钊，暂代一师校长职务。周世钊想，毛泽东、朱德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已达湖南边境。第一师范是毛泽东等人的母校，是一个重要的学校。要好好组织学主保护校产，迎接解放。因此在周世钊接到代理校长职务的通知后，并未辞让，即于七月间立即到校，组织在校学生八十多人，日则办理民众学校，夜间分队巡逻，以保持学校安全，专候解放军的来临。

1949年8月5日，湖南和平解放了，长沙解放了。周世钊一方面感到无比的兴奋，因为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从此得到解放，一方面感到无比的惭愧，因为这些年来，他没有直接参加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且在政治上成了后进分子。

1949年8月，长沙刚解放，周世钊以第一师范代理校长的名义专电毛泽东致敬，旋得毛泽东复周世钊电报，全文如下：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周世钊先生：

虞电诵悉，极感盛意，目前革命尚未成功，前途困难尚多。希望先生团结全校师生，加紧学习，参加人民革命事业。是所切盼，敬复，并颂教祺。

毛泽东未真

1949年9月中旬，湖南军事管制委员会教育厅派周世钊为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校长。周世钊接到通知后，更到感到惶恐不安。认为自己未经过学习新思想，认识水平太低，对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信心不足。但是全国解放形势的大喜讯鼓舞他去努力奋斗。

长沙解放了，周世钊思绪翻滚，写下了一首《七律·庆祝长沙解放》：

百万雄师奋迅雷，红旗直指洞庭来。云霓大慰三湘望，尘雾欣看万里开。革食争迎空井巷，秧歌高唱动楼台。市民啧啧夸军纪，只饮秋江水一杯。

长沙和平解放后，一些老新民学会会员和教师，联名向毛泽东致贺电贺信，由周世钊领衔〔3〕。

约是1949年9月，周世钊致函毛泽东，并附一诗，同时附去陈泽同的一份意见书。陈泽同系在长沙的工程师。他在所附的《建设湘潭工业区刍议》中建议收湘潭所属的下摄司至株洲湘江东岸沿河四十多里地区建设为新中国的“湘潭工业区”。信函寄走不久，周世钊接到毛泽东的复函，友情拳拳，鼓励备至。

毛泽东于1949年10月15日致函周世钊，全文如下〔22〕：

敦元学长兄：

迭接电示，又得九月二十八日长书，勤勤恳恳，如见故人。延安曾接大示，寄重庆的信则未收到，兄过去虽未参加革命斗争，教

书就是有益于人民的。城南学新诸友来电亦已收到，请兄转告他们，感谢他们的好意。兄为一师校长，深庆得人，可见骏骨未调，尚有生气。倘有可能，尊著旧诗尚祈抄寄若干，多多益善。

除台湾、西藏外，全国各地大约几个月内即可完成军事占领。但大难甫平，民生憔悴，须有数年时间方能恢复人民经济，完成土地制度的改革及提高人民政治觉悟水平，这些任务均有待于文教工作的协助。

陈泽同先生的意见书已收阅，当交此间工业机关研究，请兄为我代致谢意。他的工作问题请告他直接向湖南当局要求解决，不要等候我的答复。谨此奉复。

敬颂

教祺

毛泽东

1949年10月15日

对于周世钊这位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班同学，新民学会会员，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后，当时任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校长的友人来说，毛泽东称他为“骏骨未调”，使他感到无比的鼓舞，总是乐呵呵地对人说：“毛泽东称我为‘骏骨未调，尚有生气’。”

这封信不仅表达了毛泽东对周世钊的拳拳情意和正确评价，而且阐明了毛对文教工作的重视。边彦军等指出：“毛泽东在致力于推进我国经济建设事业的同时，十分重视文化教育事业的建设和发展。他强调文教工作要协助中心工作并为其服务，1949年10月15日在给周世钊的信中说，恢复人民经济、完成土地制度的改革，提高人民政治觉悟水平，‘这些任务均有待于文教工作的协助’。”〔23〕

二 幸福会见

1950年9月下旬，毛泽东的亲戚张森洪回湘省亲。毛泽东嘱她便道约周世钊和王季范偕往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其时，毛泽东的姨表兄，第一师范时的老师王季范先生因出席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已先入京。于是，张森洪与周世钊约定9月28日乘车北上。

担任第一师范校长的周世钊，先日将校务略为料理，并托副校长代理职务，准备入京。

1950年9月28日是中秋节，周世钊与张森洪在湖南省统战部负责人的陪送下，到长沙车站登车。中秋夜晚，月光如水，桂蕊飘香，周世钊对景感怀，吟《七律·中秋北上》一首：

露重香浓桂正花，中秋闻命发长沙。歌盈江市人难静，梦醒湖乡月欲斜。三十年前亲矩范，数千里外向京华。鰽生垂老逢嘉庆，喜见车书共一家。

9月29日清晨，车到许昌，张森洪的爱人时任炮兵师师长，率部驻许昌。她要去看他，因此签票下车，在炮兵师师部停留一日。29日晚，张森洪的爱

人朱师长以黄河鲤鱼款待周世钊，并赠以大号皮鞋，是夜宿于许昌。

1950年9月30日晨曦初照，周世钊等登车北上，中午抵达首都，在前门车站下车。下车后，由国务院送往西柳树井惠中饭店居住。下午二时，乘车至中山公园听周恩来的报告。晚上与蒋竹如等一些一师老同学同往北京饭店王季范老师处谈了一阵，周世钊从先到北京的同学中获悉：当毛泽东会见他们时，毛曾问起周世钊的情况，江青在旁插问：“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同学？”毛泽东说：“这位同学相当老实憨厚，就是胆子小。”接着，那些同学向毛泽东介绍了周世钊的近况与经历。

1950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国庆纪念日。毛泽东检阅了年轻的共和国。这天上午9时，周世钊被邀乘车至天安门观礼台参加国庆观礼，盛况难忘。至12时礼毕返惠中饭店。

1950年的仲秋季节，是北京的最好季节，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周世钊第一次来到北京，他在天安门参加国庆观礼后，接连几天，看望了徐特立、谢觉哉、熊瑾玎和在京的老同学，又游览了颐和园、北海公园等处。

10月3日下午与几个一师同学出外游览，至晚才回饭店，得知中南海曾来电约见，因不在未能赴约。

10月5日下午，接中南海电话，说是毛泽东召见，嘱在饭店等车子。下午四时，毛泽东派秘书以车来惠中饭店接周世钊。于是入新华门，沿南海岸达勤政殿前下车，江青在门口等候，她引导周世钊入内，一路问到周世钊的家庭情况，知其生活艰苦。

从1927年春天在长沙古稻田和望麓园见面后，一别23年的敬爱的友人毛泽东，今天居然在这个静洁的客厅见面了。周世钊称这次会见为幸福的会见。握手寒暄后，毛泽东笑容满面地问了周世钊到京后的情况，也谈了他近来的健康情况。毛泽东问周世钊到京以来会见了哪些人？周世钊举了徐将立、谢觉哉、熊瑾玎、王季范等老以后，毛泽东对周世钊说：“约他们来谈谈好吧？他们没到以前，我们到外面走走，何如？”周世钊表示同意。毛泽东一面嘱秘书电约四老，一面又嘱准备两辆车。一辆是毛泽东坐的，一辆是警卫人员坐的，周世钊陪毛泽东同坐一车。车入景山公园，毛泽东和周世钊刚下车步行不到二十步，警卫人员走到跟前对毛泽东说：“园里游人太多，不便久留，请主席上车。”毛泽东一边上车，一边说：“今天游不成了，回去吧！”

在回途车上，周世钊向毛泽东问了两个问题：

“我记得你从前瘦些，是什么时候胖起来的？”

毛泽东说：“过去，在长沙时，常常东奔西跑，在江西和长征时期，常常骑马打仗，活动多，胖不起来。在延安十多年，坐窑洞，写文字，骑马打仗的机会不多，就慢慢地胖起来了。”

周世钊又问：“我看你对一些熟人的信件，都是亲自回答，为什么不让秘书代劳呢？”

毛泽东说：“秘书不了解那些人的情况，不知怎样下笔，必须将经过详细告诉他，他才能写，不如我自己提笔写几句还省事得多。”

毛泽东回答了这两个问题之后。又说：“我不是什么人的信都回。有一个叫孙狼工的，是从前同在第一师范读书时熟识的，日本投降后，我到重庆，他来看我，谈得还好。但我离开重庆之后，他就在报刊上写东西骂我，等到全国逐渐解放，我到了北京，他却屡次写信来，我因他太无是非标准，太反

复无常了，没有回信。他见我不回信，却又一而再，再而三地来信，他这样勤快写，我也只好勤快不回。”

毛泽东和周世钊回到中南海已是傍晚时候了，几位约请的老人都已到齐，同进晚餐后，坐在客厅谈话。周世钊向毛泽东提了一个要求：“第一师范的师生，恳切希望得到你的指示，请求为他们题示几句话。”

毛泽东当即表示同意满足全校师生的要求，并对徐特立说：“你是一师的老教师，也写几句话，给他（周世钊）带回去吧！”

座中话题都集中到一师，又说到一师一些过去的教师。周世钊记起了一师老校长张干先生嘱托的问题。

周世钊说：“张干这个人，你可能还记得，他现在在长沙妙高峰中学教数学，家庭生活颇困难，他托我向主席提出请求，适当给以照顾。”

关于张干的这种请求，毛泽东作了下面的回答：

“我过去对张干是不满意的。他当我们校长的时候。年龄还只三十左右，有能力，很活动。我认为他一定要向上爬，爬到反统治队伍里做高官。但刚才听你说，他现在还在划粉条，几十年了，他还没有向上爬，这是难能可贵的，可以照顾。”

谢觉哉忽然提出一个疑问：“主席这个论断是不是有调查研究呢？也许他曾经向上爬没有爬得上哩。”

毛泽东接着说：“谢老这话未必对。张干是有向上爬的本钱的，如果他下决心向上爬，一定爬得上。经过几十年还没有爬上，可见他没有向上爬的决心，这就算有一定的操守，仍可以照顾。”

谈话中，毛泽东嘱周世钊搬入北京饭店。于是，周世钊回去后就从惠中饭店迁入北京饭店。

毛泽东谈话才完毕，秘书向他报告，有首长请见。周世钊等就起身告辞。这就是经过 23 年后，毛泽东和周世钊第一次会见。

三 毛泽东探望周世钊

1950年10月7日，毛泽东为了参加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举行的国庆纪念招待会，来到北京饭店。因为当时东德的大使馆暂安排在北京饭店。

招待会后，毛泽东偕几个随员来到周世钊住的房子里，王季范也由隔壁来见毛泽东。周世钊和王季范都表示：“像我们这样对革命没有贡献的人住在如此高级的招待所，实在感到惭愧和不安。”毛泽东说：“你们过去搞了几十年教育工作，教书就是有益于人民的。就算是有益的贡献嘛！”

毛泽东又问：“你们过去参加过什么民主党派吗？”王季范说：“没有。”周世钊说：“我对民主党派不感兴趣，不愿加入。”毛泽东则作了重要指示：“现在全国解放不久，共产党对知识界和农村发展党员采取慎重的态度，吸收党员比较少。你们最好先参加一个民主党派，民主同盟是知识分子的组织，你参加民盟好了。”

接着，王季范对毛泽东提出想出京参观。毛泽东说：“你们可以到西北方面看看，将来返长沙时可以由京沪路南下，到山东、南京、上海、杭州等一些地方看看。”

周世钊遵毛泽东的指示，不久即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以后担任民盟湖南省主任委员和民盟中央委员。

1950年10月某日，周世钊和王季范刚在北京饭店吃过晚饭，即接到中南海的电话，叫他们在饭店等候，随即来了汽车，接他们到了毛泽东那里。

毛泽东对周世钊、王季范说：“今天是周末，北京市委举行京剧晚会，特约你们同去看看。”坐了一会后，毛泽东和江青同坐一车，周世钊和王季范共乘一车随后，四人同至北京市委礼堂。此时，参加晚会的人都已到齐。周世钊等随毛泽东进入会场，挨坐在毛泽东右侧的藤椅上。毛泽东向坐在旁边的人作了简单的介绍说：“这是我的老同学。”

那晚演的京剧是：《柜里姻缘》、《大登殿》等，演至12点左右才完毕。毛泽东嘱周世钊等再到中南海，吃了一顿晚餐（毛泽东的晚餐）。

饭后，同坐在毛泽东办公室休息，谈了一阵。周世钊感到十分疲倦，昏昏欲睡了。因对毛泽东说：“今天是周末，您似可以早些休息了。”毛泽东指着桌上堆积的一大叠文卷说：“还有这些东西要处理，等待把这些东西处理完毕，大概要天亮了。”

四 周世钊笔下的毛泽东

1950年7月1日,《新湖南报》发表了周世钊的文章《我所认识的毛主席》。周世钊开始著文回忆友人毛泽东。

1951年出版的《新观察》第2卷第2期上,周世钊发表了《第一师范时代的毛主席》一文,回忆了毛泽东在一师时的一些故事。文章写道:

“他在图书馆借到一些史地书籍,看得过细而有心得的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和颜祖禹的《读史方兴纪要》。新出版的史地书和杂志上的史地资料,也多方搜罗。

“他在班上是一个很规矩、很正派、很温雅的人,他走路不蹦跳,说话不粗率,时常正襟危坐,沉默寡言。

“总括毛主席在一师读书五年半,教书两年多,前后八年之久。他学习的进步,思想的转变,和革命斗争的发端,都与一师有不可分离的关系。这篇简短的文字,不过胪列一些事实,为一点一滴的叙述,藉以说明毛主席由康梁维新思想,严复所介绍的资本主义思想,更进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阶段。”

1958和1959年,周世钊又著文回忆毛泽东。他在《新体育》杂志上连载《毛主席锻炼身体的故事》。文中著述了毛泽东从青少年时期就十分重视体育锻炼,进行了多种多样的体育实践,使身体由弱变强,为艰苦的学习和繁忙的革命活动打下了坚实的身体基础。青少年正处在长身体、长知识的时期,毛泽东在早年就把身体比作“载知识之车”、“寓道德之舍”,主张青少年要德智体全面发展。

1958年第9期的《新苗》上,周世钊发表了《毛主席青年时期的几个故事》。这些故事描述了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怀着献身革命的雄心壮志,勇敢地走上风云斗争的社会。这些故事教育广大青少年,一个青年该有什么样的理想,该为什么去奋斗,该用什么样的精神去寻求真理进行斗争。这些故事还将鼓励广大青少年沿着毛泽东开创的革命道路奋勇前进。

1962年,周世钊在《新苗》文章的基础上,为《红色少年》丛刊写了《毛主席青年时期的几个故事》书稿。全书只有35000字,14个小故事。它们是:当兵去,看地图,组织新民学会,第一次到北京,暴风雨的前夕,湘江的怒吼,驱逐张敬尧,新阶段,开路先锋的文化书社,创办联系工农的夜学,两条道路的斗争,新时代的号角,清水塘边,永远站在革命斗争的最前线。这些故事深深地吸引着广大青少年。

1959年的《中国青年》上,发表了周世钊的《湘江的怒吼——‘五四’前后毛泽东同志在湖南的革命活动》,不久,文章被收入当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光辉的五四》一书中。

《湘江的怒吼》共35000字,写了下列19节:开路先锋的新民学会,影响巨大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传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毛主席回到了长沙,湖南学生的大联合,掀起了爱国运动的高潮,湘江的怒吼,新思潮冲激了沉默的教育界,女界响起了钟声,新娘自杀引起了向封建制度的大进攻,大学生理想中的新湖南,小学生也说话了,驱张运动的爆发与胜利,革命活动进入了新的阶段,湖南人民的精神粮站,《湖南通俗报》的新页,站在新文化

运动最前线的第一师范，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的一种形式，走俄国人的道路。这些内容都是周世钊亲身经历和见闻的事实，比较生动具体地反映了毛泽东在湖南从事五四运动等的一些重要事件，既具有史料价值，又具有文学功效，颇为社会各界所重视。

1959年的《工人日报》发表了周世钊的《回忆毛主席‘五四’前后的长沙》一文。1959年5月3日的《成都日报》全文转载了，几乎用了一个整版。

1960年8月1日，周世钊完成了暂名为《伟大的启示》的书稿，全稿计60篇小故事共250页稿纸。书稿又名《毛主席青少年时期的几个故事》。

《伟大的启示》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为11节，系第一师范前的故事，第二部分为30节，系在第一师范时的小故事，第三部分有19节，为第一师范毕业后至“五四”前后的故事。

《伟大的启示》始终未正式出版，但是其中的有些内容被收入周世钊其他的著作中。

1920年3月，毛泽东首函周世钊中曾称周是“真能爱我又真能干我有益的人”。今天，周世钊写下了许多回忆毛泽东的文字。周世钊笔下的毛泽东，是实事求是的，文笔朴实无华，忠于史实，持笔严谨，有血有肉，是人不是神，赞不过誉，是深知毛泽东其人才写得出来的。

对于撰著关于毛泽东的文章和著作，毛泽东并不都表同意，有的表示高兴，有的表示厌恶，有的则明确表示不同意发表。例如，毛泽东的历史老师罗元眼，在1952年写了一篇《第一师范时代的毛主席》，他将此文稿托李漱清交给毛泽东阅，毛于1952年10月23日给罗复函，认为罗文“所述‘特色，诸点，得之传闻，诸多不实，请勿公表为荷。”毛泽东直接拒绝公开发表。而对于周世钊所著各文，看来是同意的，并表示了欣赏。

由于写了大量有关毛泽东的文字，致使一些近期研究者们纷纷引用。如文〔24〕就在后记中指出：“在编写本书时，我们主要参考了肖三、李锐、周世钊和美国友人埃德加·斯诺的有关著作。”

五 老学生接受再教育

1950年至1951年初，第一师范的学校行政负责同志间和教师与教师间，发生不团结现象，周世钊因作客思想与自卑思想作祟，没有以积极负责的态度主动解决问题，只图逃避责任，一走了事。领导上对周世钊进行了耐心的教育，他才勉强安定下来，但始终没有办法解决校内不团结问题，学校工作因之受到损害。周世钊认为自己过多考虑到个人面子问题、威信问题，旧社会过来的旧知识分子不能很好地体会党在教育工作中的方针政策，缺乏忠心耿耿为人民教育事业忘我劳动的精神，因此迫切要求学习，要求改造。

1951年3月，湖南教育厅将一师人事作了适当调整后，校务暂由副校长李迪光代理，同意周世钊入北京华北革大政治研究院学习一年。周世钊自3月7日北上赴政治研究院，到京后住惠中饭店。毛泽东已离京去石家庄附近乡间休息去了，周就写了一信告诉毛泽东，谈学习和学习后的计划。

周世钊3月入政治研究院，12月结业，学习了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中国革命问题，电影武训传的批判……，通过近一年的学习，同时在学习期间多次会见毛泽东，听到各种有意义的报告，使周世钊的思想认识提高了一步，初步批判了“教育清高”、“教育救国”的思想，解决了教育为谁服务的问题。

1951年2月，周世钊按毛泽东的意见，在长沙市申请加入中国民主同盟，被批准。三月到北京后，参加了一些北京的民盟活动，受到了组织的教育，也是思想提高的原因之一。

此次北行，周世钊又吟了《五律·北上》：又趁春风去，江山入望宽。无波临汉水，不梦过邯郸。万顷摇新绿，千峰醉夕岚。京华今夜到，喜极共加餐。

1951年4月下旬，政治研究院办公室通知周世钊，中南海将来车接他。下午4时，毛的秘书乘车至政治研究院，接了周世钊和蒋竹如去中南海。毛泽东已自石家庄返京。他们见面后，毛泽东详细询问了周世钊、蒋竹如进政治研究院的打算和院里一些情况后说：“你们能够请假学习一年好极了，有机会学习是最好不过的事。我很想学习二、三年，特别想学习自然科学，可惜我不如你们这样幸运，能够请假学习，我现在是不好请假的。”

晚餐时，毛泽东又对周世钊说：“你学习结束后打算参观教育是好事，将来可以由京沪路南下，除看学校外，还可以看些别的东西。”

年近花甲的毛泽东还是不断羡慕周、蒋的学习，继续重复说道：“我呢，也很想请假两三年学习自然科学，只可惜可能不容许我有这样长的假期。”

1951年7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六下午，政治研究院才放暑假不久，周世钊留院未归，毛泽东派车子接他到中南海。

晚饭前，周世钊谈了在院里的学习情况，毛泽东谈到学习主要靠自学，谈到自学的重要，并介绍他19岁时在湖南图书馆自学的经历。

“1912年暑假中，我从湖南公立高级中学自动退学之后，寄居在湘乡驻省中学学生寄宿舍，实行自学。每天到三里之外的湖南图书馆去看书。早去晚归，中午为了节省时间不回宿舍，买两个烧饼吃了，就解决了午餐问题。到严冬季节，雨雪冰冻，也照样前往。从未间断过一天。这样从早到晚，没有什么休息，在这个图书馆自学了半年。

“这时，我一十九岁了，十九岁的青年应该读了很多书，但我却读得太

少。我才到图书馆的时候，看到架上、桌上和藏书楼上都堆满了书，我借读了一些，觉得都有新的内容，都对我有所启发。

“我在图书馆借了严复翻译的《天演论》、《穆勒名学》、《原富》、《法意》、《社会通论》以及西洋历史和小说等。觉得每读一本书都有新的收获，越读越觉得不肯抛弃，因此忘了疲倦和饥饿，一天只存中午吃烧饼的时候是我唯一休息的时间。因此半年多的时间不算长，而我在知识上的收获却不小。

“但是，我最大的收获还不在这里。我在湖南图书馆第一次看了世界大地图。以前，世界究竟有多大，是不太明确的。当时，我认为湘潭县已不算小，湖南省当然更大，全中国古称天下便大的了不得。在世界地图上看到中国只占世界一部分，小了，湖南更小，湘潭和韶山更没有影子了。世界真正大呀，世界既大，人就很多，每一个活人都要生活。据我看，一般人的生活应该是过得幸福的，但我在韶山、湘潭和长沙见到的，广大人民的生活是痛苦的，缺衣少食，挨冻受饿，目不识丁，做一世的文盲，还常常被地主豪绅和贪官污吏勒索压迫，被卖被杀。为什么广大人民的生活过得这样痛苦呢？用今天的话来说，只是由于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的缘故，这种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广大人民的痛苦生活不会变成幸福的生活，因此，我总觉得我们青年的责任极其重大，青年的前途极其广阔，因为要改变社会就要革命，革命就要靠革命青年，我想到这里，就下定这样的决心：我将以一生的力量为痛苦的人民服务，将革命事业奋斗到底。所以这回在湖南图书馆的半年自学是我读书历史中值得纪念的半年。”

六 笑谈战争

还是在 1950 年 10 月 27 日上午的那次会见，毛泽东谈了任弼时逝世及宗教等之后，周世钊提了个问题：“主席今天为什么有这种闲情来谈这些宗教和哲学的问题呢？朝鲜局势不是很紧张吗？”

毛泽东从容答道：“朝鲜局势日趋紧张，这段时间，我们为了讨论这个问题，有很多天是睡不着的。但是，今天我们可以高枕而卧了。”

“这是为什么呢？”周世钊很不懂。

“因为我们的志愿军已经出国了。”毛泽东透露了这个消息。

这是周世钊和王季范才听到的消息。周世钊一方面感到兴奋，一方面也感到怀疑。因而提出一个问题：

“有胜的把握吗？”

毛泽东没有立即回答这个问题，却反问王季范和周世钊：“你们对这个问题看法怎么样？”

王季范没有表示意见。周世钊稍稍考虑后陈述了他的看法：

“国民党反动统治被推翻，全国得到解放，这是建设新国家的大好机会。全国人民都希望和平建设，志愿军抗美援朝，是不是会影响和平建设呢？”

毛泽东说道：“不错，我们急切需要和平建设，如果要我写出和平建设的理由，可以写有百条千条，但这百条千条的理由不能敌住六个大字，就是‘不能置之不理’。现在美帝的侵略矛头直指我国的东北，假如它真的把朝鲜搞垮了，纵不过鸭绿江，我们的东北也时常在它的威胁中过日子，要进行和平建设也会有困难。所以，我们对朝鲜问题，如果置之不理，美帝必然得寸进尺，走日本侵略中国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更凶，它要把三把尖刀插在中国的身上，从朝鲜一把刀插在我国的身上，以台湾一把刀插在我国的身上，把越南一把刀插在我们的脚上。天下有变，它就从三方面向我进攻，那我们就被动了。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不许它的如意算盘得逞。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可是党内有很多人不同意。”

周世钊听了不十分理解，仍重复提出刚才的疑问：“是不是有胜利的把握呢？”

毛泽东喝了口茶，才不慌不忙地回答这个问题：“你们都知道，我是不打无把握的仗的。这次派志愿军出国，是有人不同意的，他们认为没有必胜的把握。我和中央一些同志经过周详的考虑研究，制定了持久战的战略，胜利是有把握的。我们估计，美帝的军队有一长三短。它的钢铁多、飞机大炮多，是它唯一的优势。但它在世界上的军事基地多，到处树敌，到处布防，兵源不足，是第一短；远隔重洋，是它的第二短，为侵略而战，师出无名，士气十分低落是它的致命伤。虽有一长，不能敌这三短。我们则为抗美援朝作战，为保家卫国而战，士气高，兵源又足。我们并不希望速战速决，我们要进行持久战，一步一步消灭它的有生力量，使它每天都有伤亡，它一天不撤退，我们就打它一天，一年不撤退，就打它一年，十年不撤退，就打它十年。这样一来，它就伤亡多，受不了，到那时，它就只好心甘情愿进行和平解决。只要它愿意和平解决，我们就可结束战争，我们原来是要和平的。”

周世钊又提出一个问题：“假如它不在朝鲜战场上打而派大军从我国海岸登陆，怎么办？”

毛泽东说：“那它不敢。这样做，我们也不怕它。并且我们有中苏友好

同盟条约，它如果向我国进攻，就会引起苏联的参与。苏联参与，不一定派兵东来，它可以在几天之间用兵西向，席卷欧洲，欧洲是美国必争之地，它要照顾欧洲，自然也就无力入侵我国了。”

周世钊继续发问：“假如美帝用飞机滥炸我国的重要都市呢？”

毛泽东继续分析答道：“它也不敢，因为这同派兵登陆，同是侵略。”

在毛泽东剖析了上述论点后，周世钊又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只有我国抗美援朝，苏联却坐视不理呢？”

毛泽东边讲边笑他说道：“这个仗，我们有力量、有把握打好，不必要苏联参加。你们晓得玩扑克吗？“大鬼”、“小鬼”是留着保底的；你们看过剑侠小说吗？看家的法宝是要留着最后使用的。我看美帝侵略，一定会要彻底失败，不管它怎样挣扎，终是黔驴技穷，在中朝人民共同抗击之下，它是一定不能得逞的。”

周世钊等在毛泽东家吃了中餐，然后辞行。

1951年5月间，有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毛泽东派秘书田家英到政治研究院叫周世钊和蒋竹如同去中南海。毛泽东告以志愿军在朝鲜作战获得一个胜利的消息，并说：“我们志愿军的武器远不如美帝，但常常把美帝的军队打得狼狈逃窜。我们连大炮都少，飞机更没上前线，但常常打胜仗，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这是为什么呢？没有别的理由，这是因为我们的志愿军都是翻身的农民和工人，他们认识这个战争是为支援被侵略的朝鲜而战，是为保家卫国而战，都有力保卫革命胜利果实的决心，都明了这次战争是为自己而战，为归己的国家而战，因此奋勇杀敌，敢于牺牲，可以说，我们这回抗美援朝的战争是打的品质仗，是什么武器也不易抵挡的。”

毛泽东很高兴地谈了这些以后，又说：“我们主朝鲜战场上的形势是越来越好，造成这种好形势主要依靠我们志愿军的勇敢和机智。他们现在在层层挖掘地道，这些坑道都在山底下，纵横沟通，随意出入，飞机炸不垮，大炮轰不坏，敌人不好攻，我们却可出去，万一失了第一线，还有第二线、第三线。这都是志愿军指战员想出来的好办法。象我们在北京的人就不一定想得到这种办法。”

毛泽东、周世钊、蒋竹如等共进晚餐，晚饭后再看了电影，周世钊、蒋竹如到研究院时已晚间12时了。

1951年9月的一天，毛泽东约在政治研究院学习的周世钊、李思安、蒋竹如等五人到中南海晚餐。

当时，朝鲜战争取得不断胜利，全国反帝（特别是反美）的运动进入高潮。毛泽东很高兴地告诉在座者：“抗美援朝战争所以能够取得胜利，主要由于我们志愿军的机智勇敢，不断提出新的对付敌人的好办法，坑道战就是新办法之一，现在挖掘了许多层的坑道，敌人想要破坏这些坑道是很不容易的。一个美国记者说：‘美国的军队再花20年也打不到鸭绿江。’我看再打200年，他们也没有希望打到鸭绿江。”周世钊听后觉得很是兴奋。

毛泽东又问李思安：“你还记得驱张运动时向北洋军阀政府的国务总理请愿，在新华门坐冷板凳的事么？”李思安答道：“当然记得，那是您在领导，已是30年以前的事了。”

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后，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在贺龙将军率领下，于1953年10月渡鸭绿江入朝鲜。周世钊参加了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湖南分团，到铁路沿线慰问志愿军铁道兵团。周世钊通过两个月的慰问，实地认识

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与胜利，印证了毛泽东谈话的正确性。他认识了：

1. 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和战争贩子的残酷无人性。
2. 觉悟了的人民力量是无穷的。
3. 英雄的朝鲜人民是保卫东亚和平的巨大力量。
4. 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是强大无比的。

5. 我们的祖国已经是世界上的强国，被帝国主义欺凌侮辱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了。从鸦片战争以来，我国的民族长期过着屈辱可耻的岁月，被践踏在帝国主义的铁蹄下面抬不起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到几年，我们就能够把世界上王牌帝国主义打垮，把所谓联合国十多个国家的军队打得东逃西窜，这是奇迹，只有在伟大的共产党和毛泽东的英明正确领导下才能得到的奇迹。周世钊和全国人民一样，深深感激共产党，感激毛泽东。不过，周世钊的感激心情是更深刻，更真切的。因为周世钊从小学时期起就天天听到“中国不亡，是无道理”的说法，天天有做亡国奴的恐惧思想，也长期作过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梦。到了今天，这种亡国恐惧没有了，祖国突然成了世界强国，在朝鲜分享了强国人民的光荣与骄傲。

关于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重庆谈判和中印边境冲突，毛泽东和周世钊有过多次交谈。根据周世钊口述和他的秘书陈明新的记述，综述于下。

有一次，周世钊到北京开会，毛泽东约他到家中见面，

周世钊对毛泽东说：“主席，我最近看了一本《保卫延安》的小说，很受教育。保卫延安确实是一场伟大的战争，但又是一场危险的战争。蒋介石那时是美式装备的武器，而解放军是小米加步枪，蒋介石有八百万军队，而解放军在数量上比它少得多。但结果居然解放军打胜了。

毛泽东说：《保卫延安》这本小说我也翻看过，是写得很不错。这本小说主要是歌颂彭老总的。彭大将军在指挥保卫延安的战争中是有功的。一场战争，要看战争的双方哪一边会打胜仗，哪一边会打败仗，主要不是看交战的双方部队武器的优劣，部队人数的多少。而要看交战双方各代表的是什么，要看它是代表人民利益呢，还是代表反动派的利益。如果它是代表人民大众的利益，为人民大众的利益而战，它就是正义的，它就会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哪怕它的武器差一些，人数少一些，它也会打胜仗，它也能打胜仗。如果它是代表反动派的利益，哪怕它的武器再好，人数再多，也会打败仗。因为它是非正义的，它没有群众的支持，因而它就寸步难行。这就叫做正义的战争必胜，非正义的战争必败。蒋介石有美式装备的八百万军队是不错的。它有八百万，我有四万万五千万（这是当时全中国的人口总数），我比它多得多。蒋介石还要听我调遣呢。你不是看过《保卫延安》这本小说吗？小说中有根多故事不就是这么回事吗！你说我们保卫延安这场战争是一场危险的战争，那也是真的。当时胡宗南有那么多军队，不仅在数量上多于我们，而且在武器的装备上也优于我们。他把进攻延安的架势一摆开，真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所以蒋介石胡说要三个月内消灭我们。根据当时的情况，党中央经过再三研究，决定暂时放弃延安，撤离延安。如果我们当时不放弃延安，和胡宗南正面拼，那我们就会吃亏。我们采取了撤离延安和胡宗南打运动战的办法，我们相信人民群众，我们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在运动战中消耗敌人的主力，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我们就取得了这场战争的伟大胜利。我们当时决定撤离延安，暂时放弃延安，不

是不要延安，而是为了更好地保卫延安。经过延安保卫战，延安仍然是人民的延安，延安显得更加伟大。战争总会有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目前打不起来。但是局部战争、小的战争世界上天天在打。如果将来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就我个人的意见，我们指挥战争的中心还是放到延安去。因为延安的人民太好了，延安这个地方太好了。

周世钊说：我有次和原来刘戡的参谋长、现在是湖南省政协常委的文于一谈到他们打延安的问题时，文老自己说：如果那次我不是因为有事情出来了，我也很可能被打死了。有一次刘戡要我带领一些部队去捉毛泽东。部队到了一个我们原先估计毛泽东所在的地方。我们到东边问老百姓毛泽东哪里去了，东边的老百姓对我们说：毛泽东往南边去了，我们走到南边没有看见毛泽东，问老百姓毛泽东往哪里去了，南边的老百姓对我们说，毛泽东往西边去了，我们走百边，又没有看见毛泽东，我们又问西边的老百姓毛泽东往那里去了，西边的老百姓又对我们说，毛泽东往北边去了，我们又走到飞边，也没有看见毛泽东，又问北边的老百姓毛泽东到底往那里去了，北边的老百姓又对我们说，毛泽东刚往东过去了。转来转去，我们整整转了一天，连毛泽东的影子也没有找到。其实后来我们才知道，毛主席就是在我们那天转来转去的那个山顶上。我们那么多部队在那个山下转了一天，就是没有办法知道我们要捉的毛泽东是在哪儿，脱离了人民群众真是没有办法。毛主席真有办法，毛主席真正了不起。

毛泽东说：他们是一堆蠢猪。我谅他们根本没有办法能找到我。不过那次也真的有点危险。我们只有 100 多人在一个山顶上，连敌人走路的声音和他们讲话的声音，我们都听得清清楚楚。我们在那个山顶上困了一天，吓得战士们连尿都不敢拉。但我不怕。我相信他们找不到我，因为我除了有 100 多名警卫战士外，更重要的是有广大的人民群众。我相信广大人民群众会设法保护我们的。以我总是做战士的工作，你们不要怕，敌人找不至我们的，群众会保护我们的，你们放心。我们打仗作战能取得胜利，除了发挥指挥员的正确指挥和战士们的勇敢作战精神外，更离不开人民群众对我们的支持和爱护，离开了人民群众，我们就会一事无成。这就叫做人民军队为人民，人民群众爱护人民军队。蒋介石国民党的军队，就是因为它背离了人民，它脱离了人民群众，所以它得不到任何真实情况，因此它总是吃攻仗。有一次我和恩来同志行军走到一个山头转弯的地方，我们走过后，我叫他们找块板子写上毛泽东由此去的牌子插在那里。开始他们不敢写，我叫他们一定要写，后来恩来同志他们还是写了。这个牌子的去向是真的。可是敌人以为是假的，结果敌人又吃了大亏。所以我们和敌人作战，就是对他们采取假假真真，真真假假，弄得敌人调头转向。这样我们就在运动战中抓住时机不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直到取得战争的胜利。

周世钊说：您那次从延安到重庆和蒋介石谈判，也是很危险的啊！

毛泽东说：很危险也很不危险。说危险是因为蒋介石这个人是一个坏到了极点的人，什么事情他都干得出来。只要他那句娘 C·P 的话一说出来，要干什么他就能干什么。我到重庆去和他谈判，是到了敌人的大本营，蒋介石很可能对我下毒手，这是危险的。我去重庆之前，也作好了坏的思想准备。我想我是为全中国人民的和平而去重庆和蒋介石谈

判的，蒋介石居然敢把我杀死在重庆，我也死得光荣。因为我共产党人是不怕死的。为人民的利益而死，死得其所，死得光荣。说很不危险，是因为我是代表中国共产党、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利益、代表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的和平愿望而去重庆和蒋介石谈判的。如果蒋介石真正敢于在谈判桌上对我毛某下毒手，那么他我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面前就输了理，反对和平、破坏和平这顶帽子他就自己戴上了，他那套假和平真备战的面目就完完全全暴露在全十国和全世界人民的面前了，他就不好向人民交代。再说他请我去重庆和他和谈，还有位什么美国大使先生在那里作保障嘛，如果蒋介石把我在谈判桌上杀了，他也不好向他的主子交代。我以我谅他不敢对我下毒手。我们党中央那时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作了再三的考虑，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从和平的愿望出发，多数人同意我去，也有少数人不同意我去。他们认为事情确实有危险性。当时我对大家说，如果我不去，反对和平，破坏和平这顶帽子就会戴在我的头上，蒋介石就会大吹大擂，他就会大造舆论，说中国共产党不愿和平，毛泽东是个好战分子，我们就输了理。我才不上他的当！从全国人民的利益出发，从和平的愿望出发，为了和平我决定去，中央也同意我去。可是蒋介石毕竟是蒋介石，他总是以他的心理来衡量别人的心理。他万万没有想到我毛泽东真正敢去重庆和他谈判。我一到重庆，蒋介石慌了手脚，弄得他措手不及，临时作准备。开头几天，我无事可做，就只好每天和张治中先生聊天。我那次到重庆和蒋介石和平谈判，能够安然无事，要感谢张治中先生。四川重庆市地下党组织的同志们，为我在重庆和蒋介石和谈，在安全保卫工作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也要感谢他们。

周世钊说：主席，您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为什么没有负过一点伤啊！

毛泽东说：我们和敌人作战打仗时，我经常和战士们一起行军，我也时常到前线去了解情况。但是我就是没有负过伤。不说是大伤，连小伤也没有负过。这可能是因为敌人的子弹没有长眼睛，它找不到我毛泽东嘛！

周世钊说：1950年的那场抗美援朝战争，也是够紧张的啊！那时国民党反动统治被推翻，全国人民得到解放，建设新国家是大好机会。人民希望和平建设自己的国家，那时您就决定抗美援朝，派志愿军到朝鲜作战，我当时怕影响我们的和平建设，但后来居然把美帝国主义打败了，这是了不起的事。

毛泽东说：关于抗美援朝的问题，1950年10月我就跟你谈过，但我们不希望速战速决。我们要进行持久战。我们要一步一步地消灭它的有生力量，使它每天都有伤亡。它一天不撤退，我们就打它一天。它一年不撤退，我们就打它一年。它十年不撤退，我们就打它十年。这样一来，它就伤亡多，受不了。到那时，它只好心甘情愿，同我们进行谈判，和平解决问题。只要它愿意和平解决问题，我们就可以结束这场战争。这就是说，美帝侵略朝鲜之战，不管它怎样挣扎，它一定要彻底失败。我们那时就是依靠基本上是小米加步枪的武器，依靠战士们的勇敢精神，依靠中朝人民的支持，依靠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同情与支持，与美帝国主义打仗。战争的结果，完全证明我们的估计是正确的。中朝人民胜利了，美帝国主义失败了，这就是历史的结论。抗美援朝这一仗，我们不仅打出了军威，而且打出了国威。抗美援朝这一场战争我们虽然

付出了代价，但是经过抗美援朝这一场战争以后，我们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大大地提高了。看来我们打这场战争还是值得的。

周世钊说：毛岸英同志也到了朝鲜，但是他刚刚出国不久，就在朝鲜战场上牺牲了。是不是和彭老总没尽到责任有关？如果您不派毛岸英同志到朝鲜战场上，我看他是不会牺牲的。

毛泽东说：不能这样说。岸英的牺牲，责任完全在美帝国主义身上。岸英是为保卫中国人民、朝鲜人民的利益，为保卫我们祖国的安全而出国作战的，他是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为保卫世界和平事业而牺牲的。彭老总是没有什么责任的，不能去责怪他。当时我得到岸英在朝鲜战场上不幸牺牲的消息后，我的内心是很难过的。因为我很喜欢岸英这个孩子。岸英牺牲以后，当时有人提议要把他的尸体运回国来安葬，我没有同意。我说岸英是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为抗美援朝、为保家卫国而牺牲的，就把他的尸体安葬在朝鲜的国土上，让它显示中朝人民的友谊，让中朝人民的友谊万古长青。不必把他的尸体运回国来安葬。当然你说如果我不派他到朝鲜战场上，他就不会牺牲，这是可能的，也是不错的，但是，我是党中央的主席，在那种比较困难的情况下，我是极力主张发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运动的，后来居然得到党中央的赞成，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定。这个决定得到了中国人民、朝鲜人民、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很快就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个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运动。我作党中央的主席，作为一个领导人。自己有儿子不派他去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又派谁的儿子去呢？人人都像我一样，自己有儿子不派他去上战场，光派别人的儿子去上前线打仗，这还算个什么领导人呢？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岸英是个青年人，他从苏联留学回国后，到农村进行过劳动锻炼，但他没有正式上过战场。青年人就是要到艰苦的环境中去锻炼，要在战斗中去成长。基于这些原因，我才派他到朝鲜去的。

周世钊说：我们那次和印度在中印边界上打仗，当时的外电报导说，我们和印度打仗是好比快刀切豆腐，不值得一打，您为什么打了一上就收兵回营啊？

毛泽东说，那次我们和印度打仗，是保卫边界之战。印度侵占我们的边界领土，它是非正义的，因而它必败。打仗要有个交战的双方。我们只打了一下子对方就被我们消灭了，就没有对象了。我们那次和印度打仗，是边界保卫战，是小仗。把我们的边界领土收回，目的达到就可以了，不必再前进了。因此，我们就只好收兵回营了。

七 关怀楚中元、周震鳞

1951年6月的一个星期六，周世钊、蒋竹如随毛泽东派来的秘书乘车至中南海。毛泽东又谈到志愿军在朝鲜打仗的情况，认为我们打的是品质仗，这种品质仗的力量不是唯武器论者的那些人所能了解的。

毛泽东和周世钊等晚餐后，周世钊和蒋竹如向毛泽东介绍了第一师范老同学楚中元的情况，楚中元一贯倾向党，在教书工作中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而近来贫病交加。因此，周、蒋为他提出救济的要求。毛泽东认为可以给以适当照顾，立即批交政务院将楚安排作中央文史馆研究员，并教他暂时住在惠中饭店。

话毕，又同看了电影。

1951年3月下旬，周世钊接到堂妹周世贤自长沙寄到政治研究院的信，词问国庆已近，去年毛泽东嘱咐要周世钊于今年国庆时陪同他父亲（周震鳞）入京观光的安排。

为此，周世钊在8月底会见毛泽东时提到这个问题。毛泽东嘱周世钊回研究院后写一报告，然后由毛泽东批交湖南负责同志送周震鳞入京，并谈了知识分子问题。接着看了电影《武训传》。

周震鳞，周世钊的堂叔和启蒙老师，同盟会最早会员及华兴会创始人之一，辛亥元老，徐特立、毛泽东都曾受教于他。解放前与蒋介石政见不合，解放后先在宁乡再在北京寓居，得到毛泽东的尊敬与关怀。[25]

1951年9月，周震鳞自宁乡来到北京，周世钊陪同去中南海会见毛泽东，共进午餐。

1951年10月，周世钊与周震鳞、王季范又去中南海，会见了毛泽东，谈了体育问题。

以后，毛泽东对周震鳞很敬重，有时请周震鳞吃饭，就先打电话关照：“老人家来得不？不要特意换衣服，莫受凉……。”周震鳞到死都感念共产党、毛主席的好处。[25]

八 小伙子怕什么冷

1951年7月的一天下午，周世钊、蒋竹如两人同到中南海，见到了毛泽东。毛说：“今天还早，我们到颐和园走走何如？”周世钊考虑到毛泽东的警卫工作难做，因此向毛泽东说：“我们研究院靠近颐和园，常去游玩，见到去那里游玩的人特别多，你去似乎不大方便。”

“那么，就到南海划划船吧。”毛泽东同意了周世钊的意见。

毛泽东和江青坐在前面的一艘小船上，周世钊和蒋竹如坐后面一条小船。他们徐徐划动，溶于海中，清风吹拂，笑语联翩，历时四五十分钟才停航上岸。

上岸后，复列坐中海之滨。江青说她正在读《左传》和《楚辞》，谈到屈原和屈瑕的世系关系。毛泽东笑着说：“《左传》和《楚辞》虽是古董，但都是历史，也还有一读的价值。”

坐谈了几十分钟，毛泽东的秘书为在座的人照了相。

吃过晚餐，周世钊和蒋竹如才告辞返国研究院。

还是1951年秋天，这个秋天，北京很少下雨，但在一个星期五的晚上却刮了风，下了大雨。星期六从早晨起，天就放晴，风尘不起，空气格外清新。周世钊等几个在政治研究院学习的老学生在这天的下午到了中南海，在一间陈设朴素、面对空阔院子的客厅里，他们见到了毛泽东。

大家把准备要向毛泽东陈述的话说了后，谈话的主题转到了湖南过去一些参加“五四”运动的人物的现状。当毛泽东听到当时很活跃、敢说敢为的某女同志，因为身体羸弱，疾病纠缠，目前参加工作和学习都有困难，闷守在家里，她自己感到处在新的时代，不能为革命事业贡献力量，怀着掉队、落后的苦闷时，表示十分惋惜。并且说：“这是不注意体育运动的结果。”

停了一会，毛泽东抬头望了一望在座的人，又说：“你们都是干教育工作的，应该把青少年的体育运动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必须记住：有志参加革命工作的人必须锻炼身体，使身体健强，精力充沛，才能担负起艰巨复杂的工作。”

周世钊似有所感他说：“主席曾号召全国青少年健康第一，学生也首先要求身体好，我们搞教育工作的人已经不敢忽视学生的体育运动了。今天听到您的这些指示，使我们更进一步认识到锻炼身体和革命工作的关系。”

毛泽东在点头表示同意周世钊的意见后，又继续他的谈话：“我们不是读过《红楼梦》吗？《红楼梦》里两位主角：一位是贾宝玉，一位是林黛玉。依我看来，这两位都不太高明。贾宝玉不能料理自己的生活，连吃饭、穿衣都要丫头服侍，这种全不肯劳动的公子哥儿，无论如何是下会革命的！林黛玉多愁善感，常好哭脸，她瘦弱多病，只好住在潇湘馆，吐血，闹肺病，又怎么能革命呢？我们不需要这样的青年！我们今天需要的青年是有活力，有热情，有干劲和坚强意志的革命青年！”

讲到这里，毛泽东指着院子里的花草说道：“你们看，院中的花草原来长得很好，昨夜遭受几点钟的风吹雨打，就差不多全部凋零了。但同在院中岫树木却不怕风雨的侵袭，依然是枝强力苍壮，苍翠可爱。我们的青少年要学树木一样的坚强，不要学花草一样的脆弱！”接着，毛泽东又说：“今天的青年学生应该既有文化，又会劳动；既用脑，又用手；既能文，又能武的全面发展的新人。男的绝不要学贾宝玉，女的绝不要学林黛玉。” [26]

1951年的11月，周世钊曾和文运昌去中南海会见毛泽东。以后，周世钊又和陈奎主等去中南海会见了毛泽东。年底时，周世钊又一次去了中南海，这是1951年的第11次会见。

朔风吹着雪花在天空飞舞，北京的气温已经降到零下几度。周世钊等几个在政治研究院学习的老学生决定在学习结束后赴东北参观教育，这个计划已得到毛泽东的批准。出前发夕，同去看毛泽东。毛泽东听过各人学习心得的汇报和到东北参观的打算后，表示满意，并且说：“我们以前读书的第一师范是一个好学校，我的文化基础是一师打好的。”

接着，毛泽东问道：“你们打算到东北哪些地方参观？”

有人答道：“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我们都想去。只是天气太冷，听说现今哈尔滨等地已在-30左右，我们南方人不习惯于这种气候，能不能受得了，还大成问题。”

毛泽东很不同意这位同学的说法，他说：“你们50多岁的人，还是小伙子，怕什么冷！只要多穿点衣服，纵然是零下几十度，我看也不成问题。假如是一个经常锻炼身体的人，更不会被风雪寒冷所吓倒。我过去练习过冷水浴，现在年纪虽然大了，冬天也还可以不用热水洗澡，小小的寒冷还经得住。锻炼的确是重要的事情！”[26]

周世钊等觉得真是惭愧！毛泽东年纪比他们大，还能在较低的气温中进行冷水浴，而他们在条件很好的旅行参观中却提出怕冷的问题，真太不应该了！都表示要向毛泽东学习，要战胜东北的寒风冻雪。

周世钊等在北京、沈阳、大连、旅顺、锦州、天津等地的学校和工厂参观，听了当地教育行政部门的报告。他们一行登上雄伟古老的万里长城，临眺浩瀚无际的渤海，不但感到祖国山川的壮阔，物产的富饶，使周世钊感到无穷的骄傲；他又眼见这些地区，经济文化事业欣欣向荣，劳动人民生活不断改善，感到在共产党、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祖国各方面都在飞跃进步，繁荣、强大、文明、幸福的目标不久就可达到，更是无比的兴奋。在美丽的军港旅顺口，周世钊喜赋《五律·登旅顺白云山》形势倾天下，雄关喜眺临。气吞俱渤小，波撼日星沉。船舰连欧美，风云自古今。金汤吾已固，顽寇敢相侵！

从1951年的12月到1952年的1月，正是东北最冷的时候，周世钊在参观时没有大衣，天天迎风踏雪，也没有感觉那么受不了，终于完成了参观计划。当周世钊等回到北京总结这次参观收获时，觉得毛泽东那晚的讲话起了很大的启发、教育作用。周世钊虽然是年过半百的人，但在这次旅行参观中觉得要年轻得多了。

九 频频致函

从1949年到1966年上半年的17年间，毛泽东和周世钊通信频繁。据不完全统计，毛泽东致周世钊的函电约有21封，平均每年1.2封以上。其中被收入《毛泽东书信选集》的就达10封之多。它们是本节中的第2、3、8、9、10、11、13、14、15和第16封。在此期间，周世钊致毛泽东的信函则更多了。

现将毛泽东致周世钊的函电按时间先后汇录于下，并加以必要的解释。

1. 1949年8月，毛泽东复电周世钊。电文录于本章第1节。

2. 1949年10月15日，毛泽东复函周世钊。全文录于本章第1节。

3. 1950年12月29日，毛泽东致函周世钊。信中谈到第一师范题词的事。全信录于本书第8章。

4. 1951年3月19日，毛泽东自石家庄致函周世钊。信寄北京西柳市井惠中饭店53号。全文如下：

惇元兄：

3月14日给我的信收到了，谢谢您。1月29日的信及学生们的签名信也收到了。你的三项计划很好。进研究院很有意义，可以安心读几个月书。读完去东北华东考察二次也极好。第三项计划可能有些困难，如在两三年后实施也有可能办到。

我在乡下住，没有病，专为休养，暂不进城。容后面叙。

祝安好！

毛泽东

3月19日

5. 1952年3月11日，毛泽东又致函周世钊。信是寄到湖南第一师范的。信封上写着“周校长毛寄”字样。全文为：

惇元兄：

3月6日来信及冬季由天津来信均已收到，甚谢。蒋竹如兄前后多次来信均到，晤酉时请为道及。你的学校计划很好，逐步做去，便可能成功。我休息仍不多，但身体尚好。顺颂

教安

毛泽东

3月11日

6. 1952年10月10日，毛泽东致函周世钊。信封上写着“长沙岳麓山第一师范周惇元先生毛寄”。信文如下：

惇元兄：

10月5日的信及所附报纸，收到，以前一信也收到了。

文章已看了，很高兴。

蒋竹如兄的工作问题，尚未解决，我已将他的信转致湖南文教厅请其酌处，不知近日已解决否？便时祈向文教厅询及。

此复

顺颂教祺

毛泽东

1952年10月10日

7.1955年5月1日，毛泽东致函周世钊，谈湖南第一师范问题。全信录于本书第8章。

8.1955年10月4日，毛泽东致函周世钊，并和诗一首。信和诗录于本书第7章中。

9.1956年11月24日，毛泽东致函周世钊，谈了调查研究诸问题。全信如下：

惇元兄：

你的信好久就收到了，你的大作及附件各种都已读悉。极为感谢！囑写的字至今未能应命。你那里还不那样急需罢，我想等一等再讲，如何？你下去跑没有？最好一年下去跑几次，每次两三星期也好。我最近出外跑了一次，觉头脑清新得多。你下去时，不只看学校，还可看些别的东西。

再谈。顺问
教安

毛泽东

1955年11月24日

毛信中所述的“囑写的字”，至今未能研究清楚，究竟指什么。

10.1956年12月5日，毛泽东致函周世钊，并答词一首。信和词录于本书第7章中。

11.1953年12月29日，毛泽东致函周世钊，并关赠诗的事。全信录于本书第7章中。

12.1957年12月17日，毛泽东致函周世钊。信寄“北京饭店111号”，纯属友人之间的问安。全信如下：

惇元同志：

来信收到，极为感谢。因忙迟复，幸谅。你好吗？我还可以，勿以为念。
祝好！

毛泽东

1957年12月17日

13.1958年10月25日，毛泽东致周世钊长信，称周是“贤者与能者”，并就毛的诗作《七律·送瘟神》作了部分解释。全信录于本书第7章中。

14.1959年5月10日，毛泽东致函周世钊。全信录于本章第10节。

15.1961年12月26日，毛泽东在他的第68个誕生日给周世钊奋笔致函。信录于本书第7章中。

16.1963年3月24日，毛泽东致函周世钊，谈及诗词及张干诸问题。全信录于本书第7章中。

17.1963年5月26日，毛泽东致函周世钊，述及给张干2000元之事。全信录于本书第8章中。

18.1963年12月13日，毛泽东致函周世钊，关于给田仁尊500元之事。全信录于本书第8章中。

19.1964年1月31日，毛泽东致函周世钊，关于经济和诗词问题。全信录于本书第7章中。

20.1965年1月12日，毛泽东致函周世钊。谈及经济问题。全信录于本书第8章中。

21.1966年1月29日，毛泽东致函周世钊。全信录于本书第7章中。

十 话逢知己

撰著《聊斋志异》的蒲松龄曾经说过，天下快意之事莫若友，快友之事莫若谈。

毛泽东与周世钊，这两位快友，在学生时代，在同事年代，他们谈了很多很多。后来，因为各居一方，未能有所晤谈。但自1950年幸福地会见后，快谈之时就很多了。他们往往促膝长谈，深夜不止。下面所记的几个片断，不过是一鳞半爪而已，可是，也可看到快友之乐了。

在1950年的10月中旬，毛泽东同意周世钊、王季范等离京参观，并决定了行期之后，在10月中旬的某天晚上，王季范、李旦冥、田士清、蒋竹如、张右源和周世钊同到中南海晋见毛泽东。

毛泽东问了他们参观的打算之后，指示说：“你们可以从张家口、大同、太原、石家庄、保定回到北京。这样绕一个圈子，多看些地方。”又说：“你们这次要走的的地方，还不太安静，我这里可以派几个警卫人员同去。”

周世钊说：“我们这些穿线长褂的教书匠，要什么警卫呢？”

毛泽东说：“你们从北京饭店出发，别人怎么会知道你们是穿线长褂的？非派警卫跟随不行。”

接着，毛泽东又谈到华北一些地区人民生活的改善情况。他说：“过去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面，华北很多地区人民生活很苦，常常是缺衣少食的，‘榆叶半年粮’已成了惯例。现在解放才二三年，农民分了田地，绝大多数的人家已经过着饱食暖衣的生活了。一些农家妇女，过去终年不用肥皂，现在要买肥皂了。过去洗脸不用毛巾，现在要买毛巾了。过去只在水缸里照自己的容颜，现在要买背面有梅兰芳戏装照片的镜子了。有一些农村干部批评她们吃不得饱饭，刚翻了身，就这样浪费。这些干部的看法实在是错误的，用用肥皂、毛巾和照照镜子，可说是农民起码的生活要求，怎么就算浪费呢？并且她们这样做，还可以刺激生产，同样分了田地，勤劳耕种的人家就有余钱剩下来去买自己想买的东西，耕种不力的人家就是想买也是没有办法，对比起来，不是可以刺激生产的积极性吗？”

毛泽东说到这里，又联想到下面的两件事，继续说道：

“有人主张禁止上海一些地方的跳舞场，我看不必那样性急，一些有钱的阔人，要他做公益的事，每每一毫不拔，让他们到跳舞场跳出几个钱供大家使用，不也是一种好事吗？”他还继续说道：

“天津市有一个呢织厂的厂长来京开会，不肯穿自己原有的呢衣，临时新制一身布衣，以表示朴素，这是虚伪的做法，也是大可不必的做法。我认为当大家生活还困难的时候，你个人特殊阔绰奢侈，是错误的，甚至是罪过；当大家生活已富裕，你个人特别装穷，过分俭薄，也未尝不是错误的行为。”

谈话后，周世钊等告辞。

1950年10月27日上午9时10分，中南海发车接周世钊和王季范，一般情况，周世钊等去中南海都是下午和晚上，今天却不同往常，早餐后就要去中南海，周世钊等不解其中原因。

会见毛泽东时，江青在座。江青说：“昨夜任弼时去世，今天早上，我们去他家作吊，现在还没有睡。”周世钊才明了这次早上来的缘故。

毛泽东在谈话中，谈到政治与宗教问题。他说：“在中国历史上，道教、佛教、五斗米教、明教、白莲教、天主教、八卦教，都常与政治有联系。”

接着又谈到唯物论与唯心论的区别。

1954年，毛泽东与周世钊又在长沙会面长谈，同时在座的有曹子谷、周小舟。

1958年3月，中央宣传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周世钊作为湖南省教育厅副厅长参加了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在怀仁堂会见了周世钊，作了一番指示，谈了有关教育工作的问題。当谈到有关学习教育学生时，毛对周说：“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

1958年，严重扩大化了的反资产阶级右派运动刚刚结束，各民主党派在北京开会，周世钊参加了会议。会议期间，周世钊、杨开智曾被邀去中南海。毛泽东会见了他们，并一起进了晚餐。谈话间，周世钊谓：大学生中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因念其年轻，应处理从宽，不宜全部开除，让其在学校中学习时改造思想较好。毛泽东表示赞同，并说：“你讲得很对，中央也有此种考虑。”

1959年5月10日，毛泽东曾经致函周世钊。全信如下：

东园兄：

上次谈话未畅，历史唯物论观点讲得不透，可以再来一谈否？如愿意来，企予望之，不胜欢迎之至！

祝好！

毛泽东

1959年5月10日上午9时

倚枕书

尚未睡觉，心血来潮，写此数语。

这封不同寻常的信，系用铅笔写的。毛泽东通宵达旦地工作、学习，直到上午9时，在临睡前刻，倚枕写了这封信。根据周世钊长子周思永回忆：其中“历史唯物论观点”系指为曹操翻案问题，毛泽东认为应该为曹操翻案，是符合历史唯物论观点的；周世钊则不同意此一观点，认为曹操人品不好，不该为曹操翻案。

在经过反对资产阶级右派运动的政治气候下，在毛泽东的崇高威望下，只有诤友、密友，才能如此坦率，不隐蔽观点，不迎合，真正的各抒己见，相互辩论，一次不成，再来一次，互不相让，这是周世钊的态度。而毛泽东呢？他在上午9时临睡倚枕写下了这封具有历史意义的信函，认为谈话未畅，欢迎再谈，表现了豁达大度的胸怀。这也可算是周世钊二谏毛泽东。

他们之间这样的交谈辩论，有多次都是延续至深夜。

1959年，周世钊被选为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是由湖南选举的。同年，他去北京参加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周世钊和罗方中同到中南海，会见了毛泽东。当天主要谈论知识分子问题，当时把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划入资产阶级范畴，周世钊对此颇有异议，不表赞同，他对毛泽东说：“谁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就不承认自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当时，对毛泽东的宣传搞得很过分，把他神化了，因此不少人见了毛泽东就象见了神一样诚惶诚恐，哪敢发表半点不同意见。例如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毛泽东在中南海春藕斋参加舞会，在轻松愉快的场合下，歌剧《江姐》的一名作者被带来见毛泽东。他一进春藕斋，胳膊和腿立刻僵硬得象木棍似

的，紧张得脸色苍白。他被带到毛泽东面前，嘴巴张了几次也说不出话，目光不知朝哪里落才好，便深深地鞠躬下去，腰弯得超过了90度。毛泽东示意叫他坐，他却无论如何不敢坐，一句话也讲不清楚，简直要晕倒了，别人只好把这个可怜的作者领走了。显然，当时极少有周世钊这样当毛泽东面为知识分子讲话的人。

毛泽东向周说：惇元兄啊，你现在是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堂堂的副省长了，我祝贺你啊！你现在分管什么工作啊？工作好搞吗？顺利吗？有什么困难啊！

周世钊回答说：我主要是做民主党派的工作，具体是做民盟的工作。1950年10月，主席曾指示王季老和我，叫我们两人都参加民主党派，我按照主席的指示办，现在我早就是民主党派的成员了。我先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后来我又加入中国民主同盟的组织。因为民盟的成员大都是在教育界。而且绝大多数又都是大学教师、大学教授，也有少量的中小学教师。我做民主党派的工作，又不得不联系教育工作，所以省人委就分给我管教育工作。

毛泽东说：教育工作是个很重要的工作。湖南省人委要你管教育工作，这是共产党对你的重视啊！你要好好的工作啊！

周世钊说：省人委要我管教育工作，我知道这是共产党对我的信任，我也深知我的责任重大。但是工作不好开展，困难很多。首先是个思想问题。我刚才讲了，民盟的成员大都在大学，而且他们又大都是大学教授。我自己又不是大学教授，我怎么去管他们，我怎么去工作呢？再说经过这次整风反右运动以后，大家都不敢说话了。因为他们都吸取了整风反右祸从口出的经验，有些人明明晓得他有思想问题，我去找他谈，他就是不肯讲。思想问题真是难得打通啊！

毛泽东听了周世钊的汇报后笑着说：思想问题能打得通吗？思想问题是打不通的。思想问题你越打，他就越不通。思想问题只能通过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才能解决问题；思想问题只能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用以理服人的方法才能解决问题。如果你抱着对某某人打通思想的态度去做某某人的思想工作，我可以肯定地说，你越打，他就越不通。不信你就去试试看。就拿你自己来说吧，你刚才不是说你不是大学教授，因而你就不敢去做大学教授的思想工作。这就是你的思想问题，对不对？如果我抱着打通你的思想问题的态度，去做你的思想工作，我就会对你说，这是组织给你的任务，你必须完成，你应该去完成；你必须去做好，你应该去做好。但是这样非但没有解决你的思想问题，反而增加了你对问题的反感，你说对不对？但是如果跟你过细分析一下现状，你就会知道，一方面你虽然不是大学教授，但是按照你的资历，按照你的本领来说，我看你完全够得上一个文学方面的教授，只是因为长期在中学任教，中学没有教授这个职称罢了。这就是说，你去做大学教授的工作，完全具备了兵对兵，将对将的条件了。所以湖南省人委分给你管教育工作，这不仅是对你的信任，而且是对你的重用。他们相信你有能力有资格做好这份工作。再说你必须看到，中国的知识分子，经过抗美援朝战争，经过整风反右以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从实践中看到，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中国的出路只有一条，这就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别无他路可走。你去做大学教授的工作，是中国共产党派你去的，又不是你自己要去的。他们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我想他们就一定会拥护你去做他们的工作的；他们也会欢迎你去和他们交朋友，欢迎

你去和他们谈话。你在和大学教授们做思想工作的时候，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怎样看一个人。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方法问题。我认为任何一个人，只要他不是反革命分子，都有其优点和缺点。一般说来，每个人的优点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只不过是程度不同罢了。任何一个人，自从他怀胎以后，直到他死后，都有其优点和缺点。一个人在他娘肚里怀胎以后，他们的父母因为有了一个小宝宝，感到高兴，感到自豪。他给了他的父母精神上的鼓舞，无疑也会对他们的父母工作上带来好处，这就是一个人怀胎后的优点。但是，一个人怀胎后也会给他的母亲带来这样那样的不舒服，这就是未出生胎儿的缺点。一个人到了老了死后，也还有其优点和缺点。其优点是后人可以用前辈人的优良传统，用他们的好思想和好作风来教育后代好好学习，好好工作，这就是老人死后的优点所在。但是，一个人死后，如果他要安葬的话，他就要占用一块土地，如果是火化了的话，他也要占用一小块地方来安放骨灰，这就是人死后的缺点。我们在看任何一个人的时候，首先要看他的优点，不要先看他的缺点。因为一个人，尤其是那些缺点多一点的人，如果不是先看他的优点，而是先看他的缺点，那他简直像个反革命。这种看人的方法错了。如果抱着这种态度和方法去做人的思想工作，当然也是错误的。因而也不会有好的效果。所以我认为，你到大学里去找大学教授们做思想工作的时候，你要事先调查一下，某位教授有些什么优点和缺点，在调查了解情况的基础上，你在和教授们谈话时，要先看他的优点，而且还要多看他的优点，肯定他的优点。你到他的单位，甚至到他的家里和他谈话，你多讲他的优点，他就自然会讲良己的缺点，他就必然会说自己不足的地方。这样你就可以因势利导，鼓励他发扬优点，克服缺点。这样你的工作就好做了。所以，我相信只要你方法对头，敢于工作，善于工作，你的工作一定会有成效的。

听了毛泽东这番话，周世钊很是高兴。据他自己说，毛主席这次跟他的谈话，对他做好教育工作和民主党派的工作，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

1961年，全国人大会议期间，正是民盟会议期间，周世钊又到了北京。一天，他与罗方中同见毛泽东，毛泽东留友晚餐。

1962年，毛泽东到了长沙。在长沙东站，毛泽东邀请周世钊共餐。餐间，江青说：“我想去第一师范看看。”毛泽东阻止了她，并说：“你还是不去的好。你去后，师生们会来看你，影响他们的学习。”

1962年，毛泽东回北京后，周世钊也到了北京，进了中南海，和毛泽东谈论关于民主党派的问题。

毛泽东对周世钊说：民主党派的工作也是党的工作。你做好了民主党派的工作，就算是完成了党交给你的光荣任务。民主党派的成员，尤其民盟、民进、农工、九三学社的成员，大都是知识分子，很多人都是专家学者。他们知识渊博，经验丰富。只要我们做好了他们的工作，他们将会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很大的贡献。民革的成员，大部分是旧军政人员，也有各个方面的专家学者。他们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会作出贡献。将来我们解决台湾问题时，他们更会发挥很大的作用，会作出很大的贡献。民建、工商两会的成员，主要是过去工商界的人士，也有在各个方面的专家学者。他们对于如何搞好经济建设，尤其是对于如何搞好企业的经营管理很有经验。他们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会作出很大的贡献。民革、民盟、民建、农工、民进、九三、工商联这几个民主党派，在全国各个省市都有他

们的组织，还有台盟和致公党，成员不太多，只有在北京和全国大一点的城市才有他们的组织。他们的成员和所联系的群众主要是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他们都是爱国的，他们对我国的建设事业，也会作出积极的贡献。全国所有各民主党派的成员合起来一共有多少呢？一共有十万多一点。经过整风反右以后少了一点。中央统战部的负责人会找各民主党派中央的负责人商量，打算在适当的时候，在他们各自联系的群众中再发展一点，还发展到十万多一点。因为中国各民主党派的成员一共有十万多，这是国际上知道的。少了对国际的影响不好。所以要再发展一点。我们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友好关系，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但是必须明确，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国执政的党，各个民主党派必须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前提。中国共产党对各民主党派的方针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周世钊问：您这个长期共存要长到什么时候啊！

毛泽东接着说：所谓长期共存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和各个民主党派不是在同一个人的时候产生的，但要在同一个人的时候消亡。你学过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政党、阶级的论述吗？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在将来全世界都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了世界大同以后，国家就会自然而然地消亡了。国家消亡以后，政党也就自然失去了存在的必要了。到了那个时候，共产党消亡了，各个民主党派自然也就消亡了。长就长到这个时候。所以我们说中国共产党和各个民主党派的生命是：不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所以我说做民主党派的工作是光荣的，民主党派的工作是大有可为的。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很大的国家，但又是一个很穷的国家。穷固然不好，但也有好的一面。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嘛！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上下，团结一致，依靠我们的力量，推翻了三座大山，打垮了蒋家王朝，消灭了国民党八百万反动军队。1949年10月1日，在我们开国典礼的时候，我代表中国共产党和全中国各族人民向全世界人民庄严宣布，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既然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我们就要站好，我们就要永远站下去。我深信我们中国人民，包括各个民主党派的成员在内，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加上国际的援助，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我们也一定能够把我们的国家治理好。我们能够打天下，我们也就能够治理天下。中国人民是勤劳勇敢的。中国的工人阶级是有骨气的。中国的知识分子是爱国的。只要我们把各个方面的工作搞好，依靠中国的工农大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经过一代又一代的努力，我深信我国人民一定能够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繁荣昌盛的新中国。但是，我们的国家底子薄，要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的确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首先大家要虚心学习。向书本学习，向行家学习，向一切有经验的人学习。只要对我们的国家建设事业有利，资本主义国家的管理经验，我们也应该学。我过去跟你讲过，你是一位没有戴帽的文学教授，你也是专家。你在南京东南大学毕业后，教了几十年的书，而且教得很好，很有文才，你不算教授算什么啊！不过教授也好，专家也好。都有一个重新学习的问题。不管什么人，只有虚心学习，才有进步。你是湖南的副省长，又是湖南省一个民主党派的头头，你主管湖南省的教育工作，兼做民主党派的工作，你也要好好学习，才能不断进步，才能把工作搞好。希望你认真学习党的方针政策，认真学习党的有关文件，尽职尽责，把工作搞得更好。

周世钊说：我们这次开民主党派的会议，实际上也是一次学习的会议。

是一次学习党的方针政策的会议。我是一个民主党派的成员，我主要就是做点民主党派的工作。别的工作我就下管了。不是我不管，而是我无权管。我们这些党外人士安排为副省长是配像的，是做样子给人家看的。我是有职无权。我名义上是个副省长，分给我管教育工作，实际上我的权就是做民主党派的工作，除此以外别无他权。名义上分给我管教育工作，实际上教育工作的情况我无权过问，什么情况我都不知道。另外您说要搞好工作，要好好学习，要学习新的东西，这当然完全是对的。但是我在家里每天除了做点民主党派的工作外，就是看书看报，什么文件我也看不到，叫我怎么去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啊！我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就是从报纸上学，不是从文件上去学，因为我没有文件可看。

毛泽东说：有这样的事啊！我设法告诉张平化同志，我叫张平化同志他们以后就教育方面的问题和你多商量。我也叫他们以后要将有关文件送给你看。

周世钊这次从北京回来以后的第三天，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的负责同志，就送来了一些党内的文件给他看。几天以后，张平化同志也专程来看望他，鼓励他大胆工作，积极抓工作。从这以后，党中央、国务院的有关文件，省委、省人民委员会的有关文件，都及时送给他看。省教育厅的负责同志也经常来向他汇报和请示工作。周世钊也经常到各地去视察学校。后来省委的有关负责同志，不仅就有关教育工作的事情经常和他商量，而且省委召开有关会议时，也常请他列席会议。

1963年，周世钊参加全国人大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周和第一师范时的同班同学贺果（贺培真）相遇。贺是来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于是，他们两人一起会见了毛泽东，在人大休息室谈论。

1964年，毛泽东来到长沙，周世钊应邀去见，共同照相留念。

1965年1月，毛泽东与周世钊在人民大会堂相见。同年10月，毛泽东又在中南海会见周世钊，同座的有章士钊、程潜、王季范等，大家话说韩愈、柳宗元的文字，随后共进晚餐。

一般说，周世钊到北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其他会议到京时，毛泽东不论工作怎么繁忙，总要设法抽时间约他见面叙谈一次。每次会议快闭幕时，周世钊就给毛泽东去信。一般是去信后三四天，毛泽东就来电话约他去见面。因此，周世钊给毛泽东去信后，就嘱其秘书陈明新在房内等候中央办公厅的来电。可是1962年，周世钊从北京前门饭店624号房间给毛泽东发信已有一周，中央办公厅还没有来电话。周世钊责怪陈明新，是否外出失职，没有守候电话。陈明新向周世钊怎么解释，周也不信，甚至发点脾气。闭幕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三千多人集中在中南海怀仁堂照相。临照相时，毛泽东对工作人员说，请大家等一等，我要约个朋友先谈谈话，于是毛泽东和周世钊到一间房间谈话。毛对周说，惇元兄，你从前门饭店寄给我的信收到了。这几天因为我工作很忙，没有单独请你到舍下见面，很抱歉。今天我们就在这里谈谈，然后一起去照相。以后。周世钊对陈明新说：老陈啊，毛泽东给你平反了。不是你外出失职没有接到中央办公厅的电话，而是毛泽东工作太忙，没有时间约我到他家见面。我错怪你了，很对不起，请你原谅。

从这一插曲中，可以看到周世钊和毛泽东对其谈话的重视。

第七章 酬唱奉和

在 1986 年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选》中，一共收入了毛泽东的 50 首诗词，写作时间为 1918 年到 1965 年。在这 50 首诗词中。答和周世钊的共有 3 首，即 1955 年的《七律·和周世钊同志》、1956 年的《水调歌头·游泳》及 1961 年的《七律·答友人》。其他和当代大诗人柳亚子的也是 3 首，即 1949 年的《七律·和柳亚子先生》、1950 年 10 月的《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及 1950 年 11 月的《浣溪沙·和柳先生》。还有和当代大诗人郭沫若的 2 首，即 1961 年的《七律·和郭沫若同志》及 1963 年的《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同毛泽东有 1 首诗词关系的则有罗章龙、杨开慧、彭德怀、丁玲、李淑一、李进、罗荣桓等 [1]。由此可见，毛泽东和周世钊还是同为诗人的诗友。

其实。毛泽东与周世钊的酬唱奉和不止这 3 首。他们的诗词交往源远流长，约从 1915 年开始，至少延续到 1972 年。甚至更长，总计有 6 年左右的时间。

— 同学少年的诗作

在第一师范时期，周世钊开始学诗，毫无门径，他虽熟读唐诗三百首，也还不能写成合规律的诗。他到图书馆借了一册《杜诗详注》，抄读了百多首五律，并详看了仇兆鳌的注释，还写不成篇。后来在同学的影响下，写出一首题为《濯清亭》的五律：

突兀孤亭起，江山入望兮。
烟霞朝夕变，絃诵岁时闻。
一雁过秋浦，千林设夕曛。
朱张曾唱和，独立缅清芬。

在成诗 60 年后。周世钊认为这是他的第一首诗，并认为此诗虽浅拙无意义，但是是写诗的开始，所以一个甲子后仍能记忆。

学生时代的毛泽东也喜欢写诗，在短短的几年间，他赠送答和周世钊的诗有 50 首之多，可惜后来散失了。[27]

当时的第一师范，每学期还组织一次国文会考，籍资比较以促进步。会考时，除笔墨及起草纸外，不得携带他件，不得抄袭成文，不得交谈起身，限五小时齐卷。1917 年 7 月的国文会考，当选学生（即及格者）414 人，其中甲等只有 30 人。周世钊即为甲等当选者，其他还有李维汉等。[4]

在毛泽东担任总务的学友任会中，周世钊文学部部长，其中诗歌组的同学在傅熊湘先生的指导下，在周世钊部长的带领下，学诗成风。他们首先读了《唐诗三百首》，有些同学读了《唐诗别裁》、《杜诗镜铨》、《杜诗详注》等。自修室、寝室、调养室时间吟哦之声，有的同学睡觉时也还在选词琢句。组员每有所作，部交到周世钊处，周世钊把它们集合订成一本送交傅先生批改，傅先生发现佳句佳篇，每每加以浓圈密点，并以批语奖节，引起了组员作诗的兴趣，很多人虽不会作，也勉强学步，做几句试试。第七班岳德盛作了一首吟城南古迹的七律，经傅先生批阅后，交出传观，认为是当时组员中的压卷之作。

在学诗成风的环境下，有人想学填词，恰好《新青年的读者校内已有不少的人。《新青年》上偶有写得清新流利的动人词作，更促进人学习的兴趣，于是买《白香词谱》来阅读学习的也有不少的人。在这种良好的环境中，周世钊与毛泽东的写诗填词水平大有提高，兴趣亦很浓。毛泽东当年写的一首诗里，曾有这样两句：“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这是游泳活动的写照与诗词写作的记录。

二 忆往昔与凋骏骨

毛泽东的诗词写得极为出色，赢得了全国人民的热爱与赞美。革命家与诗人，集于毛泽东一身。在 60 多年的时间中，他奔忙于革命事业，为革命事业鞠躬尽瘁，可是，他始终没有丢下诗。他写诗，与革命实践同始终，也是和他的内心活动密切联系着的。1925 年，他就写出了《沁园春·长沙》这样非凡的词章来。这是一首相当成熟的作品。“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我们可以想象，周世钊是比较早期就读到这首词的。

1946 年，周世钊写下了《七律·感愤》这样的哀伤诗。“卅载青氈凋骏骨，九州明月系离肠。”

1919 年 9 月 28 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前三天。周世钊自长沙寄长书给毛泽东，其中可能附有《七律·感愤》一诗。毛泽东读了之后，于 1949 年 10 月 15 日，即新中国诞生后的半个月时，复信周世钊，他写道：“兄为一师校长，深庆得人，可见骏骨未凋，尚有生气。倘有可能，尊著旧诗尚祈抄寄若干，多多益善。”这是毛泽东对周世钊的关怀，鼓舞了周的斗志。

周世钊遵照毛泽东的嘱示，以后不断给毛泽东抄寄旧诗。此处的旧诗当指旧体诗词。这使得两颗诗人的心联系得更加紧密了。

解放后，一些外国人评论毛泽东时常说：“一个诗人赢得了一个新中国。”这话是有一定道理的。毛泽东有着坚强的马列主义信仰，有着坚韧不拔的革命斗志，同时，他心中充满着诗的感情，他有一颗炽热的诗心。他关怀诗，关怀诗人，向诗友周世钊索诗，而别人向他索诗时，他不一定都能满足。例如，1941 年 1 月 31 日，毛泽东致毛岸英、毛岸青的信中说：“岸英要我写诗，我一点诗兴也没有，因此写不出。〔22〕”即使是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向他索诗，在他没有诗兴时，他也就写不出诗，可见诗人作诗之严谨。

三 同上岳麓山至云麓宫[26]

每年六、七月间，也就是阴历五月端午节前后，湘江的中下游照例是要涨一次或几次大水的。湖南人称呼这几次大水为“端阳水”。1955年6月中旬，天雨不歇，湘江水涨。长沙市和岳麓山之间的湘江水面要比没涨水时增宽五分之二以上。从岸上望去，只见波澜壮阔，不见边涯。

刚从海边视察回转的毛泽东，这时来到长沙。6月20日那天，他要在涨水的湘江中游泳。上午10时30分，他从城外七码头乘小轮船溯江而上。这是久雨初晴的日子，天空还遮着薄薄的云层，初夏的凉风掠过水面，吹到人身上，使人感到分外舒适。毛泽东穿着白色衬衫，精神很饱满地和围坐在他身边的周世钊等谈话。他几回起身到船边，从窗口仰视天色，俯瞰江景。有些同志觉得今天虽然没有下雨。但江面宽，水流急，担心他游水有困难，想用各种理由去劝阻他。

“今天的江水，挟带泥沙，显得不那么清洁，似乎不适于游泳。”首先是年逾七旬的某副省长提出这样的意见。

“水清水浊，不是决定适不适于游泳的主要条件，你说的这一点，可以不必考虑。”毛泽东回答了他。

“现在湘江水涨，水又广又深，游泳也许不便。”接着提意见的是周世钊。

“你不要说外行话！庄子不是这样说过吗：‘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功。’水越深，浮力越大，游泳起来当然越要便利些，你怎么反说不便呢？”

这时，小轮船已经到了猴子石附近。毛泽东起身穿上了游泳衣服，缓步下船，走上木划子。他从容地坐在木划子的边沿上，将两足伸入水中，又用江水将全身洒湿，作好游泳的准备。陪同毛泽东游泳的十多个年轻小伙子，早已跳入水中，等到毛泽东入水游泳时，他们或前或后，或左或右，或沉或浮地围绕在他的周围，朝向西岸前进。

周世钊等站在小轮船上的人都停止了交谈，聚精会神地看毛泽东游泳。他游到哪里，大家的目光就移注到哪里。只见他时而侧泳，时而仰泳，态度安闲，显得轻松不花气力。恰象安卧在微波软浪上面，让它平稳地舒缓地向前推进。他还时常看看两岸的风光，看看天空的云朵，看看小轮船上站立的人群。

“累了吧？请上船休息一会再游。”这句话，几回从小轮船上站立的人群中说出，但得到的回答是：“不累就不要休息，到达对岸再上来。”

大概又过了三刻多钟，小轮船已经开到西岸的牌楼口，大家指着此时还未到岸的游泳人群说：“这不是横渡湘江，而是斜渡湘江，斜渡比横渡的距离要大一倍，所以花时间就更多了。”不久，毛泽东和同游的十多人先后在牌楼口的北面半里的地方登岸。从下水到登岸，整整花了一个小时。

毛泽东穿好衣服后，步行到牌楼口，登上汽车，向岳麓山驰去。小轮船上的人也离船上岸。大家都流露着愉快的微笑。

毛泽东已经三十多年不到岳麓山了。这天趁着横渡湘江之后，决定去看看留着 he 年轻时期活动痕迹的爱晚亭、白鹤泉、云麓宫、望湘亭等地方。

汽车只能开到白鹤泉。白鹤泉以上，山势陡峭，道路曲折，仅能步行。毛泽东和同游的十多人都在白鹤泉下车休息。湖南省委准备了三乘轻便轿

子。是供毛泽东、程潜等几个老年人坐着上山的。毛泽东坚决不肯坐轿。穿着皮鞋，走在前面，直向云麓宫一步一步走上去。皮鞋踏着山路上突出的石子，润滑的苍苔，很不好走，他却走得很快，气也不喘，还和陪游的人谈谈笑笑。一直登上了矗立在岳麓高峰的云麓宫。

毛泽东还不肯就坐下来休息，巡视云麓宫壁间悬挂的诗词对联后，又走到宫外的望湘亭，凭着石栏，眺望美丽如画的桔洲、湘水，指点飞烟缭绕、红旗招展的长沙市区，眼前呈现一片繁荣兴旺的景象，觉得和过去迥然不同了。回头望望云麓宫壁间、柱上悬挂的“西南云气开衡岳，日夜江声下洞庭”的对联和“一雨悬江白，孤城隔岸青”的诗句如何不见了？有人告诉他：岳麓山经过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火的摧残，解放后才逐渐修复，但这些东西还来不及恢复原状。

下午2时在望湘亭进午餐时，毛泽东谈笑甚欢，丝毫没有疲倦的表现。周世钊觉得毛泽东还和青年时代一样，对他说：“您是60以上的人了，还是这样健康！还能像今天这样横渡湘江，这样登上岳麓，大大赛过了许多年轻的人。如果把今天的真实情况讲给青年们听，一定会使他们感到无比的兴奋，认真向您学习。”毛泽东说：“这算什么！爬山吧，仅仅这样一点路程。游水也不是什么难事情。我们不是每天都要走路么？游泳时有水的浮力帮助，比走路应该是容易多了。但是游水也容易出问题，不可粗心大意。我在第一师范学习游泳时，出过几次危险，不是同学的救护，险些‘出了洋’。”这话引得两桌的人都笑了起来。

饭后已经是下午3点多了，天又下了一阵小雨，没有按用预定的计划到爱晚亭去，就下山回来，渡江时，毛泽东站着船头眺望江景。周世钊看到他健壮的身躯，舒畅的神态，他的脑海中又涌现出毛泽东刚才游泳爬山时的印象，觉得毛泽东真是健康啊！

这天深夜，周世钊兴奋得不能就寝入睡，伏在桌前，想把今天陪毛泽东登云麓宫的事写一首旧诗，刚提笔写了“滚滚江声走白沙，飘飘旗影卷红霞。直登云麓三千丈，来看长沙百万家”四句后，就想不出怎样接续的句子了。后来续成了后四句：“故国几年空兕（sì音四）虎，东风遍地绿桑麻。南巡喜见升平乐，何用书主颂物华。”当晚，周世钊又在日记本上接续写道：“今天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一天，也是我最幸福的一天，因为我看到我们伟大的领袖这样健康，这不仅是我个人的幸福，而是6亿人民的幸福。我希望他永远象今天一样健康，永远领导我们向着光明幸福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大道上前进。这不只是我个人的衷心祝愿，也是6亿人民的衷心祝愿。”

周世钊的这篇文章，曾被发表在他的著作《毛主席青少年时期锻炼身体的故事》中。1983年12月26日的《湖南日报》，又一次发表了这篇文章以作为对毛泽东的90周年诞辰的纪念。1985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难忘的回忆——怀念毛泽东同志》中又一次收进了这篇文章。本书引用时在人称上稍有改动。

四 岳麓山麓两诗人

1955年10月4日，毛泽东致函周世钊，并和诗一首。全信如下[22]：

惇元兄：

惠书早已收读，迟复为歉。承录示程颂万遗作，甚感，并请向曹子谷先生致谢意。校额诸件待暇当为一书，近日尚未能从事于此。读大作各首甚有兴趣，奉和一律，尚祈指政。春江浩荡暂徘徊，又踏层峰望眼开。风起绿洲吹浪去，雨从青野上山来。尊前谈笑人依旧，域外鸡虫事可哀。莫叹韶华容易逝，卅年仍到赫曦台。

顺问

近佳

毛泽东

1955年10月4日

周世钊约于1955年4月被任命为湖南省教育厅副厅长兼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校长，1955年6月随毛泽东上岳麓山直至云麓宫，写了那首七律：《从毛主席登岳麓山至云麓宫》。毛信中讲的大作各首中，可能就有这首七律。而上节所述的那幸福的一天，可能就是这首和诗写作的背景材料。

毛信中的程颂万，系湖南宁乡人，晚清诗人。曹子谷，即曹籽谷（1876—1960），名典球，湖南长沙人。解放前担任过湖南省教育厅厅长，湖南大学校长。解放后曾任湖南省政协常委、湖南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信中所述的赫曦台是湖南长沙岳麓书院的附属建筑，据说是朱熹讲学所在处。

毛泽东和周世钊，30年前都在长沙读书、教书。“莫叹韶华容易逝，卅年仍到赫曦台。”如今却又“春江浩荡暂徘徊，又踏层峰望眼开。”

毛泽东的和诗被编入1986年版的《毛泽东诗词选》中，题为《七律·和周世钊同志》。1991年3月16日，江泽民总书记视察岳麓书院时，在赫曦台轻声吟读这首诗，并叫秘书抄下。

1985年9月，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王毅编的《岳麓山诗词选》。该书作者搜集了自唐朝以来的历代诗人歌咏岳麓山的1500多首诗词，从中选注了198首，入选作者只有144家，近代作者仅六七人。这六七人中，就有毛泽东与周世钊。毛泽东的入选词为《沁园春·长沙》。作者简介中称毛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他的诗词是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光辉典范，周世钊的入选诗词为《七律·从毛主席登岳麓山至云麓宫》和《踏莎行·秋日游爱晚亭》。作者简介中称周世钊为毛泽东同志在湖南省第一师范读书时的同班同学、密友。解放后曾任湖南省副省长。喜爱文学，对诗词有造诣。

[28]

毛泽东与周世钊不愧是岳麓山麓两诗人。

1983年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共收入毛泽东在1920年至1965年期间的372封书信。这些信中有毛泽东诗词全文的只有3封信，一封是1955年10月4日致周世钊的，信中有《七律·和周世钊同志》；又一封是1956年12月5日致周世钊的，信中有《水调歌头·长江》；第三封是1957年5月11日致李淑一的，信中有《蝶恋花·答李淑一》。

《毛泽东书信选集》中的注释极为丰富，总计有 900 多条。其中有他人全诗的，只有周世钊的一首，即下节中叙述的《五律·过许昌》。这是该书中一首他人诗词。

五 过许昌和游长江

1950年9月29日清晨，周世钊受毛泽东之邀，北上相会。列车到了河南许昌，前去长沙邀请的张森洪的爱人以炮兵师师长驻许昌。张要去看他，因此签票下车，在炮兵师部停留一日。

周世钊到许昌市区闲逛了几个钟头，想寻曹操在许昌的遗迹，渺无可得。当时正是烟厂收购烟叶时，肩挑车送，络绎不绝，而郊区则遍地豆苗，已届黄落。于是：周世钊口吟《五律·过许昌》：野史闻曹操，秋风过许昌。荒城临旷野，断碣卧斜阳。满市烟香溢，连畦豆叶长。人民新世纪，谁识邺中王！

就是这首五律，是《毛泽东书信选集》中一首他人词词。

周世钊将这首五律寄赠毛泽东。五年以后，即1956年12月5日，毛泽东因此致函周世钊，并答词一首。全信如下：

惇元兄：

两次惠书均已收到，情意拳拳，极为高兴。告知我省察情形，尤为有益。校牌仍未写，因提不起这个心情，但却时常在念，总有一天要交账的。时常记得秋风过许昌之句，无以为答。今年游长江，填了一首水调歌头，录陈审正。

水调歌头 长江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余。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乎！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暂时不会出国，你们的意见是正确的。

问好！

毛泽东

1956年12月5日

毛信中所述的：“秋风过许昌”，即是周世钊赴北京参加国庆观礼路过许昌时所作的《五律·过许昌》一诗。不过这是五年以前所写，而毛泽东却是“时常记得”，可见印象之深。

词名《长江》，在1957年1月交《诗刊》创刊号发表时改题《游泳》。并将“逝者如斯乎”订正为“逝者如斯夫”。在1963年12月出版的《毛主席诗词》中将：“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改为“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以后又改成原稿样。这些更改，可足证毛泽东对于自己的诗词是精益求精，平等待人，与人真诚相见，不耻下问，广泛征求意见，他听说的“录陈审正”是出自肺腑的。正因为他此时虚怀若谷，从而使别人能坦率地表示意见。

周世钊的长篇连载《毛主席锻炼身体的故事》[29]发表时，1959年第2期的《新体育》刊登了《毛主席游泳词亲笔原稿》，就是本信之原稿。1959年1月29日的《新民晚报》也转载了原稿，并连载了周之全文。1986年版的《毛泽东诗词选》也刊用了这一珍贵手迹。

六 毛泽东致函周世钊释诗

1958年7月，周世钊被选为湖南省副省长。受任新职，恩绪万千，致函毛泽东，陈述复杂思想。周信是10月17日发出的，谁料只隔一周，毛泽东于10月25日就复函周世钊。全信如下：

惇元兄：

赐书收到，10月17日的，读了高兴。受任新职，不要拈轻怕重，而要拈重鄙轻。古人有云：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二者不可得而兼。我看你这个人是可以兼的。年年月月日日时时感觉自己能力不行，实则是因为一不甚认识自己；二不甚理解客观事物——那些留学生们，大教授们，人事纠纷，复杂心理，看不起你，口中不说，目笑存之，如此等类。这些社会常态，几乎人人要经历的。此外，自己缺乏从政经验。临事而惧，陈力而后就列，这是好的。这些都是实事，可以理解的。我认为聪明、老实二义，足以解决一切困难问题。这点似乎同你谈过。聪谓多问多思，实谓实事求是。持之以恒，行之有素，总是比较能够做好事情的。你的勇气，看来比过去大有增加。士别三日，应当刮目相看了。我又讲了这一大篇，无非加一点油，添一点醋而已。坐地日行八万里，蒋竹如讲得不对，是有数据的。地球直径约一万二千五百公里，以圆周率3.1416乘之，得约四万公里，即八万华里。这是地球的自转（即一天时间）里程。坐火车、轮船、汽车，要付代价，叫做旅行。坐地球，不付代价（即不买车票），日行八万华里，问人这是旅行么，答曰不是，我一动也没有动。真是岂有此理！囿于习俗，迷信未除。完全的日常生活，许多人却以为怪。巡天，即谓我们这个太阳系（地球在内）每日每时都在银河系里穿来穿去。银河一河也，河则无限，“一千”言其多而已。我们人类只是“巡”在一条河中，“看”则可以无数。牛郎晋人，血吸虫病，蛊病，俗名鼓胀病，周秦汉累见书传，牛郎自然关心他的乡人，要问瘟神情况如何了。大熊星座，俗名牛郎星（是否记错了？），属银河系。这些解释，请向竹如道之。有不同意见，可以辩论。十一月我不一定在京，不见也可吧！

毛泽东

1958年10月25日

信中，毛泽东称周世钊为“贤者在位与能者在职”可以兼的人，又把周世钊10月17日的信叫作“赐书”，这在1983年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选集》的372封信中也是极少见的。足资说明，这两位友人之间的关系非同一般，了解透彻，相互尊敬。

毛泽东的《七律·送瘟神》写于1958年7月1日，最早发表在1958年10月3日的《人民日报》上。诗发表后的第22天，即1958年10月25日，毛泽东写下了自己的注释，达400字。这恐怕是公开发表中最长的一篇毛泽东自注文字了。

信未讲的牛郎星不属大熊星座，它是天鹰星座中的α星。大熊星座中的星和牛郎星都属银河系。

七 《七律·答友人》的始末

1961年12月26日，毛泽东68岁过生日的日子里，他给友人周世钊奋笔致函：

世钊同志：

惠书收到，迟复为歉。很赞成你的意见。你努力奋斗吧。我甚好，无病，堪以告慰。“秋风万里芙蓉国，暮雨朝云薜荔村”。“西南云气来衡岳，日夜江声下洞庭”。同志，你处在这样的环境中，岂不妙哉？

毛泽东

1961年12月26日

信中的“秋风，暮雨”句，见谭用之《秋宿湘江遇雨》（全唐诗卷764）。后半句原为“暮雨千家薜荔村”。

信中的“衡岳，洞庭”句，出自清末诗人黄道让的《七律·重登岳麓》（雪竹楼诗稿卷6）。上半句原为“西南云气开衡岳”。

“西南云气开衡岳，日夜江声下洞庭”，曾被选为岳麓山对联。许多人把“开衡岳”误作“来衡岳”。其实，“开”字远胜于“来”字。“云气开衡岳”，人们看到的是衡岳。“云气来衡岳”则看到的是云气而不是衡岳了。

这副对联没有一字提到岳麓山，而写的恰恰是岳麓山。“西南云气开衡岳”，写的是岳麓山的西南，从天空着眼写山，好象南岳衡山也峥嵘可见，运用视觉来察颜观色。“日夜江声下洞庭”写的是岳麓山的东北，从地下落笔写水，似乎洞庭湖水也叮咚可听，运用听觉捕声捉音。寥寥14个字，囊括了湖南的雄山胜水。难怪毛泽东在经过30多年后的1955年6月，由周世钊等陪同重登岳麓山直至云麓宫时问道：“云麓宫壁间、柱上悬挂的‘西南云气开衡岳，日夜江声下洞庭’的联语和‘一雨悬江白，孤城隔岸青’的诗句如何不见了？”

就在毛泽东写这封信的同一年，他写下了千古绝唱《七律·答友人》。过了两年，在他70大寿的1963年12月，正式发表了《七律·答友人》。于是，关于“友人”是谁的问题引起了广泛的兴趣。

毛泽东本人在1964年2月4日写的“对自己诗词的几点解释”中写道：“友人，是一个长沙的老同学。”

周世钊在1964年2月16日，曾注释毛泽东诗词《七律·答友人》。他写道：“大概由于这个（或这些）在长沙的友人的诗歌和书信写到湖南人民生活情况，引起了主席对湖南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怀念、歌颂和希望。”

为《七律·答友人》的注家蜂起。郭沫若在1964年5月16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芙蓉国里尽朝晖》一文中认为：

“九嶷山上白云飞”这首七律，形象极其壮丽，声调极其和谐，令人百读不厌。我最初对于诗中的“长岛”和“芙蓉国”两个辞，没有明确的了解，曾经作过种种的揣测，结果都没有猜中。

关键是在“芙蓉国”。主席告诉我们：“芙蓉国”是湖南的异称。公元九百五十年代的诗人谭用之，有《秋宿湘江遇雨》七律一首，其诗

云：

湘上阴云锁梦魂，江边深夜舞刘琨。
秋风万里芙蓉国，暮雨千家薜荔村。
乡思不堪悲橘柚，旅游谁肯重王孙？
渔人相见不相问，长笛一声归岛门。

《全唐诗》中有著录，言“谭用之，字藏用，五代末人。善为诗而官不达。诗一卷。”（首句“湘”字误作“江”。）

这首《秋宿湘江遇雨》一诗，虽然并不怎么好，但它却点出了“芙蓉国”的故实。可见唐五代时，湖南境内遍地都是芙蓉。芙蓉有异说，除木本的芙蓉之外，水里的荷花古人也叫作芙蓉。谭诗中的“芙蓉”到底是哪一种呢？有人说是指荷花，但在我看来就是木芙蓉。因为谭诗写的是秋天，正是木芙蓉盛开的时节，所以能得出了“秋风万里芙蓉国”的佳句。如果是荷花，在秋季便已经雕败了。

芙蓉国既肯定是湖南，则“长岛”便不能离开湖南境内。我曾经猜测为广西苍梧县的长洲，山东蓬莱县北的长山岛，东北的长山群岛，乃至猜测为日本，为美国的长岛。实际上都猜错了。原来“长岛”就是长沙西面在湘江中的水陆洲或者橘子洲。洲是沙洲，其长七里，闻长沙之名即由此而得。[30]

郭沫若还认为：这首诗，把有关湖南的传说，利用得很巧妙。前四句是利用了虞舜和二妃的故事。《毛泽东诗词选》也有注释：[九嶷山]又名苍梧山，在湖南省南部宁远县城南60里。古代传说：尧帝有二女，名娥皇、女英，同嫁舜帝。舜南游死于苍梧，即葬其地。二妃寻舜至湘江，悼念不已，泪滴竹上而成斑点，称为湘妃竹。所以下文有“斑竹一枝千滴泪”之句。如今，众多的研究者们比较清楚，“芙蓉国里尽朝晖”与“秋风万里芙蓉国”是一脉相承的。“洞庭波涌连天雪”和“日夜江声下洞庭”也颇有联系之处。

《七律·答友人》发表不久，胡愈之曾专函周世钊，说北京传说是答周世钊的。在将《毛主席诗词》翻译成英语时，袁水拍又专函周世钊，问询“友人”应是单数，抑或复数。其他还有很多人和一些报刊编辑部函询过周世钊。

后来，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郭沫若与北京大学中文系“丛中笑”座谈时指出：诗中的友人姓周，系毛主席在长沙的老同学，当时任湖南省的省长还是副省长。他给毛主席写了一首诗（郭老那儿也抄有这首诗），毛主席这首诗就是答他的。郭沫若还有多次答其他群众组织询问时也认为诗是答周世钊的。

1968年7月16日，周世钊就《答友人》一诗写了一封有价值的信，信是复给吉林师范大学中文系毛主席诗词学习班的，信文如下：

……：

6月26日来信收读已多日，以适染微恙，廷延未痊，裁答稽迟，很感抱歉！

你们的信和诗，我过细看过之后，感觉你们对毛主席和他的诗词都是十分热爱的，相信在你和你的同志们共同编写的主席诗词解释，一定是经过深入研究分析，有独到的见解，能给读者以启发教育的。

关于你提的三个问题，我在这里简单奉复如下：

一、《七律·答友人》一诗自发表后，我这里接到一些询问是否答

我的来信，郭老甚至对人讲肯定是答我的，但我的看法不同。我在长沙和它处为人讲解这首诗的时候，我是这样讲的：《答友人》所答的肯定是湖南的友人，甚至肯定是答长沙的友人，但所答的友人可能不止一人。由于毛主席在这几年（1961年以前的几年正是三面红旗提出后的几年）接到湖南（长沙）一些友人的信和诗，反映了湖南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工农业生产、文化教育的一片大好形势，主席感到高兴，感到满意。因此浮想联翩，写出这首《答友人》的绝妙好诗来。一方面对这些友人的回答，一方面是对湖南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表达出无限的关怀、无限的希望和真诚的祝愿。

二、自解放后，主席常在给我的信中嘱我寄诗。早些时候寄的不多。从1958年后，我差不多把所写的诗随时抄寄给主席，每每承他加以鼓励。这次另纸抄了好几首，那几年写的诗词也都是曾寄给主席请其审正的。

三、“红霞万朵百重衣”大概仍是就“帝子”的装饰来说的。上句“斑竹一枝千滴泪”。是用娥皇、女英闻舜死后攀竹哭泣，泪落竹上成斑的神话故事，说明过去湖南人民在反动统治下面的痛苦生活。所谓此中旦夕只是用眼泪洗面的生活。下句“红霞万朵百重衣”，说出今天的帝子（娥皇、女英）衣着百重美艳的衣服，说明湖南人民在解放后，到处是欣欣向荣的景象，到处焕发出灿烂的光辉。古人常以云形容衣服，楚辞上是屡见的，李白诗也有“云想衣裳”之句。

“我欲因之梦寥廓”，是从湖南的过去（斑竹一枝千滴泪）、现在（红霞万朵百重衣，洞庭波涌连天雪），而想到将来（芙蓉国里尽朝晖），这都是指上面所写的湖南的过去与现在几句。

此诗“斑竹”、“红霞”两句，可以把它比照《到韶山》“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两句。

由于我这几天仍是头痛神疲，勉强作复，可能很多错误，请你和你的同志们指出！

暂写这些，请谅草率！即祝
健好！

周世钊

1968年7月16日

附诗为：《七律·随从毛主席登岳麓山》（发表时定稿为七律·从毛主席登岳麓山至云麓宫）、《沁园春·到五美公社访徐老创办的五美学校》、《苏幕遮·橘子洲头》、《浪淘沙·访修业学校》、《踏莎行·秋日登爱晚亭，有怀往事》。

1986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选》，对《七律·答友人》作了明确的注释：“友人即周世钊。”换言之，“七律·答友人”即为“七律·答周世钊”。

我们认为，毛泽东写此诗时，可能就是答周世钊一人，也可能是答几个人的。如属后者，在定稿正式发表时，改为“答友人”，并明确表示为答周世钊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当然这也是允许的。1964年2月4日，毛泽东曾写过“友人，是一个长沙的老同学”，说明只是“一个”，而不是“一些”。总之，友人即周世钊是有依据的。

关于《七律·答友人》，还有一个背景材料。在大跃进期间，一次周世钊在北京会见毛泽东时，毛问他：

惇元兄，今年开会前到了什么地方参观视察？看了些什么东西？有什么感想？

周世钊回答说：到了我的老家湖南宁乡县去视察农村人民公社。通过这次到农村参观视察，看到了农村的大好形势，看到了三面红旗的威力，受到了一次根深刻的教育。不过有两个问题我看也值得研究。一个是粮食亩产的数字上我看有些虚假现象。有的说一亩田一次能产几千斤，有的甚至说一亩田一次能产万多斤，我看有点不实在，再一个是我们这次在一个公社吃了一个中餐，一桌一共上了68道菜。公社负责人对我们说，招待我们的菜没有花一个钱，都是公社自己主产的。不知道公社怎么能搞出那么多的菜来，很多菜我根本就没有吃，摆了一下就拿走了，我看浪费实在太太大，这种搞法要不得。

毛泽东说：现在不仅湖南的农村形势好，全国的农村形势都好。你还不错。你看出了问题。现在农村确实有一股华而不实的浮夸风。农村到处在放什么卫星，一亩田只有60平方丈宽，一次怎么能做到亩产几千斤、上万斤甚至几万斤。那是吹牛而已，实则办不到。这在事实上他们是瞎胡说，在科学技术上，他们是反科学。从科学技术的观点来说，也办不到，至少是目前办不到。你们是全国人大代表，是堂堂的国会议员啊，人大代表国会议员到了农村，他们不好好招待你们行啊！他们招待你们的目的，是要请你们到北京来跟他们说好话嘛！他们油了你的嘴巴，你吃了他们那么好的招待，你不仅不为他们说好话，倒还要讲他们的不是，还要到我这里来告他们的状子，我看他们会骂你的。不过我看你是个好人，你敢于说真话，你敢于和错误行为作斗争，可敬可佩啊！不与错误行为同流合污，敢于向错误思想行为作斗争，这是我们共产党人应有的品德。惇元兄，我看你真不错呀！他们招待你们的68道菜，都是从下面刮来的，所以就没有花一个钱嘛！他们招待你们68道菜所用的鸡鱼鸭肉，都是从各个生产队调来的，这不仅是你所说的浪费问题，而且是侵犯了群众的根本利益，群众对他们这种搞法是很不满意的。他们是名曰招待你们，实则是他们自己大吃大喝，这股平调风要不得，必须坚决纠正。

八 周世钊诗词赞韶山

1960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十一周年的大庆日子，周世钊来到毛泽东的故乡，湘潭县的韶山冲，参加了国庆节的活动，填了一首词《江城子·国庆日到韶山》：良辰嘉庆到韶山，赤旗边，彩灯悬。万朵红霞荡漾碧峰前。似水人流流不尽，腾语笑，久留连。夜来场上响丝絃，鼓填填，舞翩翩。革命斗争唱出好诗篇。唱到牺牲多壮志，人感奋，月婵娟。

1963年，周世钊又一次瞻仰韶山毛泽东旧居。他在韶山毛主席旧居陈列馆外宾留念册题词，词牌《水调歌头》：葵藿倾阳日，亿兆仰门墙。环球多少英杰，万里历梯航。瞻仰高峰千仞，雉诵鸿文四卷，胸臆忽开张。题咏陈歌颂，翰墨写衷肠。心中火，眼中路，手中枪。世界人民革命，于此得周行。激荡六洲云水，震耀九天雷电，越战越坚强。毛泽东思想，永远放光芒。

1965年，周世钊有词作《采桑子·韶山道中》：黄花白露迎佳节，霜叶摇风，星帜飘空，浩荡江天一片红。相逢共道韶山去，笑脸融融，俊想重重，无限风光在望中。

1969年12月28日，韶山铁路通车庆祝典礼在韶山举行，周世钊参加了这个盛典，遂赋词《沁园春·韶山铁路通车庆祝典礼纪盛》：时节非春，气象皆春，热热烘烘。更人流不断，潮奔沧海；凯歌迭奏，响彻晴空，锦簇星棋，声腾万岁，迎得车来快如风。齐欢汴，喜韶山铁路，此日新通。朝阳光焰彤彤，使七亿神州遍地红。看工农踊跃。同登大道；耄倪络绎，共仰灵峰（指韶峰）。万国衣冠，六洲豪杰，也历梯航竟向东。真堪庆，这交通红线，革命前锋。

韶山铁路通车的日子，原拟为毛泽东寿辰日——12月26日。因为毛泽东不同意，乃更改为12月28日。

1973年春，周世钊偕周礼、谢华两老在韶山宾馆参加毛主席旧居陈列馆改馆座谈会。参加座谈的多为陈列馆青年工作人员。当时，周世钊写了“圣地留人春骀荡，青年作伴气昂扬”的诗句。

1974年，病魔缠身的周世钊写下了词《沁园春·韶山颂》：嶽嶽韶峰，旭日东升。岁月堂堂。自青年发愤，恨深腐恶；中霄起舞，誓拯痍疮，身乏半文，心忧天下，唤醒工农共激扬。旋天手，要颠倒历史，新写篇章。运筹导引前航，使暴雨惊雷起四方。看星星火种，原燎九域，彤彤赤旗，彩唤重洋，局划三分，势孤两霸，大地沉浮仗主张。东风里，喜五洲四海，遍地晴光。

九 伟大的革命号角光辉的艺术典范

在1964年第7期的《湖南文学》上，周世钊发表了《伟大的革命号角光辉的艺术典范——读毛主席诗词十首的体会》一文（以下简称“号角”）。

《号角》所读的十首诗词系毛泽东在1964年元旦人民日报上所发表的诗词。周世钊在《号角》中认为：学习毛泽东诗词，要改造我们的思想。毛泽东的十首诗词和早已发表的二十七首诗词一样，既是伟大的革命史诗，又是伟大的革命号角。无产阶级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最坚决最彻底的革命精神，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战略思想和专门利人、毫不利己的崇高的共产主义风格，拧成了一根红线贯穿在这些伟大的作品中。

《号角》认为：早在革命初期，毛泽东就在《沁园春·长沙》一词中写出了“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句子。他把气焰熏天，骑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军阀、官僚和帝国主义，看成不值一钱的粪土，而把那些被铁蹄所践踏，被饥饿所搏噬的老百姓，穷书生看成能够起来掌握自己命运，担当大地主人的人物。

又如红军的江西反围剿时，无论从军队的数量上来说，或者从武器的质量上来说，都比敌人差得太远，但毛泽东总是相信有革命觉悟的工农群众，众志成城，壁垒森严，是不可战胜的天兵，所以既写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文章，又写出：“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的诗句。而对于反动派的百万大军，则藐视他们，比之为枯木，比之为朽株，认为是可以席卷横扫的乌合之众。

十首诗词的写作时期不同，描述的斗争也不一样，但所表现的革命精神、革命感情、革命思想则和过去各个时期作品中所表现的一样坚决，一样真挚，一样强烈、深远。周世钊认为可以从三方面加以摸索。

一、十首诗词中有好几首是就反对各国反动派写的，都充分表现作者坚持真理、敢于革命的大无畏精神，大有“天塌下来擎得起”的雄伟气概。他把气大如牛，不可一世的反动派写成碰壁的苍蝇，缘槐的蚂蚁，披着人皮的妖精和经不起风吹的冬云，见不得太阳的白雪。认为他们目前的猖狂妄行，不过是一时的短暂的现象，只要把他们的画皮撕破，纸面戳穿，就会丑态毕呈，千夫共指，终于会象冰雪一样消融，苍蝇一样冻死。而坚持真理的伟大革命战士，则象暮色苍茫，乱云飞渡中的劲松，象风雪漫天、坚冰百丈中的梅花，纵然革命形势一时逆转，出现乌云乱翻，逆流高涨的局面，也始终是屹立不摇，岿然不动。……。主席在“无限风光在险峰”一句中指出了颠扑不破的真理：一切革命的道路都是不平坦的，必须不断和艰难险阻相搏斗，必须不断在崎岖曲折的路途中斩棘披荆地奋勇向前，有时还要积年累月搞持久战；经过一个又一个的斗争，克服一个又一个的困难，然后才有可能爬上胜利的高峰，得到成功的快慰，然后才有可能在扫除一切害人虫之后进入到“玉宇澄清”，“山花烂漫”的美好境界。所以一切逆流之来，乌云之起，对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来说，是很好的锻炼和考验，不但不会动摇他的战斗意志，反而使他更加坚强，更加奋发，更加提高他的斗争艺术和策略，而促其逐渐达到成功。“梅花欢喜漫天雪”正是这种精神的写照。

二、一个无产阶级的伟大革命家，不但要有远大的革命理想，坚定的革命精神，还要有正确而灵活的战略战术。……。在《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一诗中，写出“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响亮句子。作者在这

里既不相信“穷寇勿追”的孙子兵法，更反对效法那沽仁义的虚名、贻纵敌自伤的西楚霸王，为的是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为的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不可中途停顿，为的是社会发展规律也不能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而必须对残余的穷寇乘胜追击，不使它有死灰复燃的希望。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认为只有争取主动、争取时间，才可以灭敌人的威风，长自己的志气。在和郭沫若同志的七律一诗中又批判了一些人在对敌斗争中不分敌友的糊涂思想，认为化为善男信女的妖精，容易使人受骗而遭到它的毒害，比起那些青面獠牙的妖魔更为危险，更为可怕。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必须大力把它驱除。“妖为鬼蜮必成灾”，就是大喝一声，提醒大家注意，不要忘记了主要敌人。至于受骗的唐僧，不过由于愚昧，由于警惕性不高，他的本质并不坏，仍是应该争取教育的对象。“千刀当剐唐僧肉”的说法，显然不妥。主席指出“僧是愚氓犹可训”，是教人民在对敌斗争中善于运用统一战线的政策。善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孤立主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才可以取得斗争的胜利。

三、在文艺作品中，歌颂谁，暴露谁，是态度问题，也是立场问题。

十首诗词中有歌颂革命斗争中的英雄人物的，如“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有歌颂生产战线上的英雄人物的，如“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有歌颂新中国妇女精神面貌的，如“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歌颂革命战争的胜利，则有“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歌颂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好形势的，则有“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还有“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

《号角》还认为：学习毛泽东诗词，促进革命文艺更好地歌颂我们伟大的时代。文艺如何反映我国人民伟大的革命斗争，歌颂社会主义伟大时代，毛主席诗词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毛诗的第一个特点是：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

试以《到韶山》一首七律为例，在以五十六个字写成的格律严谨的律诗里面用高度的艺术概括手法写出了32年的革命斗争史。旧社会农民被剥削、被压迫、被屠杀的种种惨痛，用一“咒”字反映出来，人民公社化后的农村新面貌又用一“喜”字作概括的勾画。前后对比，爱憎鲜明。诗中只用“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两句，写出了不怕牺牲，前仆后继，为革命事业献身的英雄形象；我们看到早几年传抄出来的这诗的末句是：“人物风流胜昔年”。主席经过几回修改才定为“遍地英雄下夕烟”。从这里可以看到主席对于写作的态度是十分严肃认真的。我认为末句改得恰好，这洋才把新农村中劳动人民可爱的精神面貌表现得很具体、很生动、很鲜明。

毛诗的第二个特点是：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的结合。

大概在某一段时间里，毛主席接到湖南一些友人的书信和诗词，这些书信和诗词反映了湖南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某些辉煌的成就和某些突出的表现，感到衷心的喜悦，因而“浮想联翩”，想到湖南人民的过去，想到湖南人民的现在，更想到湖南人民的将来，因而借题发挥，写成《答友人》这首热情歌颂湖南人民美好的现在和祝愿湖南人民光明的前途的诗篇。前四句借虞舜和娥皇、女英的美丽传说，写出湖南无数善良的人民和无数英勇的革命志士在反动统治者的长期压迫、剥削和残酷屠杀下面的悲愁惨痛，是数不尽、说不完的。“斑竹一枝千滴泪”一句，就真实地形象地反映了在过去黑暗的时代、恐怖时代，湖南人民所过的生活是以眼泪洗面的

生活。而从 1949 年湖南得到解放以后，湖南人民在党的正确领导下，经过民主改革时期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湖南人民的生活改善了，精神面貌也起了巨大的变化，到处是歌声，到处是笑脸。“红霞万朵百重衣”，又真实地形象地反映了这个新的美好的时代，湖南人民的生活是丰富多采的、快乐自由的生活。这诗的下四句是对湖南人民现实斗争的反映，也是对湖南人民光明前途的祝愿。“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两句，不是单纯写景，单纯叙事，而是写湖南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决心大，热气高，斗志昂扬，意气奋发，干劲冲天，歌声动地。这就正确地反映了今天，“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两句，既写了湖南人民的过去，又写了湖南人民的现在，就很自然要设想到湖南人民的将来。湖南人民的将来会怎么样呢？在党的英明领导下，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一定会出现万紫千红的景象，一定要走到繁荣康乐的境界，象芙蓉的美丽，旭日的光辉。这就热情地展望到了明天。在全诗中，把反映实际生活与表达作者革命理想和愿望交织在一起。

毛诗的第三个特点是：批判地继承、大胆地革新，成为推陈出新、古为今用的光辉典范。

毛主席从青少年时期起就爱读优秀的古典诗词，特别对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苏轼、辛弃疾、陆游诸家的作品用功尤深，熟悉古典诗词的形式、格律和写作技巧。他创作的诗词，基本上采用了古典诗词的形式和它的格律，但为了更好地更自然地表达他的思想、感情，就不完全按照旧框框办事，而作出一些改革。如《蝶恋花·赠李淑一》一词，按照词律，上下两阕同韵，但毛主席却于下阕换了另一个韵；《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本是用的阳韵，但第二句押了江韵，这种采取古典诗词格律、形式，而又不死守古典诗词格律、形式，在有必要的时候就突破旧框框的做法，也是毛主席对古典诗词又继承又革新的一个方面。

毛主席的诗词采用了不少的历史事实和神话、小说里的故事，在十首诗词中也是屡见不鲜的。如：“虎踞龙盘”、“霸王”、“陶令”、“桃花源”、“帝子”、“斑竹”、“小金猴”、“蚂蚁缘槐”、“蚍蜉撼树”、“飞鸣镝”等。这些在社会上流传已久，为知识分子和一部分群众所熟知的东西，用在作品里有很多作用：一可以使作品的意义更为鲜明，二可帮助作品语言的形象化，三可以增加作品的感染力量。同时，毛主席还借用和化用古人的诗句，却把它赋予与古人完全不同的新意。如借用李贺的“天若有情天亦老”，以说明社会发展规律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以促进社会的彻底改造；化用贾岛的“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以说明反动派在猖狂向我们进攻，想实现他们的阴谋目的。

古来的很多诗人感情每每局限于个人的遭遇上面，他们见落叶就感到飘零，对黄昏就想到迟暮，看到春花开放也会发出好景不常的感叹。在他们的笔下，山也愁，水也愁，风花雪月都是愁的象征，这自然是他们人生观的反映。毛主席的写作中也常常写到自然景物，但在他的笔下，山河是壮丽的，花草是鲜艳的，树木是坚劲的，风雷是雄健有力的，断没有丝毫凄凉、暗淡、衰落、愁烦的色彩和情调。出现在十首诗词中的山、川、日、月、风、雷、雨、雪、草、树、烟、花似乎都在战斗，都在歌唱，都是有着无限的生命力和坚强的革命性的东西，这是古典诗词中运用自然景物表现作者思想感情的一大革命，也是必不可少的革命。

十 兄可以意为之

毛泽东在同一个月给同一个人写两次信是不多的，因为他实在太忙了。可是毛泽东在 1956 年 12 月 5 日给周世钊寄了《水调歌头·长江》的词作后，又在 1956 年的 12 月 29 日致函周世钊谈，全信如下：

东园兄：

信及诗收读，甚快。我尚好。某先生楚辞，甚想一读。请你代候蒋竹如兄。又请你代候曹子谷先生，谢谢他赠诗及赠南岳志。顺祝平安

毛泽东
12月29日

1963 年 3 月，毛泽东致函周世钊。全文如下：

惇元兄：

去年及今年惠寄数函并附诗词，都已收到，极为高兴。因忙迟复，尚祈鉴谅。为学校题字，时间已过，可以免了吧。你到京时，我适外出，未能晤面，深致歉怀。嗣后如有所见，或有诗作，尚望随时见示为盼！老校长张干（忘其别甫，是否叫作次苍？）先生，寄我两信，尚未奉复。他叫我设法助其女儿返湘工作，以便侍养。此事我正在办，未知能办得到否？如办不到，可否另想办法，请你暇时找张先生一叙，看其生活上是否有困难，是否需要协助。叙谈结果，见告为荷。蒋什如兄处，亦乞见时代为致意。他给我的信都已收到了。

顺问
安吉

毛泽东
1963年3月24日

毛泽东在信中说：“去年及今年惠寄数函并附诗词，都已收到，极为高兴。”又说：“嗣后如有所见，或有诗作，尚望随时见示为盼！”可见毛泽东对周世钊的诗是赞赏的。

1964 年 1 月 31 日，毛泽东致函周世钊。全文如下：

惇元兄：

两次惠书及大作两首，另附余同学信，均已收到。寄上 2000 元，请分致 1500 元赠李先生作医药费，500 给余同学。拙作解释，不尽相同，兄可以意为之，俟见商时详谈可也。

敬祝平安

毛泽东
1964年1月31日

《毛主席诗词》于 1963 年 12 月问世后，注释者众多，各有说法，周世钊为此写了两函，并寄两诗给毛泽东。毛复信给周谓：“拙作解释，不尽相

同，兄可以意为之，俟见面时详谈可也。”毛泽东叫周世钊可以意为之。据周世钊说：以后见面时谈了毛泽东诗词的解释问题，毛说以周世钊的解释为准。这封1964年1月31日的信也可能是促使毛于1964年2月4日自注诗词的因素之一。

1966年1月29日，毛泽东致函周世钊。全文如下：

东园兄：

故接惠书及所附大作诗词数十首，均已收读，极为高兴。因忙，主要是懒，未及早复，抱歉之至。看来你的兴趣尚浓。我已衰落得多了，如之何，如之何？

谨复。顺颂

安吉！

毛泽东

1966年1月29日

承毛泽东的高兴，周世钊给毛寄了诗词数十首。

1968年，“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烧遍整个中国。广大的工农商学兵，对毛泽东诗词作了各种注释讲解，非正式出版物极多，有的比较严谨，有的甚不严肃，错误累累，理解也甚不一致。毛泽东在1965年：月曾面告周世钊，有人在为他的诗词作注释。现在，周世钊读到这么些各种各样的注释本，出于对毛泽东的爱护，于是致函毛泽东，请问应作何处理，那些注释本是比较好？毛泽东在1968年9月29日复函周世钊。全文如下：

惇元兄：

此信今天收读，甚慰。前两信都未见，可惜。拙作诗词，无甚意义，不必置理。我不同意个人作纪念，请告附小。对联更拙劣，不可用。就此奉复，顺祝康好！

毛泽东

9月29日

毛泽东和周世钊通信五六十年，数量甚多，一般都能如期收到，可是两次例外，一次是1945年周世钊写到重庆给毛泽东的信未收到，另一次就是1968年周世钊寄到北京给毛泽东的信未见，以致毛泽东都表示可惜。

此次毛信中所说的“拙作诗词，无甚意义，不必置理。”数语，足见毛泽东的胸怀博大，谦虚。同时，毛信中所说的“对联更拙劣”一语，系指在半个世纪前的一师附小的大礼堂中有一副对联：“世界是我们的，做事要大家来。”对联原为毛泽东手书，由学生们刻在竹子上。1968年，有人建议再写刻上，谁料毛泽东却表示不愿意为个人作纪念。遂此作罢。周在信中还告诉毛：一师附小已恢复毛当年任主事时的原貌。

此信中还附有中央信访处的函。全文如下：

周世钊同志：

你9月25日寄给伟大领袖毛主席一信，我们9月29日送给毛主席看过了，毛主席在你的信笺上给你写了复信，现将复信原文另纸抄给你，请收。

此复，并致
敬礼！

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信访处
1968年10月8日

此信通信的日程是：周世钊子9月25日由长沙发信，毛泽东在9月29日在北京收信并作复，中央信访处于10月8日发出复信。

十一 讲解毛泽东诗词

1971年11月27日，周世钊应长沙市教学辅导站的邀请，在全市中学语文教师学习毛主席诗词大会上作了报告。报告内容直至1974年8月才铅印出来。内容摘要如下：

一、从政治的内容学习毛泽东诗词。毛泽东已发表的三十七首诗词，都是就每一个革命阶段的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特点和形势写出的，都是拨正革命航向，号召群众奋勇前进的。例如，《沁园春·长沙》作于1925年，下阕从追忆过去的一些同学少年，象蔡和森、罗学瓚、何叔衡、陈昌等都是怀着革命的豪情壮志，天不怕，地不怕，把军阀官僚和帝国主义看成一钱不值的粪土。在这里写出作者要团结这样的真正的革命同志，掀起革命高潮。最后用“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词句来表达这种意思。毛主席当时还写了“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诗句，也正申述了这种伟大的抱负。……。

二、从写作的特点学习毛泽东诗词。毛主席诗词是完美的艺术形式的光辉典范，至少有三个写作特点：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结合；对于古代的诗词，批判地继承，大胆地革新，成为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光辉典范。

周世钊得到了“兄可以意为之”的“最高指示”后，他经常宣传、讲解毛泽东诗词。1975年第2期的《语文战线》上，周世钊发表了《学好毛主席诗词教好毛主席诗词》一文。

十二 戏改古诗画林彪

1972年10月2日，毛泽东即将进入80大寿，周世钊也早已年逾古稀，两位老人在中南海畅谈，也是他们最后一次面谈，谈话继续三个小时。其中谈到两首古诗，兹记述于下。

谈到林彪问题时，毛、周都极度愤慨。毛泽东念了一首古诗。诗为：

豫章西望彩云间，九派长江九叠山。
高卧不须窥石镜，秋风愁在侍臣颜。

念罢，毛泽东接着说，如将“侍臣”改为“叛徒”，将此诗送给林彪是最恰当不过的。

这也是对林彪的画像。

据说，诗中的“豫章”指的是江西。“彩云间”，这是指黄昏时候的云彩。而“九派长江九叠山”，是说长江是我国第一大江，由九条大支流汇成。

毛泽东谈兴正浓时，又念了一段杜甫的诗：

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
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

念罢，毛泽东又说：“明妃”指的是林彪。

周世钊在那几天的日记中记载着：9月28日，改写上主席的信，9月30日，晚7时半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宴（18席）。10月2日，晚9时王海容乘车来饭店邀同往中南海谒见主席，12时才辞出，参加谈话还有汪东兴和唐闻生同志。主席戏改两诗。

戏改的两诗如上所述。

我们查证，杜甫的诗为《咏怀古迹五首之一》，全诗为：

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
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
画图省识春风面，孤佩空归月夜魂。
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

第八章 饮水思源

对于湖南第一师范，毛泽东与周世钊都有着深厚的感情，常常饮水思源。解放后，毛常给一师指示，使一师能沿着正规的普通师范的轨道不断前进，为祖国培育大量人民教师。周自解放前夕担任一师代理校长以来，以后一直任校长至 1976 年逝世，为一师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校长，对一师的发展和国家的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

他们两人对一师的师友也有过许多关怀和援助。

一 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

1950年10月某日，毛泽东约王季范和周世钊到中南海吃饭。饭后，毛泽东、周世钊等坐在休息室里谈话。周世钊说：“主席晏睡的习惯是不是对健康有妨害，是否可以考虑改变？”毛泽东说：“这种习惯养成已久了，不是我喜欢晏睡，是形势所驱，事实所迫，不得不如此的。当时抗日战争在华北各地展开，战场很多，每个战场上汇报请示的电告多在晚上到达延安总部。这些报告，有的要求指示进退的，有要补给武器物质的。当时，我们的物质条件差，我们接着这些电报，不能把它们搁置到明天，必须即刻研究回答，有的要找人商量，有的要开会讨论，将商量讨论的结果以电报回答，常常要到天亮才能完成这些工作，所以我们索性通夜工作，天亮以后才收拾睡觉。到北京以后，情况虽有改变，但党中央和国务院一些重要文件要审批的也多是下午送来，只好在晚上把它们办了，晏睡的习惯仍没有多的改变，事实需要，不得不如此。”

“您通夜工作，但要找人商量，找人开会，别人怎么办？”周世钊问。

“他们也只好不睡。象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都成了夜里不睡的同志。”毛泽东回答。

“一些工作人员呢？”周世钊又问。

“那好办，他们轮班服务。”毛泽东又答。

周世钊和王季范告别前，毛泽东对周世钊说，“你要我对一师师生提出一点希望，你为我写一个草稿何如？”周世钊考虑一会后说：“我写不好，但您这样吩咐了，只好试试看。”

这就是毛泽东嘱周世钊代拟为一师的题词草稿。

1950年12月29日，毛泽东致函周世钊，全文如下：

惇元兄：

嘱写的字 给你写了，不知可用否？

临行一信，长沙一言，都收到，很感谢！所说各事都同意，可以做（有些是要逐步地做）。师范教育会议，待与马先生一谈，大略是可以的罢。

晏睡的毛病正在改。实行了半个月，按照太阳办事，不按月亮办事了。但近日又翻过来，新年后当再改正。多休息和注意吃东西，也正在做。总之如你所论，将这看作大事，不看作小事，就有希望改正了。

祝您及您的同事们工作顺利，新年快乐。

毛泽东 12月29日

关于毛泽东的通夜工作问题，除了1950年10月的那次谈话和1950年12月的这封信以外，在60年代的一次谈话中，周世钊又从关心他的身体出发，再次建议毛泽东改变这种生活和工作习惯，但毛泽东仍坚持己见，同时还对周世钊谈了他的婚变。

指毛泽东应周世钊为要求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书写的校牌“第一师范”和题词“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题词为周世钊草拟，毛泽东书写。

相马叙伦。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部长。

二 50万元与500万元

庄周曾经指出，君子之交淡若水。我国古代也以温、良、恭、俭、让来形容君子。

毛泽东是伟大的革命家。他的著名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这是他在1927年3月写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一段话。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他似乎并不那么赞赏温良恭俭让。

周世钊虽然没有写过什么温良恭俭让的文章，可是我们从他一生的言行来剖析，他是遵奉温良恭俭让的。解放初期，他工资微薄，家庭人口多，经济极为困难，而他没有向毛泽东张过口，伸过手。毛泽东主动给周一些关怀，他也愧受不辞。

君子之交淡若水。毛泽东与周世钊间的经济关系是十分清楚的，不但淡若水，而且清澈如泉水，可以见底的。这样，毛对周完全信任，毛的一些经济援助、友谊往来，由周世钊负责。从而，使得庄周的君子之交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深一层的含意了。

1919年“五四”前后，毛泽东受周世钊之邀，住入修业小学，在那里任教历史和编办《湘江评论》。修业小学给毛的工资只有每月几元，仅能饱饭。当时，毛的行李也只有旧蚊帐、旧套被、旧竹蓆和几本兼作枕头用的书。他身上的灰布长衣和白布裤，穿得很破旧。朋友们想借钱给他添置点必要的衣物。而毛泽东却想，大家的生活都不宽裕，于是均被他谢却。毛长期过着节俭的生活，也深知经济的重要性，崇尚节俭。

31年后的1950年10月，周世钊受毛泽东之邀北上京华，幸福地会见了毛。毛看到周一身破旧，想必是经济拮据。1950年10月8日，毛派秘书到周寓居的北京饭店，给周赠送50万元（旧币，合现在的50元），说是作为游览时购门票用。

1950年10月10日，江青奉毛泽东之命，带领服装工人来到周世钊下榻的北京饭店，为周世钊和王季范量衣服尺码，添置了几身新衣服。同时，毛还赠送给周棉被、蚊帐、脸盆、毛巾、牙刷、牙膏、文具（甚至包括铅笔）等等，合计按价值500万元（旧币，合现在的500元）赠送。周世钊愉快地接受了这些馈赠，并把它们使用到最必需的地方。

但是，对于与毛泽东的接触和赠予，许多人都把它神化了。

50年代时，某大学的一位教授，被评为全国劳模，到北京参加会议曾和毛泽东握过手。他回到学校作报告时，学校的师生员工上台和他一一握手，因为这些人握被毛主席握过手的手了。

对于毛泽东的赠予，那更是像对毛泽东本人的神化一样把其所赠之物也神化了。60年代。空政文工团的演员们到中南海春藕斋伴舞。在一年的春节，茶几上摆一些糖果，毛泽东抓点糖给她们，她们从没舍得吃一块，都是小心翼翼地带回去给家里的亲人和同志们。那些人也舍不得吃，宝贝似地保存起来——糖也被神化了。

“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泽东曾向工宣队、军宣队赠了几个芒果。于是全国各地都去北京迎接芒果，迎回来的是芒果复制品。迎送的闹剧是十分排场的，兴师动众，敲锣打鼓，鞭炮齐鸣，在倾盆大雨的道路上高唱语录歌。更有意思的是“走资派”、“牛鬼蛇神”不得参与任何与芒果有关的活动，

作为对他们的一种惩罚。

毛泽东给周世钊赠送衣物、文具、书籍、水果等等多起。对于这些赠物，周是能吃就吃，能用就用，并不那么神化。而对于毛泽东的各件来函，则封封珍藏，视为家珍，作为友好的纪念。

解放后，毛泽东给周世钊的第一封信，即 1949 年 10 月 15 日的信，周收到后为陈泽同所借。以后陈还给周的却是一份描写稿。并称原稿辗转丢失。从 1949 年到 1976 年周逝世止，周追查了 27 年，始终未能再见原稿。毛、周逝世 7 年后的 1983 年，编《毛泽东书信选集》时也是用的描写稿。直到 1985 年，才发现原稿珍藏于第一师范。认真核对后，发现描写稿与原稿字义无误，只有笔迹稍异。

三 徐特立的信

1950年11月6日，徐特立致函周世钊，阐述了毛泽东作风。信的全文如下：〔32〕

敦元校长足下：

嘱为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题一有关校风的短语，特立对于师范教育没有突出见解，而教育政策已由政协纲领第九章明确的规定，但把政策变为现实就必须有正确的思想和作风，就学校说来就是校风。“实事求是”、“不自以为是”是我们领袖毛泽东同志的作风，由他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自1935年以来，就成为我们全党的党风。这种作风是对学习对工作对领导者和被领导者，对一切人一切事业都是需要的，它不是高深难了解的理论，也不是艰巨难做到的工作，是一句极平常极老实的口号，但它的本质是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没有他，一切革命、一切建设、一切工作和学习，都会有偏差，都会有走上歪风的危险。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曾经培养了不少的革命人物，同时也有反动的人物，即正风和歪风并存，结果正风终占了上风。新民学会的领袖人物是今天人民共和国创造的领导人物——毛泽东。他在学生时代之学习目的是改造中国，此外无他目的，结果他的学习胜利了，成为一个彻底了解中国历史任务的中国通。毛泽东同志的作风是老老实实的作风，是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特立希望第一师范以毛主席的作风——实事求是不自以为是——作为校风。

特立

11月6日

这封信是徐特立于1950年11月6日写的。写信的起因则是1950年10月5日晚，周世钊幸福地会见毛泽东，并叫来徐特立等人，毛对徐说，叫他也写点关于一师的文字给周而写的。此信曾发表在周世钊著的《我们的师表》一书中。该书于1958年由北京出版社出版。

四 共建母校

1952年10月，第一师范扩建委员会在北京开会期间，周世钊与李达同去中南海，谈及师范教育问题，毛泽东作了一些指示，并留他们共进晚餐。

1952、1953年两年，中拨款400亿元（相当于现今的400万元），给毛泽东、周世钊的母校——湖南第一师范作扩建费用。

1953年，中央派了教师充实学校。

解放后，毛泽东给一师的书面和口头指示达十次之多。当时有人提出要改名为湖南第一师范大学，毛泽东不同意改变其普师性质，遂作罢。

1955年5月1日，毛泽东致函周世钊，信封上写的是“湖南第一师范周惇元校长毛寄”。全信如下：

惇元兄：

三月惠书收读，甚谢！学校部署很好。规模和经费均不要同他处立异，但在教学内容方面多做工作，这就是我所希望的。我情形如去年那样，游水颇有好处。

顺颂

教安

毛泽东

1955年5月1日

在1967年12月一师校庆的日子里，周世钊著有词作《满江红·湖南第一师范五十五周年校庆》：旭日晨霞，正照映门墙生色。红旗下，高歌猛进，少年英杰。复课首开新气象（1967年一师是长沙复课闹革命最早的学校），良辰欢庆双佳节。喜今朝，荡漾妙高峰，光和热。爱红日，心如结；跟舵手，情同切。继光荣传统，共争朝夕。四卷鸿文尊典范，五条宝训铭胸隔。做坚强革命接班人，承洪业。

周世钊对湖南第一师范具有深挚的感情。在1983年第一师范80周年校庆时，校史展览馆展出了周世钊各个时期的照片，并说周世钊是一师历史上任期最长的一应校长，为一师的建设作出了贡献。

第一师范是培养了毛泽东、周世钊和蔡和森、何叔衡、李维汉等人的一所学校。它从1903年创建，历经多次停办、合并、更改校名和复建搬迁。1938年，该校毁于“长沙大火”，学校由长沙妙高峰迁至长沙教育会坪。抗战期间，一师辗转于湘乡西阳、安化桥头河等地办学。1946年，一师由安化桥头河搬至长沙市岳麓山左家地。1954年，学校从左家垅搬回妙高峰原址。

1967年，李富春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正式批准第一师范按建校初期的原貌复建。周世钊曾为此向毛泽东作过专门陈述，毛泽东表示同意。湖南省主要领导自始至终组织和领导复建工作。工程以高速度高质量于1969年初全部完成。建筑面积达21241平方米，其中陈列馆建筑面积6803平方米，郭沫若题了馆名：“毛泽东同志青年时期革命活动陈列馆”。同年10月1日，第一师范正式对外开放。周世钊为学校复建日夜操劳，付出了艰辛的劳动。1968年，校史陈列馆落成时，当时的陈列内容主要是毛泽东在校时期的革命活动。周世钊回忆旧情，又有同作《沁园春·湖南第一师范校史陈列室》：舍馆重修，校史新陈，辉映南城。喜模型制就，宫墙面貌；画图绘出，领袖精神。

冻井朝淋，风亭露宿，百炼成钢气绝伦。西斋里，正点圈万卷，殊墨纷纶。
少年忧国忧民，为革命驰驱不顾身。任芒鞋踏破，农村问苦；孤灯挑尽，工
校谈心。海国传书，春山结社，都是嚶嚶求友声，雄图远，看星星火种，燃
遍寰瀛。

当时，为了庆祝一师校庆，根据广大师生的要求，由周世钊报告毛泽东，
建议以 12 月 26 日为校庆日。毛明确表示，不同意以 12 月 26 日为校庆。所
以，当时决定以 12 月 28 日为第一师范校庆。

五 毛泽东慷慨解囊

毛泽东与周世钊有许多经济交往，简记几件如下：

1963年5月，毛泽东致函周世钊。全文如下：

惇元兄：

信收到，甚谢！复信一封，人民币二千，请转致张次 先生为盼！
祝好！

毛泽东

1963年5月26日

同天，毛泽东另函张干，全文如下：

次 先生左右：

商次惠书，均已收读，甚为感谢。尊恙情况，周惇元兄业已见告，极为怀念。寄上薄物若干，以为医药之助，尚望收纳为幸。
敬颂早日康复。

毛泽东

1963年5月26日

就是这位在第一师范时期被毛泽东赶下台的张干校长，在全国解放后，看见伟大的祖国解放了，他要求到京看望毛泽东。经过徐特立、谢觉哉诸老的引荐，毛泽东允许接见。可是有人持异议，认为不见为好。毛却分析说：“我看这个人还不是很坏，因为他能说会道，有一定的办事能力。在国民党时期，如果他去‘蝇营狗苟’，也许能捞到一官半职，但他没有这样，还是个穷教师，可见他还不是坏人。”后来，毛泽东终于接见了，并赠给两千元，解救他的生活困难。钱是交给几位老同学替他代管的〔33〕。

张干从北京回湘后，感激得逢人便说道：“毛主席的伟大真是‘天高地厚’、‘胞与为杯’，此生此世，不知如何报答他啊！”毛泽东就是这样胸襟开阔，不念旧恶地宽厚待人。

对这位在动荡的历史岁月中尚能保持政治清洁的煎辈校长张干，毛泽东不计前嫌，也像对待其他师长一样尊重，常从各方面给予资助。1963年，张干病重时，毛还写信慰问，并寄钱给张作医药费。钱款是通过周世钊给的。

1963年12月，毛泽东又致函周世钊。全文为：

惇元兄：

看了田仁尊兄的信，表示生活极为困难，似有求助之意。送上五百元，请予转交田仁尊兄为盼。
祝好！

毛泽东

1963年12月13日

如有其他穷师友，因生活困难，日子难过的事，

请告我，应即援助，都由你经手。

这是一种社会主义援助性质。又及。

这种社会主义性质的援助，毛泽东慷慨解囊，而且明确“都由周世钊经手”。田仁尊系毛泽东、周世钊在一师时的同班同学。

在一师教过毛泽东、周世钊几年国文的袁仲谦先生，教历史的罗元鲲先生等都曾得到毛泽东的援助。1950年10月11日，毛泽东致函当时任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的王首道说：“张次、罗元鲲两先生，湖南教育界老人、现年均七十多岁，一生教书未作坏事，我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张为校长，罗为历史教员。现闻两先生家口甚多，生活极苦，拟请湖南省政府每月每人酌给津贴米若干，借资养老。又据罗元鲲先生来函说：“曾任我的国文教员之袁仲谦先生已死，其妻七十岁饿饭等，亦请省府酌予接济。以上张、罗、戴三人事，请予酌办见复，并请派人向张、罗二先生予以慰问。”

1951年，毛泽东曾把袁仲谦之妻戴女士接去北京参加五一观礼。后来多次托人转赠钱钞，包括托周世钊转交的。袁妻去世时，又赠以安葬费。1952年，毛还亲笔为袁吉六（仲谦）先生题写墓碑。为此，王季范先生曾有“一字千金何处报，其妻老病维粮时”等诗句，赞美毛泽东的高尚情谊。

在本书第七章中所录的毛泽东于1964年1月31日致周世钊的信中，毛说：“两次惠书及大作两首，另附余同学信，均已收到。寄上2000元，请分致1500元赠李先生作医药费，500给余同学。”这是又一次委托周世钊承办经济事务。其他还有当面交给一些钱款，委托周经办援助。

1965年1月，毛泽东致函周世钊。全信如下：

博元兄：

寄上3000元，请你酌处。他们而入或者不要送得太多，或者要送此数。如果不要送得太多，剩下来的即存你处，有人要，由你酌送。

敬礼

毛泽东

1965年1月12日

这封信中，不只是请周世钊经办了，而且要送多少也由周决定，毛对周处于完全信赖的程序。

对周世钊完全信赖的毛泽东，曾有很多次交钱给周。周没有辜负毛的重托。周把所有钱款存入长沙的银行，其中有一个存折的存户姓名为“毛谊”。毛谊存折经常对穷师友的生活困难负责援助。周世钊在世时，他把每笔进出款项都用毛笔记得清清楚楚。他还说：“毛谊，即毛泽东的友谊。”周逝世后不几日，在北京生病的一师同班同学邹蕴真来函请助，周的亲属还立即给邹汇寄一笔余款。

六 振兴教育的呼吁

周世钊的一生，从童年上学始，到晚年离开教务止，和课堂、教鞭、粉笔有 70 余年的关系。他是一位懂得教育、热爱教育、为振兴中华教育作出贡献的人民教育家。毛泽东是一位革命家，他对教育也十分关心，曾经提出“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口号。

远在 1921 年 1 月 2 日，新民学会在长沙召开会议，讨论“达到目的须采用什么方法？”的问题。会上，何叔衡、毛泽东等均赞成过激主义，而周世钊坦率陈言道：“惟于过激主义不无怀疑，束缚自由，非人性所堪。宜从教育入手，逐渐进步，步步革新。”这可能是教育家周世钊对振兴教育的第一次呼吁。

40 多年以后的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中国大地上进行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大中小学等各类学校停课闹革命。这种状态，周世钊是不能理解的。他在 1967 年写的《满江红·湖南第一师范五十五周年校庆》一词中，写出了“复课首开新气象”的诗句。1967 年，一师是长沙复课闹革命最早的学校。周世钊赞扬“复课闹革命”，而不赞成“停课闹革命”。

后来，毛泽东曾发出最新最高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指的主要是理工科大学。可是，周世钊对这条最新指示也不理解。本书第九章所记的那封周世钊的信——优国愤世书信中，周却痛言，“窃以为理工科大学要特别重视提高教学质量，以期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世界水平。同时还应恢复科技大学，适当延长其学习年限，以期提高其学生的造诣。文科大学中是否可指定几个有条件的设置历史研究所（或单独设立），招收大学毕业主中的文史学习比较有基础的入学，用适当长点的时间，研读古今文史名著。”这就是说，大学不但要办理工科，而且要办文科。不但要办大学，而且要招研究生。

教育家周世钊呼吁振兴教育的事，楚图南在 1986 年的《人民日报》上著文怀念胡愈之时写得特别清楚。文章写了周世钊向毛泽东派来的人痛切晋言的事。楚图南写道 [34]：

“文革期间，由于对外文委已被军管，我（即楚图南）被迫靠边站，并隔离审查，最后下放到干校。但是在困境中，我始终得到愈之同志的关怀和帮助。即使在我失去行动自由时，愈之同志也总是要设法找到我的老伴，关切地询问情况，和给予我种种忠告。当我的处境稍有好转后，愈之同志和我又经常互相走访，交换各种看法与意见。特别在‘文革’的混乱时刻，愈之同志忧心忡忡地约同杨东莼同志和周世钊同志上书毛主席要求见面。毛主席派人接见了三位同志。整整两个半天，他们都很诚挚地、也是很沉痛地，对当时全国带有关键性的重大问题作了病切的晋言。愈之同志说的是发扬民主、广开言路，杨东莼同志说的是青年问题，周世钊同志说的是教育问题。据说这些问题都彼详细记录下来，并上报了，但却无结果，并且得到相反的反应。”

周世钊向毛泽东所派的代表申述的仍是教育问题。三句下离本行。可惜得到相反的反应。

第九章 黄昏十年

唐代李商隐有诗《五言·登乐游原》：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人们的晚年，各不相同。毛泽东与周世钊的晚年都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浪中度过的。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的，刮起了一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大风暴，所谓狂飚为我从天落，提倡人人都要斗私批修，从而荡涤神州。实际上却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乱”。正如 1966 年 7 月 6 日毛泽东写给江青的信中所说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

年逾古稀的毛泽东，随着自己掀起的社会风浪，时而浪尖，时而浪谷，红卫兵的狂热，万寿无疆的歌声，接班人林彪的背叛，四人帮的胡作非为，……。在这样的风浪中游泳比他畅游长江要困难得多。他的黄昏十年，禁不住极度欢乐与痛苦的冲击，终于在文化大革命即将结束的前夕，停止了呼吸。也可能因为他的逝世，才终止了这场大“乱”！

年逾古稀的周世钊，随着友人掀起的社会风浪，时而浪尖，时而浪谷，五一节与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座谈，荣任四届人大常委，红卫兵抄了他的家，国事家忧，……。在这样的风浪中不自觉地沉浮，与他的素质格格不入。他的黄昏十年，禁不住高度欢乐与痛苦的冲击，终于在文化大革命行将结束的前夕，停止了呼吸。也可能因为他比毛泽东早逝世 140 天，才使他免受了更大的痛苦——毛泽东逝世的冲击。

黄昏、晚年、晚节，各人不同。毛泽东是毛泽东的格式，周世钊是周世钊的格式。

一 风浪骤起

1966年6月开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烈火燃遍全中国。毛泽东早期革命活动的中心，周世钊一辈子工作生活的长沙市也不例外，甚至比其他城市有过之而无不及。周世钊耳闻目睹，甚不理解，于是给毛泽东写了信和拍了电报，毛泽东于1966年9月5日嘱信访处复函周世钊，全文如下：

周世钊同志：

寄给毛主席的信和拍来的电报都收到了。你的信，毛主席已看过。毛主席9月3日批示“不必来京，事情可以合理解决。”

此复。并致

敬礼！

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信访处

1966年9月5日

1967年7月12日，在中南海，毛泽东会见周世钊长达三小时，讨论文化大革命问题。毛泽东说，刘少奇在四清时搞形左实右。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泽东在韶山滴水洞，刘少奇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擅自向各大学派了工作组，而没有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风趣地说：滴水洞是有电话的哩！结果是说刘少奇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毛泽东还把各地因武斗死伤的人数说得很清楚。

会见时在座的有王海容。

“文化大革命”初期，有一次毛泽东与周世钊会见时，周对毛说：

现在是搞文化大革命，是在搞群众运动。在这场群众运动中，各种各样的议论很多。例如对主席的思想，现在也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有的说您的思想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有的说您的思想是毛泽东主义，有的说您的思想是光耀无际的毛泽东思想。因此他们提出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要大树特树毛主席的领导地位等等。对于这些说法和提法到底对不对？哪些是对的，哪些是不对的，我现在也搞不清楚！

毛泽东说：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席卷亿万人民群众参加的大革命。在这样一场大的群众运动中，出现了对一个问题的各种说法和提法是不足为奇的，但最后也是会统一的。关于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它是一种思想体系，是一种正确的思想体系。既然它是一种思想体系，又为什么把它叫做毛泽东思想呢？为什么要用我的名字来代替这种思想体系的名称，而不用别人的名字来代替这种思想体系的名称呢？这是因为在1935年的遵义会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确定我为党中央的领导。1935年以后，中国的革命就再也没有走什么弯路了。在1935年以后的革命实践中，就慢慢地产生并形成了这种指导革命的正确思想体系，而这种思想体系又必须有个名称。因为那时我是党中央的领导，所以这种思想体系的名称就必然要用我的名字来代称，而不能用别人的名字来代称。但是，党中央确定把这种思想体系叫做毛泽东思想。就决不是说毛泽东思想完全是我毛某一个人的思想。毛泽东思想是包括一

些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内的思想，只不过是台字来代称罢了。当缺其中成的东西可能要多一点，要不然我怎么能当党中央的主席啊，中国的革命，从 1935 年以后，一直从胜利走向胜利，所以毛泽东思想是战无不胜的说法是对的。关于毛泽东主义的问题，这种提法也没有多大的错误，他们硬要这样讲也未尝不可。不过自从党中央把这种思想体系确定叫做毛泽东思想以后，它在我们全中国人员的头脑中已经享有崇高的威望，它对我们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已经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在国际上的影响也很好，因此就用不着去改它，也没有必要去改它。关于那种什么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要大树特树我的领导地位的提法的问题，那些大讲大树特树的人们的真心实意是：名曰树我，实则是要树他们自己。关于所谓权威的问题，从来就没有什么绝对的权威。任何权威都不是树起来的，权威是在革命的实践和斗争中形成的。那些想要利用我这块牌子来达到大树特树他们自己的目的的人，终究有一天是要失败的。关于光耀无际的毛泽东思想的问题，这是无稽之谈。光从来是有际的，再大的光也是有际的。你看见过无际的光吗？他们要这样讲，除了说明他们是无知之外，别无其他解释。

长沙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后，由于省人委处长沙市的中心池段（当时省人委办公地址在今省农业厅内），交通方便，有利于联系工作。当时省人委的大多数副省长都住在省人委院内及其周围。也由于副省长的家里房屋较宽，又都有电话可用。因而当时多数副省长的家里，都驻扎了一至两个群众组织的司令部。周世钊的家里，在省人委东侧的教育街 53 号，是一栋两层楼的小洋房，很适于驻扎一两个群众组织的司令部，到 1967 年 5 月底以前，曾有十多个群众组织的司令部要求进驻周世钊的家里。每个群众组织司令部的头头来要求进驻时，陈明新都是以两条理由和他们交谈，一是讲周世钊年岁太大，身体不好。如果你们进驻他家，对老人的生活必有诸多不便，这是对老人的不敬，二是如实告诉他们，周世钊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在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最要好的同班老同学，现在是毛主席最要好的朋友。如果你们的司令部进驻他家，对他的工作、学习和生活都会不利，他就会上书毛主席，就会要麻烦毛主席，这对毛主席是不忠。许多群众组织司令部的头头，经过陈明新用这两条理由和他们交谈之后，一般都同意不进驻周世钊的家里。

随着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不断深入开展。一个所谓破“四旧”立“四新”的运动滚滚而来，红卫兵查抄“走资派”家里的行动随即而起。红卫兵在周世钊家里，抄走了现款和存折，拿走了一些旧书和衣物之类的东西。当红卫兵从箱子里拿出一件很高级的羊皮大衣时，周世钊的夫人余寅说：这件羊皮大衣是 1950 年毛主席请周老到北京见面时亲自送给周老的，红卫兵才未将这件羊皮大衣拿走。当红卫兵从箱底里搜出毛泽东给周世钊的一大堆信时，有的红卫兵看到毛泽东给周世钊的每封信都是称周世钊为惇元兄或东园兄时，就问周世钊，惇元和东园是哪一个？周世钊回答说：惇元和东园都是我，是我的别号。有些红卫兵马上就说：你是个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典型人物，你真是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毛主席比你大得多，你怎么要他称你是兄啊！你这不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是什么啊！对于红卫兵这种无知和可笑的追问，周世钊只好采取无可奉告，不予回答的

态度。

有一次毛泽东问周世钊：悍元兄，我们多久不见了，现在正在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还好吗？

周世钊说：好什么啊！红卫兵抄了我的家，钱也搞了去了，书也搞了去了，有些好一点的衣物之类的东西也搞了去了。

毛泽东说：哎哟！红卫兵真的不简单啊！你这样一位堂堂的副省长他们也敢到你家去抄家啊！不过没有什么关系，钱吗叫你的秘书找红卫兵把它要回来就是了。书被抄走后很可能搞散了，难得追回，那就由我来负责赔偿好了。

毛泽东问：你是怎么来的啊！现在住在邓里啊！

周世钊说：我们是通过湖南省军区的负责人龙书金的帮助才买到飞机票，才能进入机场，我们是坐飞机来的，通过王海容的安排，现住在北京饭店。

毛泽东说：龙书金我不认识他。但是我知道他很能打仗、很会打仗啊！我知道他是十八勇士之一啊！接着周世钊向毛主席汇报了湖南长沙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情况，向他汇报了长沙“六六惨案”的有关情况后，毛主席就湖南长沙当时进行武斗的问题，讲在东塘是如何打的，讲在河西又是如何打的，讲得清清楚楚。周世钊问毛泽东说：主席，您怎么比我们还了解得清楚些啊！

毛泽东说：我是党中央的主席嘛，他们会时常向我汇报情况的，再说你看我的办公桌上，不是放着一大堆小报吗！有些情况我是从小报上看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在意识形态领域内进行的大革命，是一场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革命。用不着争争吵吵，更用不着武斗。那样只能给阶级敌人有机可乘，对广大革命群众是不利的。湖南的群众组织很多，但归纳起来可分两大派。一派叫做‘高司’派。这是以湖南的高校学生为主体的群众组织，其中也有很多中学生，也有一些工人和其他群众参加。据我了解，机关于部参加这一派组织的要占大多数。再一派叫做‘工联’派。这是以工厂中工人为主体的群众组织，它的群众主要是工人，其中也有大、中学生，也有机关干部和其他群众参加。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确实把所有的群众都卷进去了。就我们湖南来说，不管他是‘工联’派，还是‘高司’派，我认为两边都是革命群众，两派的组织都是革命群众的组织。‘高司’的群众基础是学生，学生素来是革命的先锋队，‘工联’的群众基础是工人，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从它们的历史情况和它们所处的地位来说，没有本革命的理由，也没有不是革命的群众。两派并没有什么原则的分歧。两派只有联合起来，也必须联合起来，才能将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你是副省长嘛，湖南的事你还是要管管，当说的则说，当管伯则管，”至少是教育方面的事你要管，不必负气。

周世钊说：我连个党员都不是，我怎么管啊！

毛泽东说：如果你愿意入党，我可以作介绍。你既是副省长，又是湖南民盟的负责人，怎能对湖南的事袖手旁观呢？

周世钊说：今天这个局面，民主党派还能起什么作用，连个庙都没有了。

毛泽东说：庙可以重修嘛！修庙是积福的事，我出点香火钱。湖南现在的情况比较乱。你既然已经来了，既来之，则安之。你就暂时不要回去，在北京住一个时候再说。经费由我负担，我请你的客好了。

第二天，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一应同志专程送人民币 2000 元，并说：这是毛主席叫我专程送来的生活费，主席说先送去 2000 元，如若不够用，以后再说。经过王海容的联系和安排，周世钊就在北京饭店住下来了。王海容说：你们就住在这儿，周伯伯出去用车，由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负责安排，明天会有人来直接找你们联系的。第二天，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接待处一位姓朱的同志来到北京饭店对周说：上面交代了，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接待处交我来联系，生活上有什么事情，就直接找我联系。

毛问周：你到北京后到了什么地方，看了些什么东西啊？

周世钊说：我到北京后看望了谢老（觉哉）、徐老（特立）、王季老（王季范）、张国老（张国基）、楚中老（楚中元）几位老朋友。除此之外我每天就是看书看报，有时也上街走走看看。我是住在北京饭店，北京饭店大门口东侧就是王府井大街的南口，在那里每天有很多全国各地的各种小报，有时我也买几张看看。那些小报大都是报导全国各地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情况，特别是报导各地进行武斗情况的消息为多。他们报导武斗的消息大部采用国民党蒋介石时代打仗发急电的方法，就是某某地告急、急急急、十万火急。

毛泽东说：让他们去告去，急不了好久，总会要想个法子解决问题的。

周世钊说：我还到了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看了一眼。我看见在这两个大学里，主席的语录很多，在清华大学有好几个地方都有主席的塑像。有的还塑得很好，很象主席的像貌。

毛泽东说：我很讨厌那些东西。到处搞些语录干什么呀！我早就跟他们讲过，不要到处搞语录。不要到处搞红色海洋，不要搞那么多的红本本，那是极大的浪费。他们就是不听我的。现在他们又到处在搞什么毛主席塑像，说这是对主席的什么忠忠忠。我看他们那样搞并不是对我的什么忠，他们是要我站岗。

二 痴也不痴

“文化大革命”期间，盛行“抄家”。毛泽东的友人周世钊家也不能幸免于难，被洗劫一场。不久，周世钊到了北京，想找毛泽东告状。毛泽东会见了。谁知，见面后周世钊刚坐定，毛泽东就若无其事他说了句：“听说红卫兵照顾了你的家？”于是，周世钊如实地反映了情况，谈了对抄家的看法。后来话锋转到民主党派等的问题。这段谈话的内容，在1985年12月26日的《湖南日报》上，李津身著文的《毛主席与周世钊同志一席谈》[35]记载得比较清楚。1986年1月9日的北京《文摘报》转载了该文。李津身文录于本书第十章中。

1970年，毛泽东会见了周世钊。毛泽东问周世钊，在长沙的书记级干部中，有哪个尚未解放，周世钊告之说，原省委组织部氏，后任长沙市委书记的曹痴尚未解放。毛泽东又问：曹痴是什么问题？周世钊告之以某些问题。毛泽东说：“曹痴其人，我并不认识，可是他叫曹痴，而曹操并不痴。倘若只有这些问题，那是应该解放的。”不久，曹痴获得“解放”，并出任中国驻尼泊尔大使。

曹操不痴，而周世钊自认为痴。他在《七二自寿》一诗中写道：岁月蹉跎觉悟迟，行年七二愧顽痴。平生早抱澄清望，老大常吟感遇诗。万里河山春浩荡，五洲风雨气淋漓。喜看革命洪潮涌，地覆天翻共一时。

1970年12月，熊瑾玎有一首《七律·奉和周世钊七二自寿》：才华炫耀不妨迟，大智原来貌若痴。放步并无衰老气，拈毫写出崭新诗。七二高龄红烂漫，许多妙句洒淋漓。中华威望扬天下，自寿书怀正适时。[36]

三 天安门·井冈山·人民大会堂

1971年“五一”国际劳动节，首都北京和以往节日一样，盛装浓抹，红旗招展，一片热闹气氛。这晚，毛泽东和周世钊同登天安门。毛主席到前面招呼了欢呼的百万群众，约半小时，回到了天安门城楼休息室，与周世钊、王季范、王曼恬谈论毛泽东诗词注释、政协和台湾等问题。

毛泽东是多次主持这样的盛会，并且自信能多年如此，当然他不能料到这是最后的一次。周世钊也是最后一次登上天安门城楼。周世钊特别激动，写有佳词：《百字令·1971年5月1日天安门前庆祝晚会纪盛》：灯山人海，同欢庆国际劳工佳节。灿烂满天光万丈，忽化千花百叶，飞雪迎春，流星泻地，上下都澄澈。缤纷变幻，奇妙难与君说。更喜舞队踮跹，歌群踊跃，浩荡豪情溢。万岁声声雷震荡，共祝中天红日。倾倒葵心，瞻依斗极，济济梯航客。工人世纪，问谁能忘今夕！

井冈山，毛泽东武装斗争的革命圣地，周世钊以七十七高龄上山参观。1973年秋，周世钊随湖南省参观团上了井冈山，并有诗词数首，今录其两首：

《五律·过永新》，永新形胜地，烟树郁葱茏。双岭风云壮（指龙源口大捷。双岭、东西七溪岭，都在龙源口。），三湾气象雄。征诛垂旧绩，建设显新功。磊落英雄事，讴歌到处同。

《七律·赣游返湘夜宿浏阳》，赣水罗山道阻长，砥平今喜入浏阳。风摇嫩竹千峰翠，雨润新杭万顷黄。莽苍川原人奋勇，艰辛战斗史辉煌。纵谈今昔浑忘倦，夜午犹难入梦乡。

毛泽东在1927年上了井冈山，1934年离开江西，1965年5月又上了井冈山，并写下了《念奴娇·井冈山》和《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

1975年1月，全国人大第四届会议在北京召开，周世钊作为湖南省选出的人大代表参加了会议。在会上，周世钊荣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1975年3月，周世钊又以病弱身躯奔波在长沙—北京的道路上，参加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周世钊在东南大学的同学姜国仁以诗纪之。全诗为：

东园 79 岁寿诞离病院乘飞机
赴京出席人大常委会诗以祝之
1975 年 3 月 17 日

乱世论文早，相知六千年。金陵同受读，长岛共挥鞭。
鉴识资秦镜，文章冠楚贤。如何驱二竖，大任更承肩。
四海迎春日，京都盛会开。匆忙辞病院，无暇举离杯。
楚岫千峰翠，燕云万象恢。丹心长拱北，谋国献宏才。

四 西安、延安行

在周世钊逝世后，整理遗稿时发现了半封恳求信的草稿，写信时间为1971年5月，收信人是毛泽东，传信人是王海容。半封信的原稿为：

尊敬的主席：

五一庆祝晚会时，很幸福地见到您，并承殷殷指示，感到无比兴奋！但因时间不许可，有些想汇报请示的问题，未能一一陈述，只好过一些时候，另以文字奉闻。

原想在此次来京之便，陪同王季范先生前往延安，瞻仰革命圣地，但王先生近以皮肤病入医院治疗，不愿外出。我现在打算在没有同伴的情况下（张国基同学极想瞻仰延安圣地，但他不敢向您提出这个请求），单独去延安一次（有秘书陈明新跟随），返回后，在京稍作摒挡，再从京沪路南返，便道参观南京长江大桥等处，然后乘轮西上，以便看到长江沿岸的新风貌。区区心愿，藏之已久，特托海容同志代陈，未审得蒙许可否？敬恳谅其过分之求，给以特殊照顾。临颖不胜感盼！

（下缺）

这封信送出不久，即蒙友人照准，毛泽东批转中共北京市委安排，组成了有周世钊、王季范、张国基、楚中元等十余人的参观访问团，5月离京，到西安、延安访问后于6月返京。

周世钊一行，在西安时受到李瑞山、黎原等的热情接待。

在西安、延安，周世钊有许多咏怀吟景诗作，抄录数首：

五律·入潼关

报道潼关过，山河望忽开。华骊青北拱，泾渭尽东来。青爱莎香溢，黄看麦浪迴。秦川八百里，佳气日崔嵬。

七律·自京赴延安

絺衣藤篋软轮车，千里西行正及瓜。不顾凄凉渭城曲，唯寻烂漫枣园花。万山拱揖迎红日，一塔轩腾接彩霞。踏遍芳芜人未倦，延安道路达天涯。

七律·瞻仰延安革命圣地有感

北国风光著两间，延安灯火照人寰。十年伏虎真奇伟，三座移山只等闲。奔逸绝尘趋步晚，光华无极颂歌难。欲知覆地翻天秘，四卷从头仔细看 [37]。

七绝·陕游竹枝词·瞻仰延安革命圣地志感

万里长征到陕边，延安灯火照新天。低徊此日难离去，恨不早来三十年。

1971年5月下旬，天气晴朗，周世钊一行到了陕西乾陵，这里是唐高宗与则天皇帝的合葬墓。周世钊乘坐的吉姆牌轿车停在无字碑旁，他下车后尽情饱览胜景，漫步山径。他是第一次来到代表中华民族文化的地域。一会儿，周世钊若有所思他讲了一个历史故事：唐高宗患有头痛病，病犯时需要在头上扎针，武则天极表反对，说是哪个敢在天子头上扎针。唐高宗实在痛得忍无可忍时，强令御医扎针，才觉得好受些。武则天不让治病，是愿高宗早死。

在那几年，红海洋遍及中国大陆，从三岁稚童到百岁老妪，无不佩戴毛泽东像章，这是大家记忆犹新的事。可是就在1971年，周世钊在陕西的半个月中不曾戴过像章，而他们的同行者和接待者都佩戴了甚为精致漂亮的像章。周世钊在西安时寓住丈八沟宾馆，在他的卧室里，只有几本唐诗宋词，没有毛泽东语录一类的书籍。这是不是周世钊对毛泽东不忠呢？有一次。周世钊对其亲属讲：“一次，毛泽东和我谈起，有些喊万岁最起劲的人，他们的心里是希望我“万死”。要忠于毛主席，不是靠戴像章、喊万岁所能表现的。”

五 绕心头的静中器

1971年的盛暑，是又一次庐山会议之后，国内政治斗争异常激烈。林彪在北戴河疗养，毛泽东在视察大江南北，双方剑拔弩张，处在千钧一发的状态。

周世钊又承毛泽东嘉惠，和王季范、张国基、楚中元等人去北戴河疗养避暑。周世钊在北戴河写下了一些诗篇，其中有两首，足以说明他当时的心情。

一首是《鹏鸽天·北戴河海滨游泳场》：

瞻仰延安宿愿酬，又承嘉惠海滨留。凌波破浪犹称健，枕石眠沙且自休。经盛暑，入新秋，世情国事绕心头。海天寥廓升红日，美雨欧风次第收。

又一首为《五律·夜坐》：

瞑色入窗寮，银灯破寂寥。史诗方罢读，戍鼓已频敲。搏浪崩沙岸，麈风折柳腰。耳边生万籁，深味静中器。

其时其景，真是绕心头的静中器。周世钊等是7月20日去北戴河，8月20日回到北京的。9月13日林彪出事。

1972年6月8日，周世钊写了一首七律，题目就是《六月八日作》。1971年6月1日，周世钊自西安飞抵延安，8日又从延安飞返西安，至今恰好一年。这一年发生林彪叛国投敌，自取灭亡，美帝侵犯越南，轰炸升级等事。全诗为：

枣园杨岭别经年，万叠云山望不穿。槛外榴花红似火，梦中延水碧如天。心警北鄙投豺虎，盼切南溟扫瘴烟。独愧书生无计略，徒将忧愤寄诗笺。

六 忧国愤世书信

1976年，周世钊谢世后，在整理周世钊遗稿时，发现一封1972年8月10日给毛泽东的信稿。当时，对这一封信稿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是不合时势，付之一炬了之；一种认为是忧国愤世的诗一样的信，应妥加保存，信稿很长，由于意味深长，仍基本照录如下：

尊敬的主席：

钊此次留京已久，想在本月二十日左右回去，可能没有机会趋前聆示，特将想要向您回报的浅陋意见用书面留陈，敬祈鉴察！

我的学习差，水平低，对党的路线和政策没有多的理解，对各方百的调查研究更谈不上，仅从读文件和报刊得到一些启发，具有一些糊涂的认识。当前对由批林整风和按照您早已提出的条件培养革命接班人，特别是中枢领导干部的接班人。而整军备战、发展经济、落实干部和知识分子政策、提高科技水教育平，也一定是您和中央负责同志摆在日夜考虑和采取措施的课题。我现在仅就个人年来耳闻目见的一些具体情况和一些浅薄的看法，脩写上陈，是否有愚者千虑一得的作用，则不敢自必了。

（一）

此次以休贼为首的黑帮分子与过去路线斗争的情况不同，性质不同，犯罪的程度不同。他们的罪恶滔天。万死不足以蔽其辜。如果处理得过于宽大，不把那些大小头目中罪行特别严重者处死，实不足以平民愤、张国法、警效尤，也不足以树立无产阶级的威信。

（二）

林陈黑帮利用文化大革命运动，背著主席，排摈异己，扩大黑帮。很多水平高、能力强、有斗争历史、工作经验，而又忠于职守、卓著成绩的党内和党外的老干部被他们假借各种名义给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扣薪降职者有之，遣送回籍者有之，至今仍有很多人不得平反，不得复职，造成各方面工作上的困难，损失极大。亟应进一步贯彻您的指示，落实干部政策，并由中央组织检查团分赴各省市进行检查。

（三）

林陈为了破坏主席的知识分子政策，对文化界、教育界、科技人员、医务人员各类大小知识分子都加以臭字的溢号，不问出身成分，不问政治表现，不问党群、资无、新旧、青老统统称为臭知识分子。一些年龄稍大，家庭出身稍差。而工作经验、教学经验都较好，文化水平专业水平都较高的人，常被斥为反动学术权威，反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强令其退职退休，用一切办法排造出去。而被他们吸收以接替这些人工作的人，又多是政治表现不好，文化水平不高，工作经验较少的人，使科技

文教工作受到极大损害。现在虽由于主席的三令五申，知识分子多数得到解放，得到工作，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没得到提高，不敢出主张，提意见，明知不对，也不敢说话，抱着少吃咸鱼少口干的思想，如何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也不是一个容易解决的问题。

(四)

人民解放军在文化大革命中。对三支两军作出了大的贡献，又没有受到冲击，逐渐滋长了骄傲自满的情绪。据我们所闻，许多单位的人事安排，行政决定，一切应兴应革的措施，每每是部队干部说了就算，没有集体领导的精神，甚至对党的领导不大尊重，这样下去，恐将形成枪杆子指挥党的倾向。主席早已洞察及此，发出种种重要指示，如戒骄戒满，解放军学全国人民，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限令退出所占机关房屋等，多已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全国人民还希望我们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更进一步发扬谦虚谨慎、艰苦朴素的作风，如南京路上好八连一样继承革命的光荣传统，成为国家的钢铁长城，达到：“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的地步。

(五)

主席素来特别重视青年培养教育问题。但经林贼的阴谋破坏，共青团，少先队等组织完全瘫痪。学校教师、工厂干部对管教青年学生、青年徒工也大大放松。下乡上山的青年学生，社队也不重视思想工作，差不多可以说，广大青年处于很少人管教的状态。主席指示，农村是青年广阔的天地，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插队落户，本来是正确的政策，是培养青年的重要措施。这些年来，由于黑帮分子的破坏，不关心他们生活安排，不注意提高他们劳动和学习的积极性，这样放任自流，引起下乡知识青年和他们家长的不满。这些年来，有些学生抗拒上山下乡，老留在城市，每每通过人情关系、开后门的办法被吸收入厂就学或参加其他工作。而有的自觉争取上山下乡，在生产劳动中表现又较好的却多年得不到入厂就学的推荐。许多高级干部和高级军官的子女，每每不肯下乡，纵然下了乡，也每每不久就得调回城市。一部分地区的下乡知识青年，一方面由于自身的改造不好，觉悟不高，一方面也由于上述这些原因，加以年龄日大，生活问题、婚姻问题得不到满意的解决，倒流城市的现象颇为严重，而在城市中打群架，作坏事，参加盗窃集团的也每每有这类坏学生。这个问题中央已在注意处理，《人民日报》也对青年教育问题多所论到。这个问题的确值得重视，窃以为共青团、少先队的工作应该恢复，并提高质量。

(六)

这些年来，尖端科学技术的研究，各种专家的培养工作，也受到林陈黑帮的多方破坏，这正如外间传说主席对某专家条陈批示的“不但是后继无人的问题”，危险实在极大。窃以为理工科大学要特别重视提高

教学质量，以期在不大长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同时还应恢复科技大学，适当延长其学习年限，以期提高学生的造诣。文科大学中是否可指定几个有条件的设置历史研究所（或单独设立）招收大学毕业生中的文史学习比较有基础的入学，用适当长点的时间，研读古今文史名著，章学诚谓：六经皆史。实则子部集部中的绝大多数又何尝不是历史的重要资料。如果能按照您的指示：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吸收精华，扬弃糟粕的批判态度与精神去研究，则古今多少文史书籍都是可读之书，也是作专门研究者必读之书。目前能胜任这种研究所的教师的老人已不多，再过几年更难物色。因此能早为之所，便利较多。至于近代史和世界史当然也更为重要，在研究所里，可另作专科研究。

（七）

一些黑帮文化，编写出版了大量毒害读者的作品和为黑帮头目树碑立传的坏东西。这些东西当然应该批判，全部禁绝，但有些没有多大问题还可供阅读的作品也同被禁止发行，使青年工人、农民和学生除政治理论外没有多的书可读。窃以为五四以来一些比较好的书可以经过审查开放一部分，同时文教领导部门应组织力量编写新的读物，凡革命斗争故事、革命先进人物、战斗英雄、劳动模范、革命知识分子、好的村史、家史和一切好人好事都应以生动浅显和笔端带感情的文字写出来。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农民革命的英杰、一切好的发明家、工程技术家、艺术家、哲学家、文学家、科学家、医药家、教育家也可以一分为二地写出其有教育作用的部分。如果这些小册子能够早日编成陆续出版，使读者在学习政治理论的基础上，从一些具体人物和事实中得到感发兴起的效果，对提高思想觉悟，促进感情转变，都会起到很大的影响。另外，还应编写一些有关农业基础知识、工业基础知识、气象常识、史地常识等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常识读本，以提高读者的文化科学知识。

（八）

我常常想，在新的宪法制定颁布之后，会有许多制度将建立，有许多法律的制定。在一般人看来，这是迫切需要的，但会经过比较多的时间才能搞好。目前有一个问题大家觉得值得重视：当前各级干部能够自我批评、公平处事者固然很多，但我们看到一些基层干部除以私人关系开后门的作风颇为严重之外，又每每以派性和私隙作祟，借机会报复，打击别人，也由于官僚主义作风严重，对于应该处理的群众提出的要求，搁置不予处理，以种种借口把提出要求的人推出门了事。使遭受无理打击、饱含委屈的人或合理的要求许久得不到答复和解决的人，有的向上级提出报告或控诉希望得到公平合理的处理，但上级机关每每将他们的报告递转下去，最后仍落到原机关经办人手里，引起这些原经办人的不满。更加重对那些报告、控告人的打击。王季范先生曾批评这种办法叫被告审原告的办法，认为应该改变。窃以为中央和省市可考虑设置接受这类报告或控诉的机关，负责对所提问题深入调查，作出结论，经过上级的审核批示解决问题。这样将使一部分人的不平之气有所消除，

更会感到党的温暖，感到党的正确伟大。

以上所陈，据我所闻知都在您和中央考虑处理之中。我也知当今万端待理，须分先后缓急，所以仍烦琐言之者，亦欲附于拾遗补阙愆之诚而已，惟其鉴其谏陋，给以指示，不胜感禱企望之至。

谨致

敬礼，敬祝
健康！

周世钊上

1972年8月10日

我国1972年的政治形势，诚如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3周年时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夺取新的胜利》中所指出的：“放在我们面前的头等大事，仍然是深入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的教育，认真搞好批修整风。……抓紧革希大批判，划清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的界限，以推动各个领域的斗、批、改继续健康地发展。”当时，江青与美国女记者的谈话整理成的《红都女皇》成了国外畅销书，书中泄露了国家重要机密，并暴露了江青赤裸裸的政治野心。政治斗争异常激烈尖锐。

然而，这封象诗一样美好的朴实无华的信是在1972年8月写的，信中说，要严惩林彪一伙；要落实干部政策；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要解放军学全国人民，对青少年问题阐述很多，讲到共青团，少先队，而没有“红卫兵、红小兵”的字眼，要培养各种专家，理工科大学要特别重视提高教学质量，恢复科技大学，适当延长其学习年限，文科大学要设置历史研究所，要出版各类书籍；反对打击报复等等。这些内容都是一个真正的爱国志士能在当时的情况下写出，才能敢于上送的。这种认识与胆略来自对祖国、对人民、对领袖、对友人的赤诚之心。此信是1972年10月2日毛周会见后由周面交毛的。这也可算是周世钊三谏毛泽东。

苏浚在《鸡鸣偶记》中给畏友下了个定义：道义相砥，过失相规，畏友也。而著名的《胡氏家训》又说：畏友甚于严君。周世钊在1972年8月的气候中能向毛泽东提出如此八条，难道不是畏友、净友、挚友吗？只有交深而才能言重，人与人之间最大的信任就是进言的信任（38）。

七 噩耗频传

1965年，毛泽东与周世钊的老师徐特立，常为国事忧愁，觉得心里有些话，想找毛泽东谈谈。他打过多次电话，但总联系不上。有时他焦急地要坐车直接去中南海，每次都为身边的工作人员听劝阻。有一次，他悄悄地对他的好友谢觉哉（也是毛泽东与周世钊的老朋友）说，想回湖南喂猪法。谢老听了感慨良多，就在这年五月的一则日记上写了一首诗记叙这件事：“九十高龄力有余，身闲不住待何如。老人又羨耕和读，想旁桑荫学养猪。”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这位平时每天都要关心国家大事，收听广播的徐特立，却经常让身边的工作人员把收音机关掉，因为他讨厌那些为制造个人崇拜而发出的狂热呼喊。有一次，徐老去探望住入医院的谢觉哉。他们看到医院专门腾出一间很大的房间，在墙上贴着一个大“忠”字，每天人们都要在那里恭恭敬敬“早请示”、“晚汇报”。谢老同徐老边散步边低声地说，“这不是把毛主席当成神供起来一样。”徐老点点头，也低声说：“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导师，也是中国人民的学生。”

不久，在徐特立身边工作多年的徐乾也遭到林彪、江青的迫害，这使徐特立受到很大的刺激。

1968年11月28日，毛泽东与周世钊尊敬的师长徐特立，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中共中央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毛泽东献了花圈。周恩来参加了追悼会。滕代远致悼词。周世钊由长沙发了唁电。1981年3月，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意见，中共中央组织部委托教育部重写了徐特立的悼词。

1979年8月，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怀念徐特立同志》一书。书中收进了毛泽东于1937年致徐特立的一封信和周世钊在1963年写的《伟大的师表》〔39〕。

由周世钊、何叔衡、毛泽东介绍参加新民学会的谢觉哉，曾和周世钊在《湖南通俗报》共事。他后来成为国家和人民的重要领导人，一贯忠于革命事业，重视民主和法制建设，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艰苦朴素。这位周世钊与毛泽东的老朋友、活到老学到老的老者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是备尝艰辛。

1969年，当谢觉哉病魔缠身，急需有人在身边照顾的时候，2月6日，他的夫人王定国在一次会议中间，突然被宣布为“叛徒”，被关进“学习班”，不准回家。这使谢老缺乏照顾，身体日见衰弱，过去有人扶着能在庭院散步，现在连站都站不起来了。他日夜躺在王定国房间里的一条破旧的长沙发上，几乎寸步不离。他不能按时吃饭，喝水也困难。一天，谢老艰难地用左手给周恩来写了封信，要求把王定国放回。他拖着瘫痪的身子，坐车将信送到中南海收发室。三天后，王定国回到家里，看到谢老的日记还在破沙发中。谢老万万没有想到，几十年来在战火纷飞的日子里记下的日记，竟然要用自己半身不遂的残存的生命来保护它，否则随时有被“拿”走的可能。

1971年6月15日，最后一批参加新民学会的会员谢觉哉与世长辞了。林彪、“四人帮”、康生一伙封锁消息，就连同时一起住院的董必武也不许通知，不准向遗体告别，不准开追悼会，不准吊唁，不准送花圈，……。然而，战友的情谊是封锁不住的。董必武来了，他打破“送花圈是复辟四旧”的禁令送了花圈。周恩来明确、坚定地下达指示说：“要举行告别仪式，要发消息，要登照片！”朱德从报上看到这个不幸消息时，十分生气，用拐杖在地上一连顿了几顿，气愤地说：“这是什么世道呀！”周世钊闻讯后，虽

然当时形势严峻，他还是写了寄托深厚情谊的悼念诗《七律·悼谢觉哉同志》：发硎初试自湘滨，觉字文章笔有神。每持宁静攻盘错，岂为艰危计若辛。叹息老成今永别，感怀畴昔泪沾巾〔40〕。诗中的“觉字文章”，意指在1920年秋，谢觉哉应何权衡之邀，任《湖南通俗报》编辑，常在报上刊登署名“觉”的批评文章。

1972年7月11日，毛泽东的姨表兄、毛泽东和周世钊的共同老师、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王季范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88岁。7月13日下午4时在北京举行了追悼会。追悼会上陈放着毛泽东送的花圈，全国人大代表周世钊致悼词。参加追悼会的有周恩来、徐向前、郭沫若、华国锋、季方、胡愈之、谢扶民、杨东莼、周世钊、黎锦熙、张国基、熊瑾玎、李淑一、楚中元、肖凤林、王海容等。追悼会由郭沫若主持。

周世钊在悼词中说：“王季范先生是湖南省湘乡县人，湖南优级师范毕业，解放前在湖南历任中学、师范学校学监、校长等职。解放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参事，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王季范先生持身严谨，富有正义感。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

“王季范先生解放前长期从事教育事业。他同情和支持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多方赞助进步学生和进步教师进行革命活动，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对他们的迫害，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为祖国的独立富强而努力活动。

“解放后，王季范先生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注意改造世界观。”关心国家大事、宣传毛泽东思想。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伟大成就，为社会主义祖国的日益繁荣富强而欢欣鼓舞。

“我们悼念王季范先生，要化悲痛为力量，在伟大领袖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41〕

王季范在逝世一年前，曾和周世钊等到西安、延安、北戴河参观，在半年前的1971年冬，曾自京返湘，和周世钊言谈颇多。谁料在1972年7月病重，周在事先得到通知，即由长沙飞抵北京。王季范逝世后，周世钊写了《江城子·感事》：寒冬送客忆机场，朔风凉，旅途长。别意拳拳众口祝安康。更约明年秋色好，携友好，看家乡。惊闻二竖入膏肓，检行囊，趁民航。疾走京都问病倚匡床。诿料沉痾终不起，人惨悴，夜苍茫。

和毛泽东、周世钊同时参加新民学会、都是基本会员的熊瑾玎，曾和周世钊在《湖南通俗报》共事。他也曾担任过湖南自修大学和湘江学校校董。解放后，熊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1971年，周世钊曾赠诗《七律·赠熊瑾玎朱端绶两同志》：昔时梁孟岂堪伦，黽勉同心共苦辛。革命斗争双国土，夫妻酬唱两诗人。畅怀越桂湖山美，偕老京华日月新。鬓发已苍神尚王，常开四卷送昏晨。赠诗不久，熊瑾玎，这位毛泽东与周世钊早年的朋友，也于1973年逝世了。

美国的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其新著《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写道：“1974年2月，邓小平被召到北京。漫长的毛时代行将结束。文化革命最糟糕的时期已经过去。引起的破坏比战争还严重，工业垮了，教育被抹掉了，党遭到严重破坏。刘少奇等许多人死了。毛的健康状况不断恶化，他的思想和情绪很不稳定。他的妻子和四人帮其他三个成员暂时受挫，但是正在准备卷土重来。周恩来患了癌症。”〔42〕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毛泽东和周恩来，从20年代开始，共同战斗了50余年，休戚与共，在历次路线斗争和重大决策中，都站在一致的立场上。如今，年龄比毛泽东小几岁的周恩来竟早见了马克思。毛泽东参加了周恩来的治丧委员会，并送了花圈。周世钊从1950年听了周恩来的报告后，常有机会听其演讲，在王季范的追悼会上与周恩来讨论“救国”与“建国”问题。周世钊十分钦佩周恩来的工作能力。在周恩来逝世后，周世钊在病床上喃喃说道：“周恩来是我国不可多得的人才，很能管理国家。”

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前夕离开了人间。

文化革命期间，许多新民学会会员去世了。蒋竹如在1967年逝世。陈书农是1970年病故于长沙的。熊季光、唐耀东于1973年去世。李思安于1975年病逝于长沙。劳君展于1976年去世。……。这些故友的逝世，不知毛泽东知悉否？而对周世钊则都是一件一件的伤心事。

八 毛泽东终函周世钊

1972年9月,周世钊旅居北京,时间久了,不免思乡。谁料毛泽东于1972年9月4日赠书一套。书名《两般秋雨盒随笔》。书共8册,线装本。毛泽东在书的扉页上写道:供停元兄消遣。并署上“毛泽东”三字。

《两般秋雨盒随笔》系清朝梁绍王撰著的一部笔记。梁绍王,钱圻(今浙江杭州)人,生于1792年。他曾北至北京,南游闽广,见闻广博。梁所著的《两般秋雨盒随笔》是一部内容相当丰富的笔记,记载了不少清代文学家与艺术家的事迹,还搜集了不少诗文评述、论学考证方面的文篇。这些都是周世钊所高兴阅读的。

这本书在1982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再次出版,点校者为庄葳。

就是在1972年9月4日,毛泽东赠书周世钊的同时,还附了一封珍贵的书信。此信的内容是关于赠书方面的,笔者未见其真迹。周世钊的友人彭靖确见其真迹,并于1984年4月对笔者回忆此信为:

停元兄:

旅夜无聊,奉此书,供你消遣之用。此书写得不太好,但读来也还有味。

毛泽东

1972年9月4日

这就是目前所知的毛泽东给周世钊的最后一信。

九 最后一面

1972年的国庆前后，周世钊参观了清东陵及天津。正在天津逗留时，突然接到中南海消息，要求即日返京。于是，周世钊于1972年10月2日返回北京饭店。是日晚，毛泽东会见了周世钊。会见时间为从10月2日晚21时至晚24时，分别时间为10月3日的零时以后了，整整三个多小时。这就是他们的最后一面。

当周世钊步入宽敞的毛家客厅，毛泽东让坐，周坐定后，毛说，那是美国的尼克松和日本的田中坐过的位子。

会兀时，在坐的记录有王海容与唐闻生。毛泽东询问周世钊。湖南的情况怎样？周告之实情。于是，毛叫汪东兴入内，并对汪说，他（指周世钊）是来反映问题的，你也听一听。

在谈到林彪问题时，毛泽东戏改了两首古诗，如本书第七章所记。

接着，周世钊谈了一些社会问题，即本章第六节中所述的优国愤世书信的内容，并面交那封信件。

后来，毛泽东嘱周世钊与华国锋一起由北京回长沙去，并参加湖南问题的处理，即参加将要召开的中共湖南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

这次中共湖南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于1972年底至1973年初筹备并召开。会议由毛泽东、周恩来、华国锋共同研究。周世钊自始至终参加了会议。会议期间，华国锋等看周世钊衣服单薄，赠给他一件棉布的军大衣。周世钊甚为高兴，一直穿了几个冬天。

在毛泽东、周世钊最后一次会见的最后几分钟，毛叫周经南京、上海后回去，并一再叮咛要十分注意安全。周世钊还是那句老话，穷教书的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富有政治经验的毛泽东却极其郑重他说：华国锋去时有警卫人员，你没有人护卫，更应多加小心为是。

1972年10月3日的开始几分钟，周世钊与毛泽东依依惜别，恋恋不舍。谁能料到。这是他们的最后一面。四年以后，双双先后逝世。

对于这次有意义的北京之行，周世钊赋词记之。词为《踏莎行·1972年到北京》：风物常新，江山不老，甘年奔走长安道。薰风吹我又重来，苍梧翠柏娟娟好。万国衣冠，五洲倪耄，东西驰鹜知多少。纤云扫尽碧空事，凭栏一笑乾坤小。

时隔一年半以后的1974年4、5月间，周世钊在北京医院住院治疗。毛泽东曾决定约见周世钊。后来，周世钊给其亲属的信中写道：“因为得到通知，暂时没有时间接见，决定早点回家（指回长沙），大约在本月廿一、二日乘车南返。”此信是1974年5月16日写的。于是，这次约见没有实现，成为一次永远不能完成的约见，使周世钊感到很大的遗憾，因为他有很多话语要向友人倾诉。

后来，据人们传闻，这次不能实现约见的原因多种多样。有的说是毛泽东身体欠佳，有的说是毛泽东工作过于忙碌，有的说是有些人对1972年8月的信有不同看法，究竟属于何因？目前是不得而知了。

十 周世钊终函毛泽东

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大在北京召开。周世钊荣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以后，他又去京参加人大常委会讨论战犯特赦的会议。周世钊虽然年迈多病，但是由于职务的晋升，他更加关心国家，热爱人民。

1976年初，周世钊在北京医院就医，稍愈后返湘。不几天，又因病住入湖南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此时，他病病缠身，仍在思考国家大事，念念不忘他的好友毛泽东。他对多人说过：要给毛泽东写一长信，直至逝世，此愿未能实现。但在最后的日子，他曾向毛泽东致了一个短函。此函之草稿在周逝世后不久发现；“可惜缺页较多，兹将残留部分抄录于下：

……。

日昨中央文史馆长杨东苑来院，言及全国政协行将开会。他为了推荐原湖南大学教授，现中央文史馆员马宗霍为备选人，已向中央统战部专函介绍。我认识马君很久，但住还不多。他是章太炎的学生，精通小学，于古代文史造诣甚深，著作出版者不下十种，对于王充论衡、船山遗书用力尤多，书虽未经印行，而考订精详，有裨于法家著作之研究。特别是船山遗书，曾国荃金陵书局刻印之本，为了多所隐讳，字句的空白缺落页页有之，甚至段段有之。马宗霍经过十年的搜罗元濫访，手自抄录，日积月累，卒将空白缺落的字句全部补充，成为昭晰可读之原书。做此种工夫的全国不闻有第二人。窃认为他对法家著作补直罅漏，张皇幽渺之功实不可没。

马宗霍年已79，平生除读书教书整理古籍外，不多问它事，作风正派；不汲汲于名利，生活虽艰苦，而绝口不向人谈穷诉苦，以此知道他的人不太多。诚恐统战部置之不……。

……。

此信是迄今所知，周世钊写给毛泽东的最后一信。

十一 周世钊逝世

周世钊曾因病三次住入北京医院。第一次系 1971 年 3 月 8 日到 4 月 4 日，周世钊在 3 月 5 日从长沙动身去北京，下午车到信阳，下车在站台上买了几个广桔，突然右手发麻、拿不到找到台上的票子，但上车后又好了。到北京后，右手仍间歇地发麻，他未十分重视。到 3 月 8 日吃中饭时，手拿不好筷子，将筷子跌落到地板上，才由王季范家送他入北京医院，住在高干病室，并得到毛泽东的关怀，用四种方法进行了治疗。周世钊认为，此次发生这种危险的病症（可发展为中风或半身不遂），幸而在北京，医院医疗条件好，治疗和护理都很周到，同时又得到多方面的关心照顾，使病症很快得到控制、好转，可说是不幸中的大幸。

周世钊第二次住入北京医院，是在第一次住院的三年之后。1974 年 3 月 7 日至 5 月 5 日，周世钊又住入北京医院高于病室的三楼西 316 室，和郭沫若邻居，条件较好。

1975 年 10 月，周世钊第三次住入北京医院，直至 12 月出院。

周世钊住北京医院，开始被安排在二层。毛泽东曾派他的保健医生前去诊治，进行了仔细的检查，回到中南海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告之周世钊住在二层，病情较重，于是毛泽东嘱其安排到三层西领导人病室，即住北京医院 316 室。

在病院里，周世钊写了《病院吟》：儵然留病院，久矣寄危楼。明月虚窗夜，清风老树秋。灵台犹坦荡，世局几沉浮。何日腰身健，江山赋远游？

1976 年初，周世钊因病住湖南医学院附二医院十四病室。由于他年迈体弱，病情越来越严重。

1976 年 4 月，周世钊病危期间，中共湖南省委和省委统成都的负责同志，多次到医院探望，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还向中共中央办公厅和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在周世钊病危时作了决定，于 4 月 20 日凌晨从北京医院选派了两名医师乘飞机专程到湖南为周世钊治病。但是就在 1976 年 4 月 20 日早晨 6 时，从北京来的医生还没有来得及给周世钊看病，周世钊就在长沙与世长辞了。

1976 年 4 月 5 日，在庄严的中国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了“天安门事件”，全国乱烘烘的。病重的周世钊既得不到良好治疗，还得经受忧国悲愤。1976 年 4 月 20 日凌晨，周世钊不幸于长沙逝世。4 月 27 日的《人民日报》和全国许多家报纸，都刊登了有关消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及许多省市电台都广播了这一消息。其中《人民日报》在第三版上刊登了周世钊遗像，标题为：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湖南省委副主席周世钊先生追悼会在长沙举行，朱德委员长，华国锋总理，周建人、许德珩副委员长和人大常委会、政协全国委员会送了花圈。湖南省负责人张平化等组成周世钊先生治丧委员会。于明清主持追悼会，尚子锦致悼词。

周世钊逝世消息的电文为：

新华社长沙 1976 年 4 月 26 日电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政协湖南省委员会副主席，民盟湖南省委员会主任委员，湖南省原副省长周世钊先生，因长期息病，医治无效，于 1976 年 4 月 20 日在长沙逝世，终年八十岁。

周世钊逝世后，中共湖南省委员会，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及有关部门负责人组成周世钊先生治丧委员会，由中共中央委员，中共湖南省委第二书记，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张平化任主任委员，万达、于明涛、张立宪、李振军、毛致用、黄炳秀、童国贵、尚子锦、凌霞新、方鼎英、卢惠霖任副主任委员。4月26日下午举行了周世钊先生追悼会。

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建人、许德珩向周世钊先生送了花圈。送花圈的还有人大常委会、政协全国委员会、中共中央统战部、民盟中央、民进中央以及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湖南省军区、政协湖南省委员会、民盟湖南省委员会、民盟长沙市委员会、民进长沙市委员会、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等单位。周世钊的生前友好也送了花圈。

追悼会由中共湖南省委书记、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于明涛主持，中共湖南省委委员、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尚子锦致悼词。

悼词中说：“周世钊先生是湖南宁乡县人。解放前在湖南教书，曾任中学、师范学校教员，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代理校长等职。解放后历任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校长、湖南省教育厅副厅长、湖南省副省长、政协湖南省委员会副主席、民盟中央委员、民盟湖南省委员会主任委员、第二届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等职。周世钊先生早在1918年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就同情革命，曾参加过我国著名革命团体‘新民学会’。后来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同情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对国民党卖国、独裁、镇压人民的反动统治，深为不满。解放后，周世钊先生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努力改造世界观。他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情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伟大革命实践。……。”〔43〕

一位热情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伟大革命实践的友人——周世钊先生的友人几个月去世了。

1983年第一师范八十周年校庆展览室展出了周世钊的照片数帧并作了介绍，全文如下：周世钊（1897—1976）字惇元，宁乡人，教育界老前辈，他与毛泽东是同班同桌同学，他爱好文学，品学兼优，深受同学们的推崇，在1917年的“人物互选”中，仅次于毛泽东名列第二。毛泽东主持学友会期间，他担任了文学部部长，并是工人夜学的管理员之一。解放前长期任一师国文教员。解放后，历任湖南省教育厅副厅长，湖南省副省长，全国人大代表，四届人大常委，并一直兼任第一师范校长，1976年因病逝世。〔4〕

十二 毛泽东逝世

1976年4月5日的“天安门事件”和7月的唐山大地震，严重地影响了毛泽东的身体健康。

9月9日下午4时，宁静的祖国大地的工厂、农村、机关、学校、海岛、山助理，收音机、扩音喇叭中传出了低沉抑郁的哀乐，宣告了一个震撼世界的噩耗：毛泽东主席逝世了。一颗巨星陨落了！

全中国的人闻悉这个消息，大家都沉浸在长时间的无言默哀之中，人人都有说不出的凄惶与悲痛，每个人都深深为祖国未来的命运商担忧。报刊、电台、电视台轮番播放着沉痛的哀乐，报导各地悼念毛泽东的悲壮场面，回顾毛泽东伟大的一生。悼念的信函、电报、电话纷纷涌向北京。毛泽东的友人周世钊已先他几个月离开了人间，为了纪念这两位友人的友谊，周世钊的亲属于9月9日向中共中央发了唁电，全文如下：

北京，中共中央

惊悉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不胜哀痛我们深切怀念毛主席对先父周世钊先生的六十三年关怀

63年，一个甲子又三年，63年如一日，人间不寻常的友谊。这两位不是同年生，却是同年逝的友人把他们的友谊交往遗留给后人。朋友是容易相交的，但要像他们一样友谊始终不渝却很难。

周世钊在《毛主席青少年时代的几个故事》中曾经写过：“改造中国与世界”是毛泽东早期革命活动的一个鲜明主题，他来到长沙后，通过学习、研究，扩大了眼界，开始从韶山的绝大多数“痛苦的人”，想到全中国、全世界绝大多数“痛苦的人”；从绝大多数“痛苦的人”的穷困境况追溯到他们穷困的原因是“存在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他由此得出结论说：这种制度“是不应该存在的，应该推翻，彻底改造！”他决心挑起这副重担，为推翻这种制度，“为全中国痛苦的人，全世界痛苦的人贡献自己全部力量。”

第十章 人去魂留

毛泽东与周世钊，虽然不是同年诞生，却在 1976 年同年辞世了。他们虽然离开了人间，而他们的业绩永驻人间，他们的友谊永留世间，他们交往的故事永为后人所传颂。

年年岁岁，岁岁年年，有人评说，有人怀念。毛泽东与周世例如在天有灵，也会感到欣慰的。

柳宗元在《吊屈原文》中写道：“先生之貌不可得兮，忧仿佛其文章。”十多年来，毛泽东与周世钊的音容笑貌已不可得，而他们的道德文章不断出版发行，怀念他们的文章更是经常发表。他们的文章、书信、诗词和他们的业绩一样，是不朽的。

一 最好的怀念

1983年12月26日，毛泽东诞生90周年纪念的日子里，胡耀邦发表了《最好的怀念》一文。文章写道〔44〕：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是无人可以比拟的。他是我们党的创始人之一。他是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永垂不朽。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将与世长存。

毛泽东同志能够获得这样伟大的成就，决不是偶然的，他从少年时代起就立志救国。青年时代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他把全部身心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并为之奋斗了一生……他知识的渊博，是一切同他接触过的人，都感到惊讶和敬佩的。他的过人精力，是同他的伟大革命抱负联系在一起的。毛泽东同志的这种革命精神，值得我们永远学习。

……

毛泽东同志几十年披荆斩棘所创立的丰功伟绩，使我们思慕感奋不已，激励着我们为完成他的未竟事业奋发向前。我们应该努力。

1976年4月20日，周世钊与世长辞。延安“怀安诗社”的女诗人姜国仁到其故居吊唁，即情赋诗：

悼周世钊学长

世钊学长去世后三日，余访其故居，凄然有作。

人生何短促，死别太匆匆。诗词墨犹湿，文章篇未终。病妇哭床头，儿女各西东。庭院虽如旧，人亡感室空。骏骨已成灰，长留质朴风。

从事自然科学研究，在现代尖端科技领域——电子计算机方面作出重大贡献的国防科技大学曾石虞教授，在1976年4月26日参加了周世钊追悼会后，对他当年交往最是密切老的同学的逝世赋诗悼念，以示纪念。诗为：〔45〕

湘江水美久传名，并有峰青秀入云。
汉帝轻才来贾谊，楚玉失德窜灵均。
潭梁有识倡新学，黄蔡因公得峻莹。
继起承先多俊杰，群情希望重斯城。

在周世钊逝世一周年的1977年4月20日，香港《大公报》刊登了李铁铮的《怀念周世钊先生》〔46〕一文。李铁铮是我国外交界资历颇深、专门研究国际关系学的一位爱国老人。解放前在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工作多年，先后担任过驻伊拉克公使，驻伊朗、泰国首任大使，驻联合国大使衔代表等职。解放后旅居美国，攻读博士学位，并被聘为终身教授。1964年，他毅然抛弃舒适、优裕的生活享受，回到北京，任教外交学院，为建设祖国争作贡献。曾任全国政协常委。他与周世钊相交半个世纪，尤其在1964年后，来往颇多。对周世钊的逝世，他甚表悲痛。李铁铮的《怀念周世钊先生》为：

怀念周世钊先生

李铁铮

是毛主席的同学好友

去年在死亡的记录中，应是最突出的一年。在这一年中，周总理、朱委员长、毛主席相继逝世；回顾我国有史以来，不曾有过在一年之内人民痛感如此沉重损失的记录。对于国家元勋、尤其是举世景仰的革命领袖，长辞人世，诚是中外同悲，我当然不会例外。

在我个人，还有令我深切悲悼的，就是去年四月二十日在我故乡长沙逝世的周世钊先生。周先生是毛主席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最友好的同学，也是当年互选得票仅次于毛主席为全校熟知的杰出学生。那时他参加了我国著名革命团体——新民学会。他毕业后，即在长沙最老且最有名的周南女校教国文，还在楚怡、福湘、衡粹等校兼课，深受学生敬重，在湘中可毫不夸张他说是一位学人尽知的好教师。解放前他任第一师范代理校长，解放后历任湖南省教育厅副厅长、政协湖南省委员会副主席、湖南省副省长，终年八十时任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关于追悼的一切，北京《人民日报》去年四月二十七日第三版以三分之一的篇幅，附刊遗像，作了报道。

我于一九二五至二六年，在南京东南大学读书，周世钊先生以多年中学教师来校进修。他的年龄高出我们至少十岁，其力学精神与待人风度赢得同学称道，所以我们以学长称之，而不直呼其名。我一九六四年六月自美回国，次年春节前夕回故乡长沙，见到了阔别多年的学长。此后十年，每逢他到北京，我去长沙，必互访畅谈，留下此生最美好的回忆。前年十月，我的长儿英怀从美国回国探索，我挈之飞返其出生地长沙，进入湖南宾馆便打电话找周世钊先生，承约当晚相见。我带着儿子与来自武汉的女儿小琦同去，见面才知他本定是晚赴京就医，因我来而推迟一日。这次他去北京，一直住到年底，住院时多，我曾多次探视。我循英儿与三女似萱之意，申请去美国就养，于十二月十六日奉准，次日告知学长，我心想也许会挨他的严厉批评，不料竟蒙谅解。他离京返湘之日，我邀他中午在民族饭庄（即旧“东来顺”）餐叙。他进门便交给我一个信封，启视，内附一首预送我行的诗。按照我们老知识分子的积习，加上敌人厚我，阿其所好，诗句对我称道，不便录此，以免为自己贴金之嫌。其中勉励有加，深愧无以副之。抵美已逾半年，迄未定居得所，在欣悉“四人帮”被清除之后，尤觉对走向大治的祖国向往情殷，读诗中“爱国余肝胆”、“身世忘枯荣”之句，不禁潸然泪下。

到北京时住王季范家

想起故人厚我，非此文所可尽述。我在学长前畅阶欲言，不存顾忌，学长认为我偶有愚人千虑之一得，辄教我写下来，愿为我上达，终觉意见尚未成熟，未敢如命。因我住在华侨公寓，承其在顾，谈到归侨所百临的问题，他坚要我写一报告，愿为我面呈毛主席。窃思投身新社会，最怕给人以仍搞旧社会拉关系那一套的印象，故虽曾于一九三八年在兰州机场及谢觉老办事处见过周总理，回国多年，迄未敢请见。在一九三六至三七年，我虽曾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侨务科长，一九四六至四八年，

我曾在华侨最多的泰国充当首任驻使，但于人民政府成立前夕，业已改行厕身庠序，我不当言出乎位，乃以无资格为华侨进言而力辞。一次，他来北京，住在红霞公寓王季老（季范先生）家，我去看他，也见着早在黎助老家（助老即以精研文学改革著名、曾在一师教过毛主席国文的锦熙先生）就已见过、且承在驾过舍的王季老。我回国十二年，徒领高薪，毫无贡献，有负学长期望的地方，可真多了！

在另外一些方面，我受学长的教益却实在够多。在“文化大革命”的初期，以一个回国仅年余、思想上毫无准备的我，面对翻腾云水，不知如何适应。记得一九六七年，学长来到北京，住在徐特老家（为向特老致敬，他写过一本《我们的师表》），承在驾过访，告我他在长沙受到冲击，说时带说带笑、那样毫不在乎的表情，对我起了示范作用。另一次承告我，他见到毛主席，询以旧知识分子应如何才能免于大过。他把毛主席的指示细述一遍，我请他写给我，他写了，末附“毛主席这段指示未公开发表，请勿外传。”我把它当作座右铭，觉得受用不尽，但为尊重学长的原意，今仍不以原文在此披露。我在“文化大革命”中，虽身在一度以“五一六”重点见称的外交学院，却并未受到冲击，自分由于秉承毛主席这段指示，我才能幸免于大过，这我自应感谢学长之赐了。

毛岸英奶妈托转信件

还有更大的教益：由于与学长接触交谈而使我对毛主席的为人，有较多的认识。我于一九二六年在长沙教育会，以一个在家休假的大学生，夹在群众中远远地看到在台上接受欢迎的毛主席；一九六四年国庆前夕，在人民大会堂国宴场合，我在五千彼邀参加者中，又一度远远地看到前面横列长桌上居首坐的毛主席，但我在一九六四年回国后，才有机会读毛主席的书。我是湖南人，对毛主席常自况的“不信邪”、“冒失鬼”，能有较亲切的了解，然而由于自己水平低，学习晚，对于毛泽东思想的理解，自问较一般人差得多，思想改造因而较社会上落后的人更落后了。不过，我究竟是学政治学的，懂得人的因素在政治及政制上的重要，对于中外推崇的毛主席之为人，力求多得一些知识，所以我见到学长常常提问，且于他的闲谈中，心仪默想，使我得出了一个令我更加敬佩的印象。

比方，一次他告我：“日前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检阅红卫兵，入室内休息时，找我和王季老谈话，我进门便说‘我没有想到会在这里见我，我从长沙带来的信不在身边’。毛主席问是谁的信，我答以毛岸英奶妈托带的，毛主席当说‘她是一个好人’，随即问她的近况，表示亲切的关注。”我听了感到多么深厚的人情味。又如我听说在杨开慧母亲病危时，毛主席特从北京回长沙省、视，以及有一次在长沙女子商店拟为女儿买一件头巾之类的东西，售货员态度欠佳，毛主席并不曾面斥，只在商店的意见簿上写上“服务态度应改善”数字的故事，我觉得从小事中每能见其人的伟大。

毛主席赠书送果给他

世钊先生是一位全国知名的爱国人士。他热爱毛主席，悼词中特别提到。他和毛主席的友谊，从一次我亲见的事实中可以看出。那次是在北京饭店他住的房中，适逢毛主席派人送来一木箱水蜜桃和一册《两般秋雨盒随笔》，书百还题了字签了名，料是供他旅居的读物。至于为什么特送此书，正如为什么毛主席在日本首相田中来见时赠他《离骚》，这只有留待查核，不敢臆断。我这位学长本其爱国及拥护社会主义的热忱，经常上书毛主席，我曾多次碰见他在写。我当然不问他写的内容，也不问毛主席有何批答。我相信他对“文化大革命”中，尤其是有关教育改革，必定慷慨陈词，言无不尽。

我写这篇怀念学长逝世周年纪念文，为体其生前热爱毛主席之意，侧重写他和毛主席的友谊，没有多写有关他的道德文章，这方面，料他那数以万计的学生中必有人写了。

江青的一些丑恶行径

我从未见过江青，谈不上有何印象。她今日已是过街老鼠，业已倒了，更用不着我这寄身海外退休老头去推。我为着向那些看反共与右派报刊而信以为真的人，以及看中立或左派报载有所怀疑的读者，提供一点旁证，希作参考，特写下下面不免离题的一段，不卜国文大师世钊先生以为当否。

我住在北京十二年，往往听到一些所谓小道消息。却从未听到赞扬江青的传说；相反地，只听到不少鄙视江青的议论。前年夏秋之交，我几乎随时随地都可听到责骂江青的议论，后来因追查所谓“政治谣言”而沉寂下来。去年天安门事件发生后，人们甚至不敢怒形于色，更不敢言了。更值得注意的：凡与我接触过的高级干部。和在京湖南同乡如周师鳧生家中，这多年来，简直可说没有听见提及江青其人其事。我想江青如果稍孚众望，能如邓大姐、蔡大姐（大姐乃国内对邓颖超、蔡畅这两位妇运领导的尊称）之有口皆碑，何致为人所不齿，何致只听到她怎样激怒了毛主席。除因美国女作者魏特姬（一纽约州大分校历史系副教授，并不知名，更未成家，故我只称作者）受江青托为其立传。内容荒谬，那次使毛主席盛怒，弄得首都人士辗转相告外，我还听到江青下令中南海卫士不许毛主席的女儿（非江所出）入内，后者诉诸汪东兴转报毛主席，毛主席为之大怒的传说。

闻志愿军安渡鸭绿江

周世钊先生一次谈及抗美援朝之役，他一听到将与美军交战是如何地耽心，经毛主席指示才知我不得不赴援的道理，且是去打一个有把握的仗。后来的发展与结束，一如毛主席所预料。他说毛主席照例工作至深夜迄凌晨，上午休息，那次是上午找王季老和他会谈，他见面便说为何上午召见，毛主席答道：“任弼时同志昨去世，我往吊唁才回来，特邀两位来谈谈。”他说，既一宵未眠，请赶快去休息，毛主席说：“不用急我刚接电报，我军已安渡鸭绿江，你们走后，我可安心大睡一觉。”

三月下旬寄自美国

二 三本遗著问世

友人虽然同年离开人间，而他们的思想可以永远影响人民，他们的著作将永放光芒，激励后人。

1977年6月，北京的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周世钊著的《毛主席青年时期的故事》。编后记说：我们重新出版了周世钊同志在1962年为《红色少年》丛刊写的《毛主席青年时期的几个故事》。新华社1977年9月14日电：回忆毛主席伟大革命实践，歌颂毛主席丰功伟绩。……周世钊同志写的《毛主席青年时期的故事》一书，叙述了毛主席青年时期在长沙的革命活动。1977年9月，陕西和西安人民广播电台的少年儿童节目广播了该书。1977年10月26日，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给周世钊亲属的信中说，该书出版后，好几个省市的电台都广播了，民族出版社也和我们联系过，要译成好几个兄弟民族文字出版，1978年1月的《光明日报》作了报导：周世钊的《毛主席青年时期的故事》亲切地叙述了毛主席青年时期为寻求救国真理在长沙的革命活动。1979年第一期的《全国新书目》中介绍说：周世钊著的《毛主席青年时期的故事》已分别白黑龙江、新疆、江苏、浙江、福建、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四川、云南等省、市、自治区人民出版社重印。这就是周世钊逝世后出版的周世钊著的关于毛泽东的第一本书。

周世钊关于毛泽东的第二本书是在1978年12月，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青少年时期锻炼身体的故事》。本书曾以“毛主席锻炼身体的故事”为题，1958年在《新体育》杂志上连载，后经作者作了较大修订。在本书正式出版前的1977年12月下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体育节目组就广播了该书中的“少年时代的游泳池，东台山下，冷水浴，游泳在湘江，与天奋斗，爱晚亭畔，六段体操，体育之研究”等故事。本书第一次就印了50万册。

周世钊关于毛泽东的第三本书是：1979年6月上海的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少年毛泽东的故事》。本书原写于1962年，通过22则小故事，生动通俗地反映毛主席青少年时期刻苦学习和锻炼身体的事迹。

周世钊著述毛泽东的三本书，都写作于1960年前后，却在他们逝世后的1977，1978，1979年连续出版发行。“三本书”作为他们间友谊的记录，将永放光芒。

三 信件最多的旧友

在纪念毛泽东九十诞辰的时候，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毛泽东书信选集》出版了。冯蕙在《人民日报》上写了以毛泽东书信选集)介绍》的文章[47]。

文章说，收入《书信选集》的 372 封书信，是从现已收集到的毛泽东的 1500 多封书信和约 200 件具有书信性质和形式的电报和批示中挑选出来的。

文章指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后，毛泽东的一些亲朋故旧纷纷写信给他。有他的近亲毛家、文家、杨家的人，有他少年时代的同学、朋友乡邻，有辛亥革命后他在湖南新军中的同事，有他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新民学会的会友，有他的老师，有烈士的遗属，还有湖南的社会名流，等等。他们在店中追叙旧谊，表示怀念和敬意，一些人也提出某些个人要求。国家初建，百废待兴，毛泽东担负着党和国家繁重的领导工作，但是对于亲朋故旧的来信，他都亲自作复。……。

文章着重指出，在同旧友的通信中，给周世钊的最多，共选入了十封，从谈诗论词，酬唱奉和到研究历史唯物主义，探讨对受任新职的态度，既有对他从事教育工作的鼓励，也有对他接触实际的督促。这些书信，情意拳拳，不拘形迹，亲切感人。

从这十封发表的信中及其他保存的信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友人的亲密无间。10 封信，占了全部书信选 372 封信的近 3%。

还是 1983 年 12 月，文物出版社出版了《毛泽东书信手迹选》。共收入毛泽东 1936 年至 1965 年期间的书信 84 封，其中有给周世钊的 2 封，即 1950 年 12 月 29 日及 1956 年 12 月 29 日的信〔48〕。

《毛泽东书信选集》和《毛泽东书信手迹选》出版后，中央有关部门向周世钊亲属赠送了样书，周的亲属把它们作为珍贵的纪念品收藏之。

四 肝胆相照情意拳拳

1985年第3期的《毛泽东思想研究》上，发表了本书作者写的《肝胆相照情意拳拳——记毛泽东和周世钊交往的几个片断》。文章写道：

63年，在人生的旅程中不是稍纵即逝的短暂岁月。但人要在63年的交往中，情意拳拳、肝胆相照，确实极为难得。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最早党员和几十年的领袖，周世钊则没有加入过中国共产党，解放后参加中国民主同盟，但是毛泽东与周世钊就有63年的长期交往而友谊始终不渝。

文章接着写了八个片断，即：同学于湖南第一师范，你是真能爱我的人，骏骨未凋，酬唱奉和，贤者与能者，答友人，坦率陈书及信件最多的旧友。

文章发表后，一些报刊作了转载。如：上海的《文汇报》于1985年10月12日转载，题为《周世钊坦率陈书》。接着，长沙的《文革周报》于1985年10月25日刊出了题为《周世钊坦率上书毛主席》的文章；北京的《北京政协报》于1985年10月27日刊了题为《周世钊上书毛主席》的文章。等等。这样，引起了一些读者的兴趣和共鸣。

1985年12月26日的《湖南日报》第一版刊登了李津身的《毛主席与周世钊同志一席谈》，文章不长，兹录于下：

毛主席与周世钊同志一席谈 [35]

李津身

湖南日报社出版的《文萃》周报，前些时候转载了周世钊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给毛主席的一封信。文章体现了周老在十年动乱中关心国事，敢于直言的风格，读后颇有所感。由此我不禁联想到“文化大革命”中，周老对我谈到的毛主席与他的一席谈话。

时间约在十年动乱抄家高潮之后，当时我已被彻底抄家。周老是我的国文老师，一九五八年我调回湖南工作后，曾多次到他家闲谈。现在，他处境怎样？他当时住在教育厅附近的一条小巷的末端楼房里。当我冒着风险到他家向他申陈慰问之意后，谈及抄家事。我问周老是否受惊，并解释说现在全都如此，不必在意。周老面有不豫之色，说：“我刚从北京回来，见到毛主席，他老曾询及此事，我回答主席说，一身之外无长物，抄家者一无所获，不过搞乱了我好些旧书，弄得残缺不全，可惜，可惜！痛心，痛心！……”言下仍有痛惜之感。接着又告诉我主席对他说：“……这对你不起，由我负责赔偿，你那些旧书，我这里都应该有，任你挑选拿去作赔，只不得抄我的家……”周老告诉我，主席还对他说：“……你不要心存芥蒂，湖南的事，你还是要管的，当说的说，可管则管，至少是教育方面的事，你要管，不必负气……”周老当时回答说：“我连个党员都不是，怎能管事，怎么管事？……”主席说：“你愿入党我可作介绍，你是副省长嘛！即使造反，你也应管，再说你又是湖南民盟的负责人，……怎能袖手旁观……”周老答道：“今天这个局面，民主党派还能起什么作用。连个庙都没有了……”主席说：“庙可以重修嘛！修庙是积福的事，我出点香火钱。”我听周老绘声绘色地介绍情

况后，感觉这一席谈话，不仅诚挚隽永，而且含意深远。事虽已隔多年，原话我难全记准确，可自信大意不差，记之可见党中央和毛主席对民主党派、爱国人士爱护关切之深，和“长期共存”之至意。充分体现了“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真挚精神。今主席和周老都已久离我们，特回忆写下这一件往事，以表纪念之意。

李津身的文章，形象他说明了两位友人的拳拳情意。只有肝胆相照的人，才能在文革动乱年代直言不讳。

五 十年祭

1986年，是毛泽东与周世钊逝世十周年的日子。9月9日，是毛泽东逝世十周年的纪念日。为了纪念毛泽东逝世十周年，中央出版了三本书。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了《毛泽东著作选读》一书，分上下册，由人民出版社于1986年8月出版。该书开卷就是毛泽东在新民学会长沙委员大会上的讲话。本书第三章《泛劳动主义的争论》节曾经写到这段内容。

1986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毛泽东诗词选》。书中收进了毛泽东给周世钊的三首诗词，已记述于本书第七章中。

1986年9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了《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一书。书中收入了龚育之、逢先知、石仲泉、田松年、高路等人的文章。这本书的三处引用了毛泽东和周世钊的交谈。其中第5页写道〔49〕：

1951年4月中旬的一天，毛泽东邀请周世钊和蒋竹如到中南海作客，曾对他们说：我很想请两三年假学习自然科学，可惜，可能不容许我有这样长的假期。

第14页写道：

毛泽东的早年同学周世钊，在谈到毛泽东青年时代读书情况时，说毛泽东有“四多”的习惯，就是读得多，想得多，写得多，问得多。这个“四多”正是反映了毛泽东酷爱读书而又不迷信书本，具有独立思考 and 追根究底的精神。

第204页写道：

毛泽东把《红楼梦》看作是一部描写封建大家族衰亡和封建社会阶级斗争的小说，给予高度评价，也充分肯定了小说描写的主要人物贾宝玉对封建制度的叛逆性格。同时又指出，书中的两位主角贾宝玉和林黛玉，对现代青年来说是不足为训的。贾宝玉不能料理自己的生活，连吃饭穿衣都要丫头服侍。林黛玉多愁善感，常好哭脸，她瘦弱多病，只好住在潇湘馆，吐血，闹肺病。我们不需要这样的青年！我们今天需要的青年是有活力，有热情，有干劲和坚强意志的革命青年。

（文后有页下注：这段话是1951年秋，毛泽东与周世钊等人谈话时说的。）

在纪念毛泽东逝世十周年的时候，各报刊发表了一些怀念文章。1985年1月，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并出版了《难忘的回忆——怀念毛泽东同志》一书。书中收进了聂荣臻、王震、薄一波、伍修权、杨成武、许德珩、周谷城、周世钊、毛岸青、邵华等人的文章。周世钊的文章是写于30年以前的遗作《难忘的一天》。他写的是毛泽东渡湘江的一天，也可能就是毛泽东写诗《七律·和周世钊同志》的原由。

六 人去魂长留

倘若周世钊能活到今天，能读到《毛泽东书信选集》、《毛泽东书信手迹选》、《最好的怀念》、《毛泽东著作选读》、《毛泽东诗词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难忘的回忆》等，他必定会感慨万千，热泪盈眶，诗潮兴起，情不自禁地为老友赋诗作词，写出《悼毛泽东》的诗篇来。可是，周世钊是在1976年与毛泽东同年离开了这个世界的。可能，他们在那另一个世界里，又在促膝长谈，又在酬唱奉和，谈笑风生，追忆往事，共叙友情。

倘若毛泽东能活到今天，能读到同辈们悼念周世钊的诗词，能看到李铁铮写的《怀念周世钊先生》等，他必定会感慨万千，热泪盈眶，诗潮兴起，情不自禁地为老友赋诗作词，写出《吊周世钊》的诗篇。可是，毛泽东是在1976年与周世钊同年离开这个世界的。可能，他们在那另一个世界里，又在促膝长谈，又在酬唱奉和，谈笑风生，追忆往事，共叙友情。

毛泽东和周世钊的诗词写得极为出色，赢得了人民的热爱与赞美。诗人，毛泽东是，周世钊也是，他们心中充溢着诗的感情。今天，他们可能在他们的天国里谱写“友谊、永恒”的诗篇。今天，他们可能在他们的天国里会同他们的老师徐特立、杨昌济、王季范等，会同他们的同学何叔衡、蔡和森、罗学琐等，会同他们新民学会的会友李维汉、向警予、谢觉哉等，会同他们青年时代的学生任弼时、毛泽覃等，一起激烈地讨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新问题，探索“改革、开放”之路。

习仲勋曾经指出：交朋友，要交知心朋友，还要交畏友、诤友〔50〕。

毛泽东与周世钊的灵魂，毛泽东与周世钊相交的精神，将长留人世。

人去魂长留！

参考文献

- 【1】毛泽东：《毛泽东诗词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 【2】周世钊：《少年毛泽东的故事》，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1979
- 【3】汪树白、张慎恒：《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探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1983
- 【4】本书编写组：《湖南第一师范校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3
- 【5】肖三：《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
- 【6】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
- 【7】高菊村：《毛泽东早期思想发展史略》，《毛泽东思想研究》，1986
4
- 【8】[美]斯图尔特·施拉姆著：《毛泽东》.编辑组编译，北京，红旗出版社，1987
- 【9】宋斐夫，《新民学会》，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
- 【10】湖南省博物馆历史部枝编：《新民学会文献汇编》，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
- 【11】《谢觉哉传》编写组：《谢觉哉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 【12】周世钊：湘江的怒吼（载《青年运动回忆录》），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
- 【13】湖南现代史研究室：《五四时期湖南人民革命斗争史料选编》，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
- 【14】【美】埃德加·斯诺：《同毛泽东的一次交谈》（载《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访华文章》）。北京，三联书店，1971
- 【15】高平叔：《蔡元培与毛泽东》，《群言》，1986 3
- 【16】周敦祥：女界钟（载《五四运动在湖南》），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
- 【17】周世钊·《毛主席青年时期的故事》，北京，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77
- 【18】杨新正，《廖沫沙故乡行》，《湖南日报》，1982、7、14
- 【19】罗章龙：《肝胆轮困怀国土》（载《怀念蔡和森同志》），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
- 【20】周世钊：《满江红·为开慧烈士殉难纪念作》，《湖南日报》，1968、11、26
- 【2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1953
- 【22】毛泽东：《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 【23】边彦军、龚育之、汪裕尧、冯蕙：《毛泽东和新中国的起步》，《红旗》，1988 6
- 【24】马玉卿、张万禄：《毛泽东成长的道路》.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
- 【25】季强，《周震麟和他的座右铭》，《人物》，1986 6
- 【26】周世钊：《毛主席青少年时期锻炼身体的故事》，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78

- 【27】吴美潮、周彦瑜：《也谈毛泽东诗词的研究和出版》，《毛泽东思想研究》，1985 4
- 【28】王毅：《岳麓山诗词选》，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
- 【29】周世钊：《毛主席锻炼身体的故事》，《新体育》，1958—1959
- 【30】郭沫若：《芙蓉国里尽朝晖——读毛主席新发表的（七律·答友人）》，《人民日报》，1964、5、16
- 【31】周世钊：《伟大的革命号角光辉的艺术典范》，《湖南文学》，1964 7
- 【32】周世钊：《我们的师表》，北京，北京出版社，1958
- 【33】张国基：《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相处的日子》（载《文史资料选编》第一辑），北京，北京出版社，1979
- 【34】楚图南：《与人照肝胆，见义轻风浪》，《人民日报》，1986、1、24
- 【35】李津身，《毛主席和周世钊同志一席谈》，《湖南日报》，1985，12，26
- 【36】熊瑾玎：《熊瑾玎诗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 【37】延安大学中文系编：《延安颂》，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77
- 【38】周彦瑜、吴美潮，《肝胆相照情意拳拳——记毛泽东和周世钊交往的几个片断》，《毛泽东思想研究》，1985 3
- 【39】长沙师范编：《怀念徐特立同志》，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
- 【40】中共宁乡县委编：《怀念谢觉哉同志》，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
- 【41】周世钊：《在王季范追悼会上的悼词》，《人民日报》，1972，7，14
- 【42】【美】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
- 【43】新华社：《周世钊先生追悼会在长沙举行》，《人民日报》，19764、27
- 【44】胡耀邦：《最好的怀念》（载《最好的怀念》），北京，红旗出版社，1984
- 【45】曾石虞：《天心阁上问人生》，《长沙晚报》，1983、10、5
- 【46】李铁铮：《怀念周世钊先生》（载《敝帚一把》）。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
- 【47】冯蕙：《毛泽东书信选集》介绍，《人民日报》，1983、12、27
- 【4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毛泽东书信手迹选》，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
- 【49】龚育之、逢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北京，三联书店，1986
- 【50】辽宁本溪市政协等：《相遇贵相知》，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87

后 记

一本书的撰写、出版和发行，必定有许多热情的人对它进行直接的或间接的帮助。

《毛泽东与周世钊》一书的缘起，可以追溯到1983年。当时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正在编注《毛泽东书信选集》。我们曾对有关毛泽东致周世钊的信件注释提供素材。研究室的负责同志认为我们尚有历史知识，且对毛泽东与周世钊相交了解较多，因此建议我们写点东西。于是，我们萌发撰写本书的动机。

首先我们应感谢我们的老人——周彦瑜的母亲、吴美潮的岳母，即周世钊的夫人余寅女士积极赞赏、热情支持，并提供材料。

写作过程中，我们曾得到许多领导、亲友、师长及同志们的支持与鼓励。我国著名书法家、全国政协副主席赵朴初为本书题签。中国民主同盟名誉主席、90高龄的楚图南为本书题写“振兴教育、发扬民主”；全国侨联名誉主席、百岁老人、新民学会会员、周世钊先生的老友张国基为本书题写了“总角相知、肝胆相照”；全国政协委员、百岁老人、新民学会会员罗章龙为本书题写了“新民学会主张社会改革救国救民”。吉林人民出版社副编审陈葵光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巨大的劳动。还有许多人为本书的问世作了大量工作和起了积极作用，本书还引用了周世钊先生的文稿及其他人的文献资料，对于这些，我们均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们都是从事电气科学的高级工程师，要写《毛泽东与世钊》这样的社会科学书籍，本是力不从心的。同时本职工作繁忙，全系利用业余时间写作。所以本书会存在许多不足之处，祈望读者批评指正和补充，我们尽力对所有赐教以及时答复。

周彦瑜、吴美潮

1991年8月

